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

汪道涵

陆南泉
姜长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751.22
5

0103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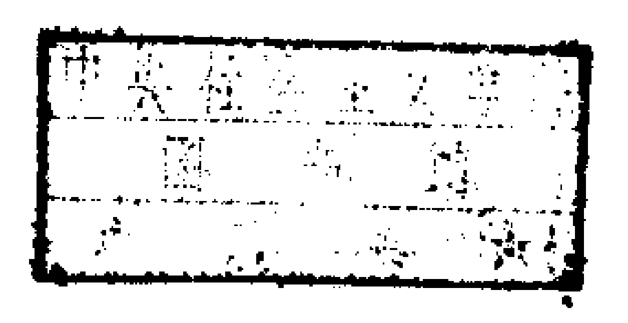
D626/22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

陆南泉　姜长斌　主编


2010302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S0E0I0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陆南泉,姜长斌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ISBN 7-5004-2471-X

Ⅰ.苏… Ⅱ.①陆… ②姜… Ⅲ.①政治事件—研究—苏联 ②和平演变—研究—苏联 Ⅳ.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55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31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3.00 元

作　者　分　工

（以篇章顺序为序）

姜长斌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教授、博导）第一篇一
郑异凡　（中央马列编译局　研究员）第一篇二
王志平　（上海东方研究院　教授）第一篇三
郭建平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室主任、教授）第一篇四
徐天新　（北京大学　教授）第一篇五
徐　葵　（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研究员）第一篇六
陈之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博导）第一篇七
高　放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导）第二篇一
荣　植　（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第二篇二
黄宗良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　教授、博导）第二篇三
王正泉　（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　教授）第二篇四
葛霖生、胡燕芬　（上海复旦大学　教授）第二篇五
赵常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博导）第二篇六
李永全　（中央马列编译局　研究员）第二篇七
王金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博导）第二篇八
李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室主任、研究员）第二篇九
冯绍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教授）第二篇十

李正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副局级学术秘书、研究员）第三篇一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第三篇二

姜 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教授）第三篇三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博导）第三篇四

李静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博导）第三篇五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苏联兴亡史论》的一项中间成果。

苏联剧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且还意味着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一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回答苏联剧变的原因，就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曾作了一些研究，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1996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要回答苏联剧变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原因。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在谈及社科院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时指出：前几年提出的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看来还没有作出好的回答，还应该继续研究（大意）。为了写好这本书，在1997年11月7—11日还在上海召开了研讨会，4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名誉会长汪道涵同志对会议十分关心，并出席整个会议，亲临指导，并在会议开幕与闭幕时讲了话。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篇：用较多的篇幅探讨苏联剧变的历史因素，着重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发生的条件。十月革命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是战争给予了它成功的机遇，但战争并不能使俄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上超越“卡夫丁峡谷”。因此，俄国革命就出现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重缺陷。在上述总的理论指导下，再从各个角度分析苏联发展的历史进程，

其中特别探讨了政治、经济体制、农业发展道路与农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等问题，从而论证这些历史因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第二篇：与历史因素联系起来探讨苏联剧变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如苏联经济发展、民族、“左”的理论根源、苏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分析这些重大问题与剧变的关系。

第三篇：研究苏联剧变的指导理论、方法与教训问题。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长治久安。本书总结苏联剧变教训问题时有以下特点：(1) 不是采取就事论事的做法，而是紧密结合邓小平的理论，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看法；(2) 为了对总结教训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专门论述了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方法问题；(3) 在总结苏联剧变教训问题时，在研究了国内前几年提出的一些各不相同看法的基础上，根据“十五大”的精神，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应从苏联剧变吸取教训。问题有：

(1) 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分析苏联剧变的教训。小平同志新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的重要结论。苏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失误。(2) 与上述问题有关，提出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状况与剧变的关系。(3) 要把防“左”、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长期性任务来抓。“十五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比过去改革与建设中所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难。“十五大”本身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没有这个发展难以跟上改革与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必将对我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另外，本书还从苏共的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一角度，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

训。这主要是：第一，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第四，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和民主的。第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第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第七，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第八，无产阶级要制定与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在这方面从事研究的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著名学者。自苏联剧变以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一领域的问题。本书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1. 全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依据，探讨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要求作者做到：解放思想、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力戒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分析问题，避免用简单化的方法，以我们自己的某些观点与政策作为标准去评价是非。

2. 更多地利用过去尚未发表的苏共文献与苏联档案材料，用充实的史料来证明所分析的问题，这一点，前几年出版的同类成果尚难以做到。这样，也就避免把现成材料抄来抄去的情况，使读者有新鲜感。

3. 在写作方法上，对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既作了横断面的，又作了纵断面的剖析，努力克服过去从各个因素单独探讨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了分析问题的理论深度。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是本书全体作者的共识，它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汪道涵同志与东方研究院协助课题组织了讨论会，并为本书出版给予了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但是，本书各篇的观点，都是本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和文责自负的方针来处理的。另外，我们保留了作者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提法和见解。也许，这样做更有益于读者进一步思考问题。

由于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这一问题的难度很大，加上主编水平所限，本书不妥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与指正。

陆南泉　姜长斌

1998年8月24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智厚

目　　录

第三篇　研究苏联剧变的指导理论与苏联剧变的教训

第　一　篇

苏联剧变的历史因素



一 探讨十月革命的社会内容是认识前苏联社会主义历程的“入口”

关于苏联革命、建设道路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邓小平同志讲过前人没有讲过但却极有启发意义的话，这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①]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③]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涉及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他首先谈的是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实际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及战略家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 年)等“问鼎之作”里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许多基本观点。也正是斯大林那些谬误理论，导致了苏联内政外交方面的独特体制，即“苏联模式”。[④]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139 页(1985 年 8 月 28 日)。

③ 同上书，第 383 页。

④ 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请参阅拙作《历史的孤独》，特别是其中的第七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本文只集中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与内容问题。

十月革命的政治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至今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过去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经典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去注意区分这场革命的政治性质和社会内容。这种一般化的认识，使我们对列宁主义的精髓、对新经济政策、对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模式的研究，长期流于肤浅、片面。最主要的是，这极其不利于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实践上造成过很大的危害。

在1917年一年之中俄国连续爆发了两次革命。首先爆发的是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仅仅事过半年，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对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不作特殊的、深入的分析，就无法真正解开后来苏联模式失败之谜。

现在，经过邓小平理论的指点和对历史进程的反思，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

(1)马克思主义与农民国度；(2)俄国的特殊国情；(3)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4)一战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分析；(5)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革命发动口号；(6)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结束语)。

(一) 马克思主义与农民国度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欧文明的产物。具体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初演出的。"①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72页。本文引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言论，全部出自中央编译局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因为，这一版本是经马克思本人生前最后认真修订过的，内容结构也有较大变化。下同。

那么，马恩学说为什么只是在两个半世纪以后，直到19世纪中叶才诞生呢？对此，1880年恩格斯作过阐述。恩格斯认为，在此之前，比如说18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知……”[①]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比较清晰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同它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等）划清了界限。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马恩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十月革命开始，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又以变异的，即脱离历史和社会实际的方式，重蹈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

1881年，马克思在答复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俄国村社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曾反复强调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的发展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②] 马克思同时指出，构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核心的“对农民的剥夺”，是不讲人道，空前残酷的，是始终充满“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的，他说，“事实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③]

这些话已经表明，西欧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原始积累道路，绝对

---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第723—7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这是回信的第四稿，一、二、三稿见同卷第430、442、447页；马克思的上述引文已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改正，粗黑体字为原有。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768页。

不适用于“农民国度”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另寻新路。就是说，尽管马恩学说的最基本的原理，无疑地适用于一切地区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居民，但这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①] 在农民国度里搞社会主义，首要的原则是不可重蹈资本主义剥夺农民的老路。可是，“新路”究竟应该怎么走，马克思只是提出原则，不会也不能提出具体办法。也正是在同一封信里，马克思对查苏利奇就是这样展开自己的思路的，他说：“在《资本论》[②]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我深信，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③]（此处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马克思强调，必须保证农民（在俄国指村社）“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新鲜含义是什么？第一，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进行的原始积累，要“肃清”对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强制施加的“破坏性的影响”；第二，“自由发展”不是消极的、无序的放任自流，恰恰相反，新政权应该向农民提供种种方便，切实地保证他们“具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即保证他们能够从自然经济合乎社会客观规律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有机地同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溶为一体。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民的

---

① 例如，在后来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几个“序言”里，马恩反复强调的思想是：“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共产党宣言》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关于《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中文书名翻译，造成的遗憾可能已是永久性的，再也无法改正了。德文原文是 Das Kapital，准确的译法是《资本》，“论”字是不必要的、外加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歧义。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269页。

切身利益不仅不应受到损害，还应从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这里凝聚着从农民国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新原则。也可以说，这是显示社会主义历史优越性的第一关键所在。

（二）俄国的特殊国情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确立和传播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掌握了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如何剥削他们的秘密，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从政治经济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关键时刻迫使资产阶级作出某种妥协让步。这种妥协让步，在客观上有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外壳”不致达到“爆炸”的程度。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指出过这种可能性，他说：“资本和雇佣劳动（1891年版本中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工人拿自己的劳动（1891年版本中改为“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1891年版本改为“工人”）**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1]（此处粗体字皆为原有）我们所看到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平稳的发展，20世纪实行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后至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实和现实，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利益关系能够得到不断调整所致。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世纪下半

[1]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489—491页。

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展，是它传入了俄国，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

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1861年实行农民改革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1] 直到本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封建自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国家。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1897年，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3.4%，1914年上升为17.9%，各类工人为1780万，约占总人口的11%。[2] 1914年，从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看，农业资产占53.7%，工商贸、交通、通讯加在一起总共只占46.3%；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农业占53.6%，其余仅占46.4%。[3] 这说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不仅相当低下，而且在国民经济总体里，也并不占优势。俄国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度。

还必须指出的是，俄国这个农民国度与资本主义前的西欧有着巨大的差别。马克思说："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就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4] 可是，俄国直到1914年，变相的农奴制依然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统治关系。俄国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以后实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封建地主只出卖了1/10的土地，封建贵族地主掌握的土地仍超过其他成分60%。[5]

---

① 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

② 费多索夫主编：《19—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13页。

③ 勃维金：《大变动前夕的俄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11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71页。

⑤ 费多索夫主编：《19—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09、316页。

俄国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严重地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相比，它在政治上离一个自为阶级还差得远。与西方不同的是，为俄国资产阶级开辟发展道路的，正是1861年沙皇自上而下颁布的农民改革诏令。许多资本家就是从封建地主演化而来。到一战前夕，不论就其阶级来源，还是就其剥削形式和资本构成都同西欧垄断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早在进入垄断阶段之前，俄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就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以封建家族为核心的工业集团。在这方面，莫斯科的工业资产阶级很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在彼得堡则出现的是官、资结合的金融财团，他们同沙俄专制国家的依存关系尤为密切。由于国家引进外资和国家外债的累积，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不仅依存于封建专制制度，而且脱离不开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①]

俄国社会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并没有因为自身发展落后，而终止或放慢它一贯的领土扩张传统和同其他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进程。这实际上只能加速沙俄国家的彻底崩溃。这期间，它参加了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还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后一场战争，使它本已不景气的社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最后危机。据统计，俄罗斯平时保持150万军队。大战第一年即1914年就动员了740万人入伍，第二年又动员了430万人。[②] 仅1914年动员的人里，工业和技术部门工人就占到了40%。[③]

这样滥用人力物力资源，必然致命地破坏俄国的经济。大战开

---

① 费多索夫主编：《19—20世纪初俄国史》，第315—316页；瓦·伊·鲍维金：《大转折前夕的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132页。书中统计，1915年，在投入俄罗斯的外资总额中，法国占31%，英国占24%，德国占20%；外资多是投向赢利最多的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占3/5的份额）。

② 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与土地农民问题》第一卷，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第265页。

③ 格利涅维茨基：《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莫斯科，1919年俄文版，第34页。

始后，战争迫使经济迅速军国主义化。1916年，俄国的金属加工业比1914年增加了两倍，化学工业增加了1.5倍，步枪生产增加了10倍，子弹增加了1.5倍。但是，工业总产值到1917年却下降了23%。受到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当推农民和农业。与1914年相比，1916年国家只收购到了50%的粮食。粮价及其他食品价格飞涨。1917年春，全国进入粮荒时期。[①]

俄国社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矛盾），例如，复杂的民族问题既是俄罗斯大肆扩张的、棘手的历史“遗产”，又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受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讨论了。

（三）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虽然经历过曲折并且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在基本国情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不过，要想看清楚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只是从他领导十月革命开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他的早期思想。

列宁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革命有四个明显的不同特点，即：(1) 它只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2) 暴力革命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惟一可行的途径；(3)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特殊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4) 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掌握新政权并把俄国引向社会主义，将是一项全新的历史任务；由“军事共产主义”[②] 向新经

---

① 费多索夫主编：《19—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17—319页。

② “军事共产主义”，以前我们一直译为“战时共产主义”，这个译法不妥。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论文中采用了新译法“军事共产主义”，郑异凡教授更在其专著中正式起用新译法，并且作了论证，见《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8页。

济政策转变，是列宁的创举，完整地表现了列宁的伟大之处。

关于第一点，即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内容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立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艰苦的斗争：一是要克服民粹派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空想，二是要克服孟什维克、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要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有时论战还带有国际性质，例如，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从19世纪末起，列宁写了一系列研究俄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俄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种策略》一书。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列宁处于那个时代使用的某些概念（例如，资本主义发展手段、资产阶级管理方式，商品、货币、市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等等）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直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邓小平理论所突破），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理解列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列宁特别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这里所说的"最低纲领"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② 在政治上，列宁阐述说："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看，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一卷，第554、565—566页。

② 同上书，第534页。

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强调这一点现在尤为适当……”[①] 列宁还指出了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于俄国农民的意义，他说：“社会革命党人（按，实际也指俄国特有的前民粹派和他们的后继者——本文作者）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照搬照用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照搬照用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②] 而对于无产阶级，列宁则指出：“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③] 关于革命的前途，列宁指出：“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④] 为了保证“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一卷，第534页。

② 同上书，第554—555页。

③ 同上书，第555—556页。

④ 同上书，第561页。

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①]列宁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道："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把这两种革命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②] 列宁这里所说的"局部的成分"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指要始终坚持俄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因此，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③]

由此看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找到了新经济政策发展道路，就不是偶然的了。

关于第二点，既暴力革命是俄国惟一可行的途径问题。在19世纪中叶至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马恩确实很重视并且宣传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例如，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70年代普法战争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诸多工人政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且通过普选，进入为工人权利而进行议会斗争阶段之后，马恩的看法有了重要的改变。这里仅举二例。1872年9月，即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半年，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应放弃"政治活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562—563页

② 同上书，第591页。

③ 同上书，第591—592页。

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到了1895年，恩格斯总结了半个世纪的斗争经验，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指暴力革命——本文作者注）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②]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无产阶级的强大表现在哪里呢？"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德国工人除了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粗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第18卷，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597—598、600页。
③ 同上书，第600—603页。

可见，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原理。

19 世纪末的俄国虽然被恩格斯列为“确立了大工业”的国家，但是，列宁更了解俄国的国情。他清醒地看到，俄国仍是封建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警察国家，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想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①]

关于俄国革命只能通过暴力途径夺取胜利，列宁的论述是很多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19 世纪中叶马恩主张的暴力革命途径，在俄国乃至东方这一大片地区，又合乎实际地复活了。

与此相关的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和存在形式问题。概括说来，列宁一贯坚持的中心思想是，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有足够的战斗力，就只能是以纪律严明的“秘密职业革命家集团”的形式存在并发展。早在建党初期（1902 年），他就说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直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②] 1904 年，他又说：“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一卷，第 562 页。

② 同上书，第 418 页。

要有组织上的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①] "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将得到直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权利。"[②] 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必须是秘密存在的，突出集中制的，尽管它并不放弃公开的宣传与动员群众的大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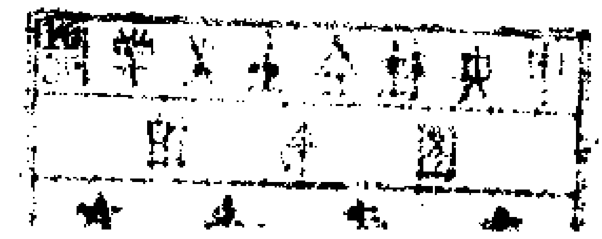
最后，关于俄国民主革命胜利，即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总任务虽然是明确的，但通过什么具体途径，如何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只是强调要通过"一系列中间阶段"，这些中间阶段的具体内容也并不很清楚，所以，革命的前途问题一直是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里，有必要指出，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92 年考茨基写过一本《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这本书里，考茨基断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私有制将转变为公有制，商品生产、货币、金融组织将被取消，局面将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③] 但是，10 年之后，他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认为，在"革命后的日子里"情况将是：(1) 对于资本，也许可以不采取"直接没收"这种"原始的剥夺形式"，而将采用过程较长的"税收来实行剥夺"，"以便与新制度的日益巩固及其良好影响的日益扩大过程相适应"；(2)"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制，也有合作社的所有制。除此之外，某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可以让它继续存在"；(3)"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仍将是必不可缺的，只要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4)"获胜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监狱式或兵营式的制度"，吸收工人参加劳动要靠"民主的纪律"，因此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 第一卷，第 499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第七卷，第 249 页。

③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北京，1963 年版，第 83—1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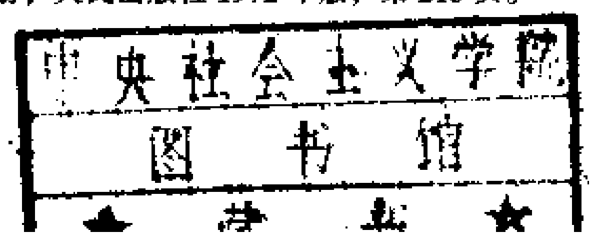
必须发挥“劳动工资的吸引力”。[①] 可见，由于历史进程的推动，考茨基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实际了。但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却不会有这种“进步”，例如，关于土地问题、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商品、货币、市场等等），一直争论不休。十月革命后因此走了一段“军事共产主义”弯路，也并不是偶然的。

（四）重评一战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认识

继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别是在世界大战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同第二国际的论战，直至分道扬镳，我们也必须把双方放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重新加以分析。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各国国内，于19世纪末普遍出现了发展危机；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失掉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社会矛盾和危机在加深。据统计，它们的平均增长率由1870—1890年的6.3%降为2%左右，工人失业率达到10%以上。[②] 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面对这种新情况，除了运用传统的战争手段向外转移矛盾，还没有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和新手段（如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二是，用传统的战争手段向外转移矛盾的最大障碍是，列强已把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瓜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对立的政治军事同盟用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方式重新瓜分利益范围之外，可以说别无选择。这种敌对的两大同盟，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之后就已基本结成，也就是以德、意、奥为一方，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军事同盟敌对关

① 考茨基：《社会革命》，北京，1980年版，第85—90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系。进入20世纪以后，美日也同时崛起，作为新兴强国加入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

1914年，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他提出的著名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1] 凡是不同意这个口号的，列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当时西欧的工人政党由于已经参政，并且分处两大战争集团，战争的胜负直接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他们不可能一致行动，共同起来用国内革命战争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列宁的认识脱离这一实际，过于理想化了。

列宁的认识失误，无疑对列宁的理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根源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危机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有失偏颇。这一时期列宁的代表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我们通常说的《帝国主义论》)就有这种缺陷。这部著作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作了极有价值的具体分析，但是历史证明，由于他判定资本主义已经普遍进入"垂死"阶段，他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也就过于乐观了。列宁不再强调俄国革命的民主革命内容，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列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2]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第26卷，第45—46页；第29卷，第92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第27卷，第323—324、326、327、437页。

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列宁虽然仍保持着对俄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例如，他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 但是他认为，俄国革命可以"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2]

当时，列宁对俄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是这样看的："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3] 列宁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寄予了特殊的希望："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德国无产阶级是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4] 总之，列宁当时的思想是世界革命由俄国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紧跟上。

（五）十月革命的民主革命发动口号问题

通行的说法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国际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突破。我基本上同意这一说法，但我认为它太笼统了。198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基本观点是：（1）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进而扩大到世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9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91页。
④ 同上书，第92页。

界东方）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迟早是要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2）十月革命只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3）后来，斯大林模式是对军事共产主义和沙俄传统的回归。[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强。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农大众，在所有列强中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最尖锐。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俄国工农大众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受性质不同、程度更为严重的多重压榨。他们既要承受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暴力统治，又要忍受政治上严重依附于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除此之外，他们被专制制度驱赶去充当俄国扩张主义战争炮灰的频率和规模，更是世上罕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上述矛盾空前激化，俄国社会陷入深重危机而不能自拔。从历史资料看，二月革命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领导下发生的，是像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那样的群众的自发行动。各种政党是有的，但是革命不是由其中某个政党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的。相对而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影响较大。

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肯退出大战，在土地问题上不肯满足农民的要求。沙皇俄国本来就是外债沉重的国家，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伙同专制制度，为了购买军火，再向英、法、美、日大举借债，旧债加新债，单是支付利息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它使俄国（包括临时政府）的政策更加依附于债权国。当然，这些负担只能转嫁于俄国居民（皇室财产除外），使得居民纳

---

① 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三期，第72—89页。

税额直线上升。1917年税收额达到国家总收入的53%。[1]

推翻临时政府，争取苏维埃的主导权，进行一场暴力革命，使社会彻底摆脱危机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到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了。早在80年代，前苏联就出现了一股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我认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看到，当时在俄国进行一场更彻底的革命，已是“瓜熟蒂落”了。

本文想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十月革命的指导理论和革命内容的关系。

如上所述，列宁一直认为俄国只是一个“农民国度”。在一战前，列宁一直认为需要进行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战爆发之后，他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即使俄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否能够改变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我认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夺取政权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说明，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已经不再那么重视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民主革命内容了。

继上述我们引用的《给瑞士工人告别的信》之后，列宁回到俄国后写了著名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他首先提出，临时政府决不会退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着说，必须“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要缔结真正民主的而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2] 他认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

---

① 费多索夫：《19—20世纪初苏联史》，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第31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3—114页。

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①] 请大家注意，列宁这里说的“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推翻资本”，虽然容易引起误解，但认真研究的话，实质上主要指的还是政权问题，即革命的政治性质和阶级领导权问题。

由上述可见。是战争造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机遇，但是战争并不能使俄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上超越“卡夫丁峡谷”。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达到成功的结合，开创了人类历史，特别是东方受压榨最深、最落后国家的新纪元，但是仅仅是革命本身，并不可能根本改变它们落后的经济面貌，在最好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能够加快改变落后面貌的进程。这当然主要取决于共产党执政后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虽然已把俄国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使用的动员工农大众进行革命的口号，就完全是民主主义的，即“面包、自由、和平”或“面包、自由、和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②] 不如此，就很难想象，布尔什维克能够动员起广大的工农群众。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农民和土地的态度问题。它是经历过相当复杂的曲折过程的。虽然列宁一直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度”，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城市，这固然同当时的斗争条件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同长期困扰布尔什维克党对个体农民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基本认识有关。直到1920年4月，处于国内战争末期的列宁还认为：“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77、78、115页。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 只是到了1921年3—4月，列宁才明确地提出："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2] 也只是到了这时，才可以说，列宁找到了在苏俄建设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农民政策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所表现，是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拥有优势影响，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四月提纲"就是一例，当时列宁提出，"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3] 这个纲领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响应，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影响极微。只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分裂出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它反对右派的战争政策，而坚持其原有的土地政策。由于布尔什维克接受了这一政策，从而解决了布尔什维克同广大农民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在十月武装起义时召开的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会有列宁以下的说法："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4] 可见，直到1917年十月起义后，列宁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四月提纲"的主要思想，可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并且尊重农民的要求。不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页。
② 同上书，第41卷，第377页。
③ 同上书，第29卷，第115页。
④ 同上书，第33卷，第20页。

过，如上所述，1921 年 3—4 月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际，列宁才根本转变了对土地—农民的看法——当然，他的转变并不是照搬照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平分、再平分土地），而是走得更远：以农业为基础逐步引入市场交换机制。

（六）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

本文一开始就强调，十月革命无疑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主要是在三重意义上说的：(1) 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进行的；(2) 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3) 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俄国的特殊国情同样决定了，在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必然是“特殊的”，绝不能照搬本本，或者从空想或“理想”出发，更不可使俄国的旧传统改头换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加以包装，冒充社会主义。

过去，由于受到斯大林著作以及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书籍的影响，特别是大量关于苏联模式理论的影响，一般都认为，1921 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其经济崩溃，被逼无奈而采取的暂时退让政策。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由于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了苏俄经济崩溃，那么除了新经济政策这种“退让”之外，苏俄也是别无选择，这本身就含有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

首先，十月革命前，列宁期待过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开始“烟消云散”。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大战的结束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调整国内的社会矛盾。列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反思说：“国际关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

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①]

就是说，苏俄不能再期望“世界革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自己。

1921年4月，即在俄共十大闭幕不久，列宁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谈了：（1）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实质；（2）对国外资本实行租让制（国家资本主义）；（3）国家产品私人代销制（私人商业）；（4）对国内资本实行国有资产租赁制。[②] 从此以后，列宁不断地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直至他失去工作能力。

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经济，虽然不断出现困难和矛盾，但整体说来，是繁荣的，给人以巨大吸引力的。连许多对十月革命持反对甚至敌对立场的人，例如，“路标转换派”，[③] 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了。

新经济政策不局限于国内政策，在短短的两年内苏俄的国际环境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苏俄参加了1922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与德国签定了拉帕洛条约。还有，俄共和共产国际开始改善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关系。

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列宁提出并且发展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研究他一贯地、主要地坚持俄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坚持俄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思路里，去寻找列宁学说的内在逻辑，——尽管这期间，列宁也有过摇摆甚至各种失误。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89页。

② 同上书，第41卷，第208—216页。

③ 关于“路标转换派”的情况，可详见姚海：《路标转换派及其评价问题》，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4页起。

当然，我们今天肯定列宁的思路，特别是他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建设思路，并不是说新经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用邓小平的概括最为恰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指出，由列宁开始的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新经济政策路线，在列宁逝世不久，就被斯大林抛弃了。是斯大林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歧途，终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历史性悲剧。

二　俄国革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堪与之相比的是90年代初苏联的瓦解和苏共的下台。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件大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苏联也不例外。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苏联注定要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结局完成它的生命过程。现在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句号。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对本世纪发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革命，对本世纪历史起过如此之大作用的大国，为什么竟然会在短短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成了所谓"世纪之谜"。全世界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马克思自己曾多次声明过，他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他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这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②

从19世纪末起，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俄国的现实中去。

---

① 这是一个大题目，可以一直写到苏联剧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述革命初期的问题，部分涉及20—30年代。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的理论俄国化。这是一个艰苦的探寻过程。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使之俄国化，特别是把它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上，就露出了他的书生气。列宁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有成功和失败，有反复和曲折，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还在孜孜以求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俄国革命的先天不足

1. 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物质前提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带有严重的封建农奴制残余。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改革并不彻底，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农民多数仍在村社从事宗法式经济。1905 年俄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但主要在几个大城市，农村的革命滞后，革命终于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得到解决。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改革，力图摧毁把农民束缚在农村的村社制度，使农村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也没有能进行到底。革命没有能解决的问题，沙皇政府同样无法解决。

俄国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文盲众多。农业提供国民收入的 51%，而工业只有 28%。在世界经济中俄国是农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无产阶级约占人口的 1/5，其中产业工人约 360 万人。农民占人口的 69%。据 1897 年进行的人口调查，俄国文盲人数达居民的 75%。尽管在 20 世纪初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发展教育，但到 1920 年每 1000 人中识字人数也仅从 1897 年的 223 人增加到 319 人，即仍有 1/3 以上人口为文盲。这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个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

2. 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够

从本世纪开始，摆在这样一个国家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对这一点，列宁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之前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俄国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为准备和进行这场革命，列宁结合俄国的国情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理论，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方针。在革命失败以后，又对革命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尚未结束，未来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不断告诫全党，不要跳过民主革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列宁的判断是以对俄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为依据的。正因为俄国落后，所以甚至对俄国的民主革命列宁也只把它看作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列宁反对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大战期间也反对过布哈林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

1917年俄国突然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改变了方针，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

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不仅对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人来说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即使对列宁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缺乏准备的。因为，从1905年以来，列宁一直在做民主革命的文章，始终坚持革命分两步走，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对俄国的民主革命列宁做了非常具体的策划，如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敌人和可以争取的盟友，革命的起义机关，革命胜利后的政权组织，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然而相形之下，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讲得相当一般和抽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迫切任务是民主革命，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就提出一大堆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而在那时看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相当遥远的任务。

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1917 年 3 月中旬，列宁在回国之前发表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上还说，“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是，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①就在这年初，列宁在《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1917 年 1 月 22 日）中，在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② 这不是列宁的悲观，而是对当时形势的估计。

诚然，列宁在 1915 年 8 月 23 日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③ 次年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 年 8 月 22 日）中重申这一论断。④

不过，列宁这个论断是针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的，是给它们，而不是给俄国提出的任务。正是在作出这一论断的同时，1915 年 10 月 13 日列宁在《几个要点》中明确无误地继续为俄国规定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他写道：

“俄国当前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9 卷，第 90 页。

② 同上书，第 28 卷，第 333 页。

③ 同上书，第 26 卷，第 367 页。

④ 同上书，第 28 卷，第 88 页。

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①

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宁始终是以这个观点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的。列宁的做法没有错，是符合俄国的国情的。问题在于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列宁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这一来马上就暴露出全党的准备不足。

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看到了世界大战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的机会而提出的。但怎样进行这场革命，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列宁自己也是看一步走一步，边干边制定，逐渐完善的——有点边画图纸边施工的味道。有关社会主义的稍微具体一些的理论和策略，都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制定的。列宁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是在形势的逼迫下，加紧进行的。如国家问题，在布哈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成果之后，列宁在短时间里还指责布哈林关于"炸毁"国家的提法为无政府主义的提法。实际上"炸毁"是恩格斯的用语，布哈林之所以在 1916 年初着手国家问题的研究，显然是同他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他需要弄清楚，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前后应如何对待国家。稍后列宁也感觉到了这种需要。所以从 1916 年年底开始，加紧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甚至在 1917 年领导革命的紧张时日，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笔记，写下了"蓝色笔记本"——《马克思主义论国家》，接着又完成了《国家与革命》。《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和演绎，但在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上似乎有点欠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书中提出的某些主张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只有某些原则，如不劳动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7 卷，第 54 页。

不得食，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得到了实施。而诸如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废除常备军，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工人监督，计算和监督等等，在俄国的现实中显得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些主张不仅在俄国无法实行，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无法实施。

做了充分准备的民主革命理论没有得到实践就过去了，而没有做好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不期而然地来敲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提法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以至于列宁不得不展开反对“老布尔什维克”、“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最典型的“老布尔什维克”是加米涅夫，部分地还有斯大林。其基本论点就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不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编辑的《真理报》在发表列宁的《四月提纲》时声明：“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老传统，首先应当对所发生的事件作一阶级分析”。他说，分歧就在于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而他认为没有结束。因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国家还没有改造成民主社会，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政权就应当转入无产阶级手中。[①]

应当说，加米涅夫的说法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老传统”，又符合“老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

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还受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普列汉诺夫声明，“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

---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 页。

主义馅饼的面粉”。他在5月20日写道：“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而俄国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据说只有柯伦泰一人，不过看来应当还有和列宁一道回国的季诺维也夫。

列宁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解释，说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完成了，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了。列宁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从社会革命、社会经济形态转换的角度看，仅仅着眼于政权的改变是不够的。显然，列宁这里已经放弃了他长期宣传的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主张，也放弃了必须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才有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日程的主张。他的着眼点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所形成的局势，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他看到的是当时出现的夺取政权的现实机会，而不是书本上（包括他本人书本上）所规定的革命步骤、顺序。

由于全党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严重不足，在整个1917年的革命过程中，列宁几乎每走一步都要遇到阻力，都要为贯彻自己的主张进行顽强艰苦的斗争。

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上，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号召无产阶级监督临时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揭穿临时政府压制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一切企图。斯大林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举行和谈。加米涅夫号召士兵“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他们的逻辑很清楚，既然现在还没有到推翻临时政府的时候，那就只能对它实行监督。而列宁所遵循的是马克思的策略，必须随时随地提出比当局更激进的要求，对临时政府的任何措施只能表示不信任，所以根本谈不上监督的问题。

正因为对民主革命是否结束这一根本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所以在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问题上，列宁同中央委员会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1917 年 9 月 25 日—27 日列宁给中央写信，指出应当把“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1] 对于这一事关革命命运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一直迟迟没有作出反应，这迫使列宁在 10 月 12 日再次致信中央，“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进行武装起义的鼓动自由。[2] 在列宁的强烈要求下，中央委员会才于 10 月 23 日和 28 日先后召开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加米涅夫和多年来一直同列宁在一起工作的季诺维也夫在两次会上都表示反对这一决定。为阻止起义，加米涅夫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答记者问。这实际上是《四月提纲》争论的继续。

争论并没有因为武装起义的胜利而停止。11 月 7 日宣布国家政权归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立即爆发了成立什么样的政府的争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反对“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支持成立一个由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组成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

以上争论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但性质是相同的。反对派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因此，(1) 革命不应当立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2) 应当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举行武装起义。(3) 武装起义胜利后组织的政府，应当是有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列宁和他的反对者的逻辑都是很清楚的，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路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请注意，分歧发生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第 32 卷，第 234 页。

② 同上书，第 278 页。

在党的最高层，发生在列宁的战友中。别的不说，这至少说明了由于事变的急速发展，列宁周围的人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严重不足，包括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在领导人中间跟上列宁的步子的只有极少数人，这就是原先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的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正因为如此，在 1917 年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两人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在党内没有引起争论的惟一一个大问题是土地纲领。长期以来布尔什维克党都是以土地国有化作为自己的土地纲领的。但是国有化不符合俄国农民的传统，广大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只有在满足农民的这一要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指望革命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布尔什维克政府就直接借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①] 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是因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属于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面临夺取政权的时候才借取其他党派的纲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革命的过渡转换相当迅猛，在最后关头不得不放弃自己多年的纲领，而借用他人的纲领。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下夺取政权的。新政府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提出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的要求，声明"要极力坚持我们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是临时政府垮台的原因之一，所以立即实现和平在党内并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进入实际谈判的时候，德国依仗其军事优势，要求苏维埃政权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怎么办？党内外有一大批人坚决反对签订这样的和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是原先在革命问题上坚定地支持列宁的人，如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还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3 卷，第 41 页。

俄国进行革命时有一个基本估计，即俄国的革命仅仅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俄国的革命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这是当时全党的共识。因此，在同德国谈判时，相当多的人就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马上发生革命上，认为只要再坚持几天，德国革命就会爆发，俄国革命就会得救。而作为革命者不能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至少不能不战而降。为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即使牺牲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在所不惜。分歧是策略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尽管也是事关俄国革命命运的大问题。

列举这些分歧，目的是要说明，二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但各方面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党内的认识不统一，整个革命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在摸索中前进，在摸索中完善，并不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进行的，实际上革命也不可能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进行。但是，从这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俄国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先天不足的。这种先天不足不仅表现在革命的理论准备上，而且更严重地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上。

（二）革命的后天失调

1. 无法实现的世界革命蓝图

革命取得胜利后，进入政权和经济建设以后，这种缺乏准备的状态就更为突显了。

在执掌政权以后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失误。

经济前提的缺乏，迫使布尔什维克党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特别是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上。在革命前后，列宁多次强调，只有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俄国。这样，在十月革命之初，就把很大的一份精力用于发动世界革命上。成立了共产国际，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策划和发动世界革命。这里所说的世界革命并不停留在宣传鼓动上，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去发动革命，包

括进军华沙，试图通过波兰直接向西方输出革命；派人去德国组织领导暴动；组织武装纵队，准备通过阿富汗进入印度，策动东方革命，等等。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和策动下），西方在短期里出现过革命的浪潮，但远不足以震撼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列宁直到逝世前仍没有放弃对西方革命的期望，只是在看到西方立即革命无望的情况下，暂时把希望转向东方。而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甚至在1923年10月还在德国搞了一次不成功的暴动。在苏联的历史上，“世界革命”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历代领导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打过“世界革命”的旗号。有的是希望“世界革命”来帮助落后的俄国，有的是让“世界革命”或其他国家的革命来保卫孤立的苏联，有的是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推行对外扩张，侵占他国土地，干涉他国内政，同西方进行军备竞赛，等等。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世界革命的方针在实践上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大伤了苏联的元气。

2. 不成功的模式——军事共产主义

理论准备的不足，特别是对像俄国这样的落后的农民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心中无数，这就使得很容易走上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史学家断定，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是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引起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是余粮收集制。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过实行粮食垄断的建议。实行粮食垄断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开端，而这一措施的实施是在国内战争爆发之前。1918年5月9日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禁止粮食买卖。而国内战争是从5月25日捷克军团叛乱开始的，此后各地叛乱蜂起，进入了国内战争状态。从时间顺序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共产主义措施的出现早于内战。这就说明虽然军事共产主义同内战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它的具体化和加强），但更主要的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在起作用。从此以后各种“共产主义”的措施陆续出台，实现了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

集中到国家手中的设想。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实施的一些措施被看作共产主义的措施。当时认为，只要对全国的生产和分配进行集中的管理，就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这些措施并没有因为国内战争的结束而取消，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之际，反而大大强化了。列宁后来总结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①

这样就把一种错误的设想，把战时的军事体制当成了共产主义。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许多国家都曾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当时就有人认为这就是"军事社会主义"。而一旦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靠军事强制手段实行的全国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当然就更是"共产主义"无疑了。因此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后来就被叫做"军事共产主义"。这成了俄国革命后天失调的重要因素。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其一系列具体措施，有更深远影响的还有与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出台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在广大干部中"左"的激进思潮广泛传播，如禁止一切买卖行为，把凡是有余粮、出售余粮的农民统统当作富农投机商，甚至人民的敌人。组织公社、集体农庄。在农村执行反对富农、中立中农的政策。把农民看作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因素，把小生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大敌，等等。这样就把很大一部分农民推向敌对阵营，致使农民喊出"打倒康姆尼"的口号。正是在白卫军被打垮，国内战争取得基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1—182页。

本胜利的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各地政府不得不开展“剿匪”斗争。

军事共产主义是靠军事强制手段推行的一种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军营。这套制度的领导力量是俄共（布）。那时的俄共自身实行的也是“战斗命令制”。党内没有民主可言，国内更谈不上民主。只是由于列宁本人作风较为民主，所以俄共的领导在决策时比较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例如，在国内战争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每年都定期召开，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还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中央全会也按照规定召开。在中央委员会难以召开会议的情况下，重大决策通过电话或书信表决。制度是不健全的，但列宁尽量把其消极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然而民主毕竟是个问题。这成了党内斗争、党内争论的一个经常性话题。党内出现“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1921 年初发生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都同民主问题有关。然而，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导致党内民主的发扬。频繁的党内斗争、党内争论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反而成为加紧党内控制的根据和结果。俄共十大关于推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被束之高阁，而关于禁止派别集团的禁令为后来的个人独裁提供了“尚方宝剑”。为改善党的领导，列宁曾强调把党政分开，但这一要求始终没有得到贯彻，列宁逝世以后，党政权力反而集中到总书记一人手中。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要求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以防他滥用权力。但由于派别利益的驱使，党内高层领导没有人愿意执行列宁这一有远见的主张。其恶果无须详说。

进入 20 年代，革命之初的两项重大决策的消极后果已经突显。西方各国的革命陆续被镇压下去，世界革命的期望没有得到实现，俄国革命没有得到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援助。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对，各地农民暴动尚在平息中，1921 年春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暴动。这次暴动同内战中以原沙皇将领为首的白卫军叛乱有所不同。喀琅施塔

得在十月革命期间是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基地，是革命的堡垒，其水兵是革命的主力。在国内战争期间水兵构成了红军的骨干。他们大多来自农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知道余粮收集制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情况。他们对在内战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仍在大力加强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深感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行政策。本文不可能全面评价这次暴动的是非，但水兵们的情绪至少反映了广大农民以至工人的情绪和要求，相当充分地说明现行政策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列宁是清醒的，他承认国内出现了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原因是“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①] 这就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把本来已经在酝酿中的改革迅速敲定，付诸实施，用粮食税取代了余粮收集制。尽管这还不是完备的新经济政策，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从此，商品货币，经商贸易，组织做买卖的合作社等等措施，就陆陆续续地出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进了市场机制，形成了同军事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建设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第二种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出现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国内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20年代末，某些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问题当然还有不少，但整个经济形势处于繁荣发展的状态。应该说，新经济政策是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俄国经济的一副有效补剂。

革命的先天不足是个事实，问题是如何对待。在1917年夺取政权的紧要关头，有一些理论家指出过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那时列宁没有同他们展开争论，而是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先把政权夺到手再说。这充分显示了列宁作为革命家的气概和灵活性。但问题是存在的。列宁在逝世前又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4页。

的革命问题，在《论我国革命》的文章里，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①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不是否定这个论点，而只是改变一下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创造前提。为此列宁一再强调，要把工作的重心转到"文化主义"上去，"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②

对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

邓小平说得对，列宁积其建国5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这一极端重要的结论，没有被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所理解和接受。斯大林在打倒所有的反对派之后，于1929年底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又回到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上去。他把整个国家纳人阶级斗争的轨道，把整个30年代变成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经济上不去，连年饥荒，斯大林不去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这一严峻的形势，反而在国内实行大镇压。其恶果甚至直接造成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败绩（缺乏懂得现代战争的高级将领）。集体化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根本方向的错误，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建设合作社的方针。工业化的代价太大，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和斯大林模式的建立，使后天不足的苏联，更是雪上加霜。

3. 变本加厉的"左"倾顽症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共本身存在两种倾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71页。

② 同上书，第3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向——“左”倾和右倾。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当时的列宁非常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然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很难被西方民主制下活动多年的社会民主党所接受。他们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指责引起列宁的极大反感，他写了不少文章和专著去批驳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去对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革命初期列宁对右的观点是看得很重的，把它作为批判打击的主要方向。

相比之下，列宁对自身队伍中(包括共产国际)的“左”的表现，却看得比较轻。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左”倾的种种表现提出了批评，但其主要内容限于与夺取政权有关的问题，如议会工作、工会工作等等，而较少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方针问题，具体地讲，还没有能够去反思以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为集中表现的国内的“左”的思潮。即使受到批评的左倾病症，列宁也仅仅认为是一种“幼稚病”，是运动处于孩童时期的疾病，一旦长大成人，疾病会自然而然消失。这个诊断显得太轻。诚然，在革命高潮中，人们比较容易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而在落后国家尤甚。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左”倾远远不是“幼稚病”所能概括和包容的。实际上，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顽症，一种越来越加剧的狂症。国家越穷越急于改变现状，生产力发展不了，就抄近道改变生产关系，用人为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的不发达，因此阶级的消灭也必须从发展生产着手，而列宁的后继者却企图借助于暴力，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去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和富农。列宁主张用做买卖的合作社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其后继者却用暴力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把集体农庄作为国家从农民手中取得粮食的连环保组织，集体化的结果是使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工业化是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补课措施，应当根据人力物力的可能，

在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斯大林的工业化却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置轻工业和农业于不顾，使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的状态之下。斯大林所规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他过去批判过的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遮掩下，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同时，却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对自己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消灭了列宁时期的整整一代老近卫军。这一切固然可用一个“左”字加以概括，但从“左”右两个角度看，他们都确实不是什么幼稚病，而是接近疯狂的“精神病”。

而被当作“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主张，却往往是一种清醒剂，是对这种“左”倾顽症的一种抵制，如当年反对盲目暴动的德国的列维，敢于同斯大林争论的苏联的布哈林。社会主义无论政治和经济都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的，这里对资本主义既有否定，也有继承。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予以彻底否定，未必妥当。事实证明，尽管过去一直说苏维埃民主制比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民主几百倍，但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表明，苏维埃民主制很快就蜕化成一种个人独裁制。

所谓行政命令体制，其核心是强制，是暴力，是企图用暴力和强制去推动历史的“发展”。恩格斯对杜林的暴力理论有过严厉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成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①]很遗憾，苏联政治权力的使用属于第二种情况。斯大林所采取的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种措施不仅没有能弥补俄国革命的先天不足，反而加剧了国家的后天失调，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终于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先天不足的革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俄国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个是理论准备不充分。与此有内在联系的是革命的后天失调，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和世界革命的方针，尽管它们都有其产生的理由和环境，但历史表明，两者都是脱离俄国和世界实际的无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革命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左”倾思潮。列宁是现实主义者，他很快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认俄国的落后，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及时地改行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摸索出一条比较符合落后俄国实际的模式。可惜，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坚持下去。在早期所实行过的两种模式中，选择了恰恰被列宁否定掉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从30年代开始，苏联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正是这种僵化的模式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引向崩溃的道路。

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

（一）前　　言

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着它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遭遇过不止一次的挑战，但都没有这次大。

巴黎公社失败是第一次大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科学地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对于他们的理论做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并制订出新的战略和策略，为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了新前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大挑战。列宁根据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向垄断统治的新特征，和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所造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修改和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过时的原理，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和策略，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苏联解体是马克思主义迄今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3天，而苏联的兴亡经历了73年，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这期间，先后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近半个世纪且具有世界规模的冷战，以及苏联兴起和灭亡所波及的种种风浪。苏联的兴衰成败，它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中的内外政策实践，世界在这近百年间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及其对苏联的影响，等等，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不

断推向前进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深入地研究苏联兴亡的历史，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义不容辞的任务。

鉴于这一任务极其复杂艰巨，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本文仅就引致苏联兴亡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或能在方法论上引起点讨论，抛砖引玉，是为至幸。

（二）革命转变问题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落后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且还存在着村社式的农奴制残余，列宁称之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指出，俄国需要经过民主革命再转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争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便能实现这一革命转变。1905—1907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但临时政府倒行逆施，不仅没有为民主革命做什么事情，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底到1919年底，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令，展开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军，想就此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均体现在列宁的有关论著和1919年制订的俄共第二个纲领之中。不久，内战爆发，便顺势实行“军事共产主义”。

内战刚近结束，在革命堡垒列宁格勒的喀琅施塔得就爆发了水兵叛乱，各地也纷纷发生农民骚动。形势迫使俄共退而转向新经济政策。

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如果以前想依靠苏维埃政权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429页。

“犯了错误”，而现在则是过渡的“过渡”。[①]“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惟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历史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②]

这意味着，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一掌握政权就搞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似乎太急促了些。俄国当时还缺乏实行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文化水平。只要条件具备，时机有利，无产阶级就应该夺取政权，不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掌握政权后，怎样寻求各种过渡形式，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夺取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者也不能等同起来。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晚年说得更加清楚。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使无产阶级能够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预见到，在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要比革命花长得多的时间。这一点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能长期坚持下去。国内外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评，遍布国内的富民强国梦，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致列宁在世时即提出将从新经济政策的退却转向进攻。他一逝世，一场大争论就在俄共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展开了。

小结：列宁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胜利理论，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胜利的理论，已由俄国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则被俄国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是照搬书本和群众富强梦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1—572页。

② 同上书，第617页、684页。

(“革命热情”)影响下产生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表现。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说明它承认还需要长期探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开始从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但由于缺乏从实际经验上理解社会主义，对新经济政策的客观必要性并未有深刻认识。后来的发展表明，对于俄共领导层来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仍是被迫的短暂的策略，而不是自觉的实验和探索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大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真正途径”。

（三）大争论：党内权力斗争和新经济政策的结束

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在急剧展开的党内争论和领导层的权力斗争中结束了。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革命推迟的条件下，俄国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场争论实际是十月革命以来争论的继续和发展。

俄国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集中在如何对待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即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上，以及国家对农民的政策问题上。一派（以布哈林为代表）的观点是，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放慢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步子，调动个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强工农关系。另一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则认为，没有欧洲革命和发达国家的援助，无法解决工人同农民的矛盾，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宁可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1925 年俄共十四大采纳了后一观点，提出“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和加快实行工业化的方针。

为了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实行了通过税收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增加资金积累的政策。结果，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发生了粮食危机，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于是，在农村加紧推行集体化。1927 年底俄共十五大提出限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

推进小农户向“大农庄”和“集体耕种制”的转变；1929年又提出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斯大林为此发表题为“大转变的一年”[①]的讲话，几个月便基本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实际上实行了托洛茨基的剥夺农民的政策，这是苏联农业长期不振的重要原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是在俄共领导层内尖锐的权力斗争中进行的。斯大林依靠俄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富强梦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先利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解决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把托洛茨基从权力中心排挤出去；再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联合起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托洛茨基联盟搞跨；再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击败，最后收拾掉布哈林一派人。到1929年底俄共十六次大会上终于建立了以斯大林的个人权威为基础的俄共中央(政治局)集权制。这种集权制不仅包括了党政军民学，而且体现在从个人到企业、农庄，再到各部门、地区直至苏联整个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上。

小结：从列宁逝世到30年代初这十年间，斯大林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恢复调整和1929—1933年的大萧条，加快经济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扩大了苏联在世界的影响，这都是好的。但过分突出重工业的工业化，特别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组建集体农庄，并同时对富农加以镇压流放，造成了大饥荒和数百万人的死亡，这些消极面也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同时，在党内斗争中采取粗暴的做法，利用经济建设的成就培育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

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和强化了原本在沙皇俄国就存在的国家官僚制度。

这样，从十月革命开始，特别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提倡的

---

① 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0页，第71—82页。

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探寻搞社会主义的途径和试验过程，便在斯大林的行政命令式集中制和粗暴压制党内民主的做法中结束了。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那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随之消失。

（四）"左"的教条的制度化和斯大林的"党八股"

到30年代末，苏联在20多年的和平发展中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宣布俄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认为，他已经在苏联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并且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①]

1936年，制订了苏联新宪法（又称斯大林宪法），把这一现实用法律的形式记录和固定下来。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完全形成了。[②]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式出版发行，把斯大林的理论体系用钦定教科书的形式规定为全苏联以至整个第三国际都要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从此以后，苏联的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电影等，都以注释、阐发、宣传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颂扬斯大林的功绩，美化斯大林的形象为主要宗旨。

这种情形随着1935—1938年的大镇压而愈演愈烈。大镇压把国家机器用于党内和思想斗争，在国际共运史上开了先例。

什么是斯大林主义或模式？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斯大林的理论原则和政策实践，便不难看出，斯大林的基本思想和理念主要来自1919年俄共八大所制定的

①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236—240页。

俄共纲领（即第二个纲领），这个纲领中关于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些内容大部分是搬用马克思对西欧发达国家有关论述。如按全国统一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把小农联合成大农场、把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尽快消灭货币，组织全国消费公社，……这些纲领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进一步强化了。[①] 也可以说，斯大林在 30 年代初加以制度化的许多东西，是在新的条件下以稍为缓和的形式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已实行过的东西。其次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如剥夺农民（通过集体农庄和国家拖拉机站），把工会变成附属于政府的官僚机构，等。还有就是发展了沙皇俄国的官僚主义集权制和个人专权，斯大林发展了沙皇俄国的国家官僚机器。最后，就是把新经济政策的某些元素如商品货币关系加进这种高度集中制作为补充。须要指出的是，斯大林虽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批评要求取消卢布的观点，却在 40 年代中镇压了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保留价值规律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只是到了他临死前一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要存在一个时期的必要性。[②] 简言之，斯大林主义是“左”的教条主义同消极的俄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或者说是在军事的封建的落后大国俄国环境中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它把许多俄国文化中的消极东西附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了。悲剧就在于，这些在苏联运用的理论和政策，这种苏联模式都被斯大林当做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强行向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推广。

小结：斯大林宣布建成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背离了马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747—752 页。参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 年版，第 390—406 页。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中文版），下册。

克思主义，是“左”的教条主义同右的俄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付出了过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由于消极因素太多（特别是过分强调国家机器和政府官僚机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手段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窒息了党内外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又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维护，长期得不到改革，终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五）从“父子党”、“父子国”到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

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和民族平等和互助的政策，完全恢复了沙皇俄国的大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对内实际上取消了苏联成立时宪法有关民族自决的规定，造成苏联各少数民族同俄罗斯间的隔阂和矛盾。不仅实行民族歧视，甚至对整个民族实行镇压性惩罚和流放。对外，把兄弟党变成“父子党”，兄弟国变成“父子国”，都得听从莫斯科的命令，有的连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也要由莫斯科指定。这早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

尤有甚者，同西方帝国主义共同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一些弱国。如1939年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和苏联并吞波罗的海三国。1945年同美英达成划分战后努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等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直接出兵侵略阿富汗，在万里之外的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同另一超级大国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为了对外扩张和争霸，不顾国内人民生活，大搞军备竞赛，使国民经济严重军事化。苏联经济力量大约为美国的1/2，而用于军费的开支则同美国不相上下。1913年俄国重工业只占其全部工业的35.1%；轻工业占64.9%。而苏联70多年间，除1928、1946、1950这三年轻工业占了工业比重的30%以上以外，其他年份轻工

业产量只占工业产量的大约25%上下。[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说，苏联每七家企业中只有一家从事民用生产。这是苏联国力消耗过度，促成其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结：斯大林主义或模式必然包含着对内压迫少数民族、对外实行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毒瘤。斯大林自己所追求的就是努力恢复当年沙皇俄国的版图和国际地位。苏联同美国争霸，使苏联各族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六）积重难返：改革——解体?

斯大林模式是很难进行自身的改革的。改革比较成功的是那些本来就不那么遵行这个模式，而且能够真正从本国实际出发探寻建设社会主义途径的国家。

苏联最早提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可他搞了十年改革还是失败了，以自己垮台而告终。赫鲁晓夫的改革不过是一场唯意志论的闹剧。它的积极作用只在于：大大动摇了对斯大林的偶像崇拜，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揭示出这个模式的一些阴暗面。赫鲁晓夫改来改去，并没有触动苏联旧体制的重要部分，甚至连皮毛也损伤甚少。如僵化的计划体制、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和高度中央集权制等都原封未动，甚至连重工业过分突出的问题都未能碰一下。解散拖拉机站的同时反而大规模合并集体农庄，强迫农民广种玉米。结果增加了许多新的矛盾，只得不了了之。

勃列日涅夫的18年，重新修补斯大林模式，腐败盛行。他加强了对外扩张和争霸，投入更多物力财力搞军备竞赛。苏联在表面上实力更强大的掩盖下，国内矛盾积累更多，国家基础更加脆

---

① 参见陆南泉等著：《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6—1990年。

弱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经济连年滑坡，市场供应紧缺，人民对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欧美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而日益不满。

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失败了，最后连苏联这个存在了 73 年之久的大国也给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本文不打算多谈。看来，除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根子太深，力量太大，既得利益集团太过顽强等等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找到有效进行改革的路子即战略和策略，也没有组织好实行改革的战斗队伍和社会力量。他一会儿搞经济改革，几天之内颁布几十条从企业到中央各经济部门的改革法令。由于遇到企业利益、部门利益的抵制而无法推动。一会儿转而搞政治改革，大搞“公开性”和“民主化”，一下子把苏联模式积累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统统暴露出来，既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又削弱了各级党政的领导和行政能力，还引发了新的利益关系重组。终于发生了“8.19”政变，使苏联在短短三个月便灭亡了。

一个存在了 73 年，拥有近 2000 万名党员和近 2000 万团员，有 300 多万用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有成千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数以千计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庞大的工业基础，世界上惟一能够同美国进行政治军事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就这样亡了。回想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才只有 20 万多个党员，只能影响很小一部分军队，就取得了胜利，今天这么大的苏联竟然毁于一旦。这里有多少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教训！但是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条教训应该是：他们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具体情况和世界潮流科学地结合起来。他们犯了“左”的错误，长期照搬马克思书本中的某些词句，把它当做教条来奉行，急于在落后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也犯了右的错误，从开始到

临终都没有摆脱俄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东西，对国家的迷信即沙皇俄国的国家主义，对沙皇俄国皇权的崇拜（斯大林说农民最信奉的是皇权），实行个人专权的中央集权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扩大和加强了沙皇式的国家机器，行政命令高于一切，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长期信奉并努力实行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和帝国主义扩张。一左一右，相互补充，形成斯大林主义和无法改变的苏联模式，最后走上灭亡之路。一句话，从苏联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历史看，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或不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或者有时理解有时又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七）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纵观苏联兴亡史，可以看出，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在 1917—1924 年。那时俄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比以后时期要恶劣得多，革命和社会主义力量要小得多，敌对势力要大得多，但是，整个俄国都在生气勃勃地胜利前进。以后，内外环境更好了，力量对比更有利了，家业更大了，而国家的生气却日渐减弱，以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前后到 1924 年，马克思主义有两大发展和创新：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个别国家取得胜利；一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以他伟大革命家的胆略，勇敢地抛弃过时的理论原则，抓住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不顾那些喋喋不休地背诵书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评和反对，去干前人从未干过的事情。事实表明，在这一时期，列宁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把握住俄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列宁没有屈从任何的思想牢笼和俄国历史文化包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情况（内外环境）的正确结合。

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和党内斗争的胜利，斯大林一方面依靠被“鼓动”和“引导”起来的全社会规模的“俄国富强梦”，一方面依靠集中在他手上的巨大的权力，按照他早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所信奉的，后来又在《俄共（布）八次代表大会纲领》及他的其他论著中进一步补充和强化了的那些概念，坚信即使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苏维埃政权”也能够“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①]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靠着俄国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即被大大发展了的沙皇国家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地推动俄国建成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左”的教条同右的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畸形结合。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依仗强大的专政政权和大规模的镇压及“肃反”运动而得以在较长时期内巩固生长起来。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虽然打着批判斯大林的旗号，实际上还是用斯大林主义来进行“改革”，甚至许诺苏联在 1980 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又后退一步对内加强斯大林主义，对外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侵略扩张，把苏联的社会矛盾和外部矛盾都大大激化了。终于无可救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

苏联灭亡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而是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生生不息，更加壮大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之中，植根于它同国家具体情况的结合及对世界潮流的适应之中。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中文版）下册，第 576 页。

四　列宁与斯大林关于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

苏联模式的失败和统一国家的解体是人类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究其原因可以列举出很多，但根源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课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我们在探询苏联模式失败原因和总结其教训时，也应当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与深化，以此服务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本文拟就列宁与斯大林关于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探究社会主义的科学真谛与扭曲变形。

尽管俄国自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依然很落后，甚至“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①]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仍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其中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一半多，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以上。为此，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及其农村发展道路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农民在俄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②]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三卷，第531页。

② 同上书，第四卷，第722页。

（一）

在较为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确定农民和小农经济的历史方位，又怎样将其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不仅是前无古人经验可借鉴的新课题，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回答与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列宁通过六年的曲折探索，在实践中追求真理与修正错误，最终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苏俄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了思想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和飞跃。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农民和小农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期间，最多只能指望与农民结成军事政治联盟，或使其保持中立；从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目标看，无产阶级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所以，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而后者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①] 通过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尝试，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和军事共产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列宁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农民和小农经济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列宁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小农经济居主导地位的俄国，不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同农民结成军事政治联盟；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更需要农民的参与，无产阶级必须学会与农民（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共处合作，并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他还具体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页；第41卷，第195页。

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小农经济则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新政权应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小农经济开辟新的发展前景。因此，列宁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不仅只是经济政策的改变或纯经济问题，首先“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和小农经济的立场问题；而这种对农民和小农经济看法根本转变的关键是，“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①

正是由于列宁对农民和小农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的根本改变，即在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要走向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靠同农民和小农经济的“斗”，而是与其“和”，从而为寻找工农联盟新的结合点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对吸收农民和接纳小农经济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合作制或集体所有制可作为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度认为，搞大农业（国营农场、农业公社、集体农庄等大而公的组织形式）是摆脱小农经济的救星，也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而自发形成的合作社，只是便于对个体经济“计算和监督”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② 当最初的实践遭受挫折后，列宁开始认识到，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的集体农庄和农业公社，“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③ 这之后，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50、62页；第42卷，第189—190页；第43卷，第362页；《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76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214页。

③ 同上书，第40卷，第177页。

列宁再未提建立农业公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而是寻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20年代初，农民在流通领域实践中创造的合作社形式引起列宁的极大关注，并不再把它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看作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纽带。列宁的最后著作之一《论合作社》（1923年1月）标志着最终找到了无产阶级政权与农民、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即合作社是大有前途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从而实现了引导农民和接纳小农经济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看法的“根本转变”。这时的列宁已经深深感到：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更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农村经济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名目越新就越好，而应当采用适合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并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组织形式——合作社。因此，列宁在《论合作社》开篇便讲道，开始“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现在认识到“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篇不足5000字的文章中，列宁关于合作社的评价用语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巨大意义”等五六处之多。并明确指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合作社“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合作化，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根”。可见合作社在列宁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也正是首先从这个意义上得出著名的结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尽管列宁明确了在落后的俄国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但是又忧虑重重地指出，可是“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至今“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② 以后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忧是很有针对性的，也证明通过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61—36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768页。

合作社把小农组织起来是符合俄国农村实际的正确选择，是引导千百万农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便桥。

最后，确立了广大农民阶层和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列宁不仅找到了俄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与途径，而且确定了具体实施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规则，其核心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合作社应是以商品经济为根基的多样化组织形式。列宁一贯认为，农村合作社首先是“买卖的合作社”，然后才是“由履行商业媒介职能为主的合作社过渡到以履行生产职能为主的合作社”。他在1918年就讲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他在晚年更是强调，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正是由于实现了“私人买卖”这个商业流通原则，“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要抓住商业这个环节，否则“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要“学习经商”，掌握先进的“欧洲方式”而不是落后的“亚洲方式”做买卖的“文明商人”的本领。同时，列宁把这种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合作社看作是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如供销、消费、生产合作社等，它们均为独立的商品经济实体，在其经营活动中有“较多的自由”。[①] 可以这样讲，列宁倡导的农村合作社是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前提的经济组织，而后者又是前者得以生存的基石。如果否认商品经济便是抽掉了合作社的精髓，列宁所讲的那种合作社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农村合作社必须坚持农民自愿参加并与农民切身利益相统一。列宁一贯认为，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阶层，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强迫；在组织合作社时，必须以农民自觉自愿参加为基本方针，而这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46页；第42卷，第74、248页；第43卷，第362、364页。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列宁多次强调对农民"决不可发号施令","实行自愿原则是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等;对不考虑农民利益的作法和行为斥责为"干蠢事"、是"自杀","实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①] 总之,要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引导他们自觉自愿走合作化道路,而不能损害农民自身的利益,更不能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走集体化道路。这二者间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区别。

第三,农村合作社的成长必须以相应的物质和文化为前提条件。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经济的各方面给合作社以全面与"经常地"扶持,其优惠条件"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因为只有这种"名副其实的支持",才能使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拥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农民也才能切身感受到合作化的优越性。同时针对当时苏俄农村70%以上文盲的现实,列宁还强调,"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要在愚昧落后的土地上培养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必须彻底改造文化土壤和文化传统。因此,随着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重心应转向"文化主义",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将是苏俄面临的"划时代的主要任务"。总之,只有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农村合作社的建立才有牢固的基础,它也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从而"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②] 或者说,物质基础和文化前提,犹如列宁所倡导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行走的农村合作社这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四,农村合作化道路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俄国这样较为落后的国家实现合作化任重而道远,因为既缺乏"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也缺乏现代的"文明商人",而改变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210页;第43卷,第362—363页。

② 同上书,第43卷,第263—268页。

这种状况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苏俄农村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可愈越的历史阶段。但是，由于对此缺乏认识，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列宁正是在总结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告诫全党，我们的实践表明，农民“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试图“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上去”，“这不行，要更谨慎、更稳步地前进”，而且“愈慢愈好”。[①] 列宁在晚年更明确指出，“通过新经济政策”实现农村合作化“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其中仅仅使农民成为“文明商人”就“需要整整一个时代”。[②]

简言之，列宁依据苏俄的具体国情和十月革命后曲折实践的经验教训，最终找到了一条较为切合实际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为今后的继续前进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指明了方向。但是，列宁对自己的思想能否得以贯彻落实并不乐观，特别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状况更是忧心重重。列宁的担心不幸得到印证，以后的苏联农村走上了一条列宁所不愿看到并极力避免的另一道路。

（二）

列宁逝世后，他所倡导的合作化在实践上中断了，他所确定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被严重扭曲甚至完全抛弃了，苏联农村走上了被历史事实一再验证的歧途——全盘集体化道路。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苏联全盘集体化的论述已经很多，持肯定观点的声音也几乎听不到了；但是由于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不仅在苏联一国长久存在，而且波及许多国家，以至成为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继续研究探讨苏联全盘集体化的来龙去脉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和历史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0 卷，第 187—189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 770 页。

价值。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多认为，斯大林是在20年代末以全盘集体化取代列宁倡导的合作化道路的，而在这之前他是列宁思想的赞同和拥护者。历史的记载果真如此吗？早在1906年布尔什维克党举行四大前后，确定党的土地纲领时斯大林与列宁就有分歧。那时，斯大林就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废除货币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无情地反对”包括广大农民阶层在内的“一切资产者”。[1] 不可否认，当时的列宁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持相似的观点。这本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还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列宁的可贵与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沉醉于传统观念而不能自拔，而是勇于面对事实与社会实践，抛弃陈旧过时和错误的观念，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在以后的实践中，不仅没有抛弃早期曾有的那些陈旧过时乃至错误的认识，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斯大林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的话，他所继承的许多恰恰是被列宁以后不断抛弃的东西。也正是斯大林这些早期的思想萌芽，为他以后亲自设计安排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自斯大林在以上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涉及到农民和农村问题后，他对此保持了十多年的沉默，直到20年代中期才再次谈论这一问题。这个时期他的核心思想是：为了工业化的需要，农业应当与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应“立刻”和“完全”地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中来。也就是说，工业化是目的，合作化只是手段。这意味着斯大林开始形成不同于列宁合作化的另一条思想路线，并在1924年6月17日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同年10月26日在俄共（布）中央全

---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96—205、209—212页。

会上的演说《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等文献中有充分反映。斯大林认为：为了实现工业化，应通过激烈“斗争”和“拼命竞争的方式”，用强制手段实现工农业经济的“理想结合”；实现工农业结合的途径是，尽快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新的劳动组织形式”，通过在农民中“培植集体主义”的方式尽可能向更高的集体组织形式过渡；而作为工农业结合的中间环节——商业领域，应坚决排斥包括小商人、小摊点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用“纯社会主义”商业将小农经济纳入其轨道。总之，“我们在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获得的旧资本，即精神资本，已经开始枯竭”和“快要用完了”，“我们必须在新的斗争条件下为党创造一笔新资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此，“一般地发展农村的合作社现在已经不够了”，当前的任务是，加强合作社的进程和规模，大力“开展合作社运动”。[①]

苏联20年代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农村应实行怎样路线的争论。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用暴力剥夺手段从农民手中获取商品粮，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实现工业化，为此，应向农民发动全线进攻。布哈林等人则坚决反对剥夺农民的政策，认为应通过与农民经济结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工业化并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尽管斯大林在不少场合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但在关于农村实行怎样的政策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出言谨慎，或者干脆避而不谈。直到“托季联盟”失败已成定局的1927年底举行的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才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看法。他严厉斥责农业发展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后，认为根源在于，“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因此，苏联农村的出路只能是：“把分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11—216、218—219、272页；第七卷，第211页。

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①] 由于这时斯大林的权力已经无人能与之抗衡，他的思想便被党顺利地接受，并正式成为党今后在农村实行的（与列宁倡导和制定的合作化道路完全不同的）新的行动路线。即“加强对农民经济的计划影响”；“坚决地向富农进攻”；大力促进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并尽快成为“大规模的公有化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②]

随着斯大林的思想路线被联共（布）党采纳，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不仅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且带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特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用强行剥夺农民的方式推行全盘集体化。斯大林首先从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人手，下令执行刑法第 107 条等特别手段，强迫农民缴粮，并将这些上升到是回击农村“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的政治高度。其目的是通过强行收购粮食的方式解决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为此，斯大林亲自前往西伯利亚（1928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6 日）督查粮食收购，并以中央名义概括了 11 条经验向全国推广。正是在这次著名的西伯利亚之行中，斯大林作出了明确指示，即通过对农民的粮食收购的不断深人，“必须使我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仅“成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而且是“当务之急”。[③] 从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成为借助暴力手段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的机会在全国开展集体化运动的动员令。斯大林对农民采取剥夺政策的另一种手法是，接过原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关于工农产品价格剪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 260—261 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一卷，第 727—74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中文版。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7、39 页。

刀差的论点，要“他们（指农民——作者注）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以此作为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①]

其二，用彻底清除党内异己势力的方式推行全盘集体化。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特点之一，是伴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农村发展道路的分歧展开的，并以后者不仅其理论观点遭批判而且连自身被彻底铲除而告终。在当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主要分歧是：关于解决“粮食收购危机”，是求助于政治还是经济手段；关于农村发展战略，是走集体化还是合作化道路；关于“富农”经济，是采取剥夺还是“和平”改造政策；关于对待农民，是剥夺还是扶持；关于工农业关系，是农业服从工业还是二者平衡发展。他们争论的核心，即废除还是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最后的结局是，新经济政策被抛弃了，布哈林等人被清洗和消灭了，随之掀起的全国性大规模反右倾浪潮，不仅为斯大林的理论路线得以贯彻清除了障碍，而且这种党内大清洗方式本身就是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用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方式推行全盘集体化。说苏联20和30年代有个“富农阶级”，完全是当时人为（甚至是有意）杜撰出的一个所谓的阶级，实际上这些人主要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靠劳动开始走上较为富裕道路的一部分农民。为了强行推动全盘集体化，斯大林在1929年底下达了“消灭富农”的指示，将“集体农庄运动”定性为“反富农的巨浪性质”，也是“扫除富农的反抗”和“击破富农”的运动。为此，他要求“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全线进攻”，直到“把他们打的再也站不起来”，并亲自制定部署消灭“富农”的计划和措施。[②] 以后，斯大林曾经认为集体化运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

② 〔苏〕《苏联历史》1963年第五期，第31页。

动中有其他过火行为，但始终强调对“富农”采取的政策是对的，因为“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必须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消灭富农的政策”。[1]

其四，充分利用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1929年底由斯大林主持的中央全会作出决议，限令全国在五年之内实现全盘集体化，主要产粮区则一年完成，否则就是右倾表现。1930年初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实现全盘集体化期限的决定，规定最迟在1933年春全部实现，并责成各地一把手负责落实，凡稍有抵触的干部均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消除，凡不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就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被严厉制裁。为了加强监督，在各地派驻了各类“专员”坐镇指挥。还应指出的是，这个期间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既是地方实施集体化的组织者，也是执行上级指令的监督者。

正是由于斯大林的理论及其强制推行，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苏联的全盘集体化，好像创造了一个人间的“奇迹”。但是，历史的检验是无情的，全盘集体化却成了以后带来无穷尽祸根的源头。

（三）

综上所述，列宁力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理论上不断修正航向和偏差，最终初步找到了一条农村发展道路，即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合作化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符合苏俄国情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总结苏联历史经验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2] 但是，斯大林时期中断了列宁富有成果的实践，抛弃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1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了列宁富有新意的思路，走上了一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注定失败的道路。更为令人痛心的是，面对全盘集体化后出现的恶果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冠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和根本原则，并概念化、固定化、模式化和向国外强行推广。战后历届苏联领导人依然遵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模式，一脉相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列宁之后的苏联一步步走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它的失败和垮台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苏联农村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基本经验教训之一，农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与自身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符合国情。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 同样，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根源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经过反复实践比较，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俄国最终选择了较为适合国情和生产力水平的农村合作化道路。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抛弃了列宁的正确选择，一味追求既“大”又“公”的组织形式，试图将农村“改造”成社会化的大工厂，结果走上了一条背离国情的道路。尽管在高度集权体制下，苏联集体化模式维持了数十年，但农业经济的长期停滞落后和各种弊端的不断积蓄，最终导致苏联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是在“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现实条件下选择，而是从“头脑”中臆造所谓“新”的模式，这种违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作法，不论其出发点如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第617—618页。

都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基本经验之二，农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的历史进程。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一种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诞生，都有一个由个别的实验逐步扩展到局部的尝试，再发展为整个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根本法则。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了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①] 列宁正是遵循这一认识论原则，经不断探索实践后找到了一条适合苏俄农村的发展道路，强调实现合作化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斯大林时期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则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基本原则，既没有社会实践检验其利弊得失，更否定农村社会变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是通过行政命令与高压手段在极短时间内将人为设计的计划方案强加于社会，其结果成为苏联乃至东欧等国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基本经验之三，农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实践，必须以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主动参与为前提条件。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在探索农村发展道路时深深感到，“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为此，他特别强调，农村合作化实践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参加”，要随时“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探索实践农村发展的新模式，更离不开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主动的参与。但斯大林时期的全盘集体化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3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 768—770 页。

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改造农村，不仅不依靠农民群众甚至被视为“异己力量”，对其采取剥夺强迫手段。因此，自集体化运动开始之日起，这种违背农民利益和愿望的作法就遭到他们的公开反抗与消极抵制。这方面的材料近年来已披露不少，就是很好的佐证。没有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全盘集体化，终将被农民自己所抛弃，这正是事物以后发展的必然结局。

基本经验之四，农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确立，必须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为出发点。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也体现着他们眼前的现实利益。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社会阶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既要代表他们的长远利益，也要考虑他们的现实利益，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列宁正是从“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的苏俄国情出发，强调要切实关心农民的自身利益，“要使农民看到好处”，并找到了将农民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有效结合的理想途径，这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1] 斯大林时期的全盘集体化道路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将农民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不仅不考虑而且剥夺农民的现实利益，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化。事实证明，这是斯大林时期社会实践中的最大失误之一。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定不能背离广大农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结合，否则社会主义事业终将难以为继。

当今时代，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尤其是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列宁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继承和创新，从而重新找回了社会主义的春天，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 501 页；《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0 卷，第 397 页。

五　农民问题与苏联的兴亡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①] 1913年，个体农民（不包括富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达到人口总数的66.7%。[②]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民问题自然是最重要的课题。列宁一直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的政策，工农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③] 当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兴亡。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时，应联合贫农，中立中农。但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新的情况。民主革命没有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也不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列宁决定借助农民运动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列宁说：“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④] 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这一思想，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② 《苏维埃时期苏联史文件资料集》（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第33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29卷，第90页。

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地主的斗争，支持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从而团结了全体劳动农民。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下，党非常顺利地实现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并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列宁总结十月革命的过程时，强调了农民的作用，说，“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1]“至少在1918年夏天以前，在贫苦农民委员会建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政权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2]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全体农民的政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的无比威力和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看到团结全体农民政策的积极成果，但认为是不够的。他指出，这一政策“没有触动全体劳动人民的更强大更现代的敌人——资本”，革命还有“半途而废”的危险。[3]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团结全体农民政策的时候特别强调要依靠贫农。1918年3月，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的专政形式”。[4]至于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据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不久，无产阶级国家同中农的关系复杂起来。1918年初，苏维埃解散了立宪会议，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这引起农民不满。他们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合作关系出现裂隙。这时，饥荒日趋严重。许多个体农民背起口袋在各地进行非法粮食买卖，破坏了苏维埃的粮食政策。列宁痛感小私有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对革命的危害。他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暗藏的敌人，它比许多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更危险；这个敌人就是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它是社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82页。

② 同上书，第36卷，第162页。

③ 同上书，第35卷，第350页。

④ 同上书，第34卷，第66页。

会主义革命的死敌，是……苏维埃的死敌”。[①] “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②] 这里，列宁并没有从总体上否定中农。他多次指出，“不同中农斗争”。[③] 并提出要“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④] 但是，这种区分是很难作到的，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民是既种地又经商，既劳动又投机。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自发倾向已在农民身上占了上锋。因此，中农的政治经济利益实际是被忽视的。1918 年 5 月 9 日，苏维埃发布粮食专卖法令。6 月 11 日，又决定成立贫农委员会。它实际取代了农民苏维埃，把中农排除在政权之外。新成立的贫农委员会和征粮队把矛头指向一切有余粮的农民，包括那些完全依靠自己劳动、没有使用任何雇佣劳动的农民。这一作法使中农疏远了政府，甚至敌视反对苏维埃。1918 年中，曾经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共组苏维埃政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及社会革命党带头在各地掀起叛乱，占领了 3/4 以上的领土。全国经济崩溃，首都工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两面包。苏维埃政权由于农民政策失误，由于失掉多数农民的支持，陷于前所未有的危急之中。列宁总结这段工作经验教训时说，小资产阶级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党应当认真研究对待中农的政策”，“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⑤]

1918 年 11 月，德国战败，有争议的布列斯特和约被废除。随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4 卷，第 219—2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36 页。
③ 同上书，第 475 页。
④ 《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0 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6 卷，第 121、124、117 页。

着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加强，农民转而同情支持坚决维护国家独立的苏维埃。在新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于1919年3日，决定同中农实行巩固联盟的政策，建立工农军事政治同盟。从而为内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找到同农民建立正常经济联系的途径。甚至认为战争条件下实行的粮食征集制可以通过工农产品的交换使国家避开自由市场，避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把分散的小农业纳入自己的统计监督之中。这种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把个体农民视为单纯受监督改造的对象，触犯了农民的私人利益。1921年初，当内战基本结束时，农民不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了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列宁认为这是“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①] 决定对农民让步，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对农民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否定了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忽视中农的想法，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②] 确认全体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主张依靠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在最后几篇文章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将取决于能否保持工人对农民的领导，能否保持工农联盟。列宁提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满足农民的最基本要求——贸易自由。国家“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③] 制定农村政策。国家只能通过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大经济同农民个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列宁提出，在国家掌握一切大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合作社把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42卷，第49页。

③ 同上书，第42卷，第190页。

路。为此，需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全体居民个个都参加合作社买卖”。[1]

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列宁说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但又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 实际视农民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列宁还说通过合作社可以把全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如果有一部分农民不肯参加或长期不肯参加合作社，又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呢？对他们仅仅进行文化工作是否够呢？要不要采取行政或政治斗争的手段来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农民熟悉和要求的商品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要消失呢？如果消失，又怎样照顾农民的利益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初期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他指出，农民是私有者，“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3] 但是，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4] 不是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后备军。其次，小农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摆脱贫困。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使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5] 第三，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6]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683页。

② 同上书，第四卷，第181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④ 同上书，第233页。

⑤ 同上书，第337页。

⑥ 同上书，第447页。

斯大林认为，工农之间虽有矛盾，却是次要的，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抵得上而且肯定会超过这些矛盾，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1] 农民“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2] 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不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不是用组织贫农打击富农的办法来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应当竭力设法抑制”工农之间的矛盾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异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3] 苏维埃国家不能损害农民利益，不能单纯让农民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应当“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主要的问题是：和农民一道，一定要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4] 据此，斯大林提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5]

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对列宁思想的进一步阐述。但是，他也没有讲清楚小农的“非社会主义性”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性”是否本质一样？如果作肯定答复，那么，农民怎么会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6] 如果作否定答复，那又该怎样分析农民的私有本性？从斯大林提出的农民政策看，他是把农民的非社会主义性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性区别开来的。但是，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又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性有何本质区别呢？斯大林没有回答。他只讲农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里姑且不论富裕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③ 同上书，第369页。
④ 同上书，第346页。
⑤ 同上书，第355页。
⑥ 同上书，第372页。

中农是否向往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即使承认农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足以证明农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农民自身利益决定他们愿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说不上农民的“非社会主义性”。如果只是说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经过改造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这只是一个争取目标。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会遇到很多矛盾和问题。小农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个人发财欲望会不断膨胀。如果他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时他们的非社会主义性是否就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性？总之，农民作为一个具有“非社会主义性”的阶级，究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还仅是一时利用的对象、异类、甚至是敌对因素呢？这个基本问题没有明确答案。

理论的不清楚，导致政策的摇摆。政府时而支持小农经济发展，支持市场贸易的发展，时而限制；时而向中农让步，依靠他们发展生产，时而依靠贫农，打击小农的“非社会主义性”。经济困难时，放松对农民的控制，让农民更自由地选择土地使用形式，更方便地租佃土地和雇佣工人，取消对农民经商的限制，扩大集市贸易。而经济发展顺利时，又转而扩大农业税，重新对农民发号施令，强调政策中的阶级路线，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反对富裕农民，限制小农经济发展。

这种政策摇摆在价格问题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价格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工农关系的大问题。农民要求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市场贸易，按价值规律和供需关系调整价格。而苏维埃担心市场发展会导致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因素的扩大，富裕农民的增多。同时政府还要利用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资金的积累。因此，斯大林虽提出要消灭剪刀差，实际却无法做到。1923 年，巨大的剪刀差使农民不愿购买昂贵的工业品，造成销售危机。政府不得不在 1923—1924 年将工业品价格下调了 23.3%。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 1924 年对农业改征货币税后，政府又借

机压低粮价。结果，当年国家只收购到524万吨谷物，比上一年减少128万吨。1925年俄共中央四月全会，全面调整农业政策，市场经济空前活跃。可是，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工业化方针后，国家于1926年又将粮食收购价降低20%—25%，[①]引起农民不满。1927年2月，匆忙决定降低工业品价格，引发商品荒。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商品，不满情绪未能解决。1927年底爆发空前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这年最后三个月的粮食收购量仅及上年同期的53%。新经济政策实施几年后，苏维埃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依然没有理顺。多次的政策摇摆使苏联重又面临类似1921年的工农关系危机。形势要求党对农业采取更为一贯的政策，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出更为明确的说明。

1928年初，苏维埃决定对富裕农民采取非常措施，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为工业化作出牺牲。在这之后，斯大林抛弃过去对小农的肯定，不再讲农民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而是宣称"基本农民群众"过去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道路"，[②]"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③]还说小农经济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④]小农经济已毫无生命力，"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的"。[⑤]这样，小农同富农不再有原则区别，同是"资本主义阶级"，同是社会主义的异类，是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社会基础。小农的某种积极作用也丧失殆尽。小农成为应该消亡的阶级了。

这时，斯大林也讲"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但对资本主义阶级"如何成为同盟者"，没作说明。斯大林也"主

---

①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g of the USSR. mioalesex, 1969.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④ 同上书，第215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9页。

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但又说这一联盟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是"促进消灭阶级的"。[1] 个体农民作为"资本主义阶级"，自然属于反对和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实际主张建立一个以反对和消灭农民为目标的工农联盟，一个准备在几年内消灭农民的工农联盟。但这是不可能的。看来，斯大林只把那些按规定时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视为团结的对象，只把那些履行国家指令，交纳"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集体农庄庄员，视为工农联盟成员。而那些坚持小商品经济的农民，即原本意义上的农民，实际被排除在盟友之外了。或者说，小农在经济恢复时期可以包括在盟友之内，而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斯大林认为农民从本质上讲是非社会主义的。认为决定苏联社会主义命运的，从政治上看，不是农民，不是工农联盟，而是无产阶级；从经济上看，不是农业，不是工农业的均衡发展，而是工业化，是重工业。由此，斯大林在苏联经济文化不够发展，社会主义尚处于初期阶段之时，就匆忙否定个体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他急于改造农民，改变所有制，并把改造农民等同于非农民化，等同于消灭农民。在改造农民过程中，不是把农民利益同苏维埃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而是要农民服从国家利益，甚至随意损害农民利益；不是通过市场流通把个体农民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结合起来，不是用经济文化手段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采取强制暴力手段实行全盘集体化，消灭个体农民的小私有制。斯大林认为做到这点还不够。他说："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2] 斯大林认为更重要的是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庄员的全面控制。苏维埃不仅掌握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1、143、144 页。

② 同上书，第 227 页。

着全部土地和大农业机器，规定农庄的组织形式和公有化程度，还通过行政系统、命令性计划、义务交售制度等指挥和监督着农庄的一切活动，使集体农庄和庄员绝对服从国家利益，使农业完全服务于工业。

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把千百万不易控制的个体农民和小农经济改造成为听命于国家的农庄庄员和集体经济，使国家能够按自己意愿及时征购到农产品，能够通过剪刀差扩大资金积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工业化的实施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建立。但是，也使工农关系，苏维埃国家同集体农庄庄员的关系受到致命伤害。农民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个人意愿被忽视，利益受侵害，独立生产者的地位顷刻丧失。他们中许多人由于说怪话，不肯加入农庄甚至进行破坏活动而受到惩治。农民成为农庄庄员后，地位低下，处处受控，极度不满，虽无力像 1921 年那样掀起大规模的反叛暴动，却普遍消极怠工。农民（庄员）同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协调。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当年 9 月就向党中央全会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指出农业落后，原因是“违反了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发展、关心增加生产收入的原则”，[①] 即把农民控制得太苦。赫鲁晓夫决定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行政干预，用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去，集体农庄每年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低于成本。1958 年，政府取消这种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从 1952 年到 1964 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 7.48 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 15.69 倍。政府放宽了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减少计划指标，取消对庄员从事副业生产的众多限制。1958 年决定解散国营机器拖拉

①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3 页。

机站，将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取消“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1]的情况。这一系列措施调整了农庄庄员同国家的关系，促进了农业发展，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改变。在1950—1960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多万，但农业产量明显增加。在1951—1955年期间，谷物的年平均产量为8850万吨，在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亿吨，增加近50%。[2]同一时期，肉类的年平均产量增加60%以上，奶类增加7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赫鲁晓夫日益得到群众的支持。尽管他行事莽撞，到处发号施令，在内政、外交和党务各方面都犯有错误，但是，他仍能顺利战胜对手，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可是，赫鲁晓夫对农村的调整改革多属应急性质。他仍沿袭斯大林的理论，满口称赞集体化运动，说“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3]斯大林体制基本上没有被触动，集体农庄和庄员仍然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赫鲁晓夫初期放松对农民控制，但在情况稍有好转时就又下令缩小了庄员的宅旁园地，限制自留畜的饲养，合并农场。同时，不顾苏联实际情况，随意提高生产指标，强行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农民的积极性重遭打击。1963年，农业歉收。谷物一下子比上一年减产3200多万吨。赫鲁晓夫于第二年就被一场宫廷政变赶下了台。群众对此反映冷漠，没有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更没有举行抗议游行。

勃列日涅夫在担任苏共最高领导后，向党中央全会作的第一个报告也是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报告中，他确认，1953年9月

---

①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6页。

②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③ 赫鲁晓夫：《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中央全会“制定了农业方面的正确方针”。[①] 政府大力纠正赫鲁晓夫晚期的错误，重又放松对农庄和庄员的控制，鼓励发展私人副业。1965年和1973年两次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5%左右。勃列日涅夫极力稳定农村状况，不随意发号施令干预农业生产，还固定国家收购农产品的指标，五年不变。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措施基本上是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修补。这些措施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效果。1971—1975年的谷物年均产量达到1.8亿吨，比1961—1965年的年均产量增加5000万吨。可是，农庄庄员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庄员依然如斯大林时期那样依附于国家。勃列日涅夫对庄员实施的有保障劳动工资制和某些社会保险也未能提高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政府向农业大量投资。1971—1975年期间的投资为773亿卢布，加上农庄自己的投资达到1184亿卢布。1976—1980年国家和农庄的农业投资增加到1711亿卢布，1981—1985年更多达1896亿卢布。可是，缺乏自主权的庄员无法也不去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农业仍然上不去。1981年以后，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1—1985年间粮食的年均产量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年均产量低3600万吨。国家在1972年进口粮食超过1000万吨，1981年猛增为4200万吨。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困境中去世。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看到了苏联的内在危机，但低估了农业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上台后的第三年即1988年，才首次向党中央全会提出农业改革问题，作了《关于在现代条件下党的农业政策的报告》。他主张通过经济核算、承包、民主化经营等办法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经济。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农业改革放在中心位置上。不等农业出现明显

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24页。

好转，就在当年6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把工作重心转为政治体制改革。结果，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政局动荡不安，不得不又转向经济问题。1990年通过了所有制法，接着又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计划方案。不过重点都在工业企业，而不在集体农庄。

戈尔巴乔夫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苏联农民成为农庄庄员后，长期在行政指挥下从事生产活动，很多人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在保持农庄制度的情况下，庄员习惯一切依赖农庄，安于现状，害怕竞争。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农庄如何生活，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想简单仿效中国，在农村推行租赁承包制，效果不大。他想根本改变农村的经济体制，却没有全力去寻求过渡的方法。农业生产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倒退。谷物、棉花、甜菜的产量都低于70年代的水平。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下跌到1.6亿吨。戈尔巴乔夫上台仅六年就被迫交出政权。

长期积累的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所规定的国家与庄员的主从关系虽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调整改革，但基本状况未变。它成为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受挫的主要根源。

首先，造成农业长期落后并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障碍是经济文化的落后。改造农民和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应通过“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社会化。但是，斯大林却把改造所有制，控制农民放在第一位。他所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是一种缺乏活力的体制。它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可以随意破坏经济法则，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它把农业引向闭塞的自然经济。结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停滞不前，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粮食和肉类的产量仍停留在沙皇时代的水平。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开始放松对农民的控制，扩大对农业的投资，但仍不能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落后不仅占用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速度受阻，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在二战后新科技革命时代，苏联经济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后，苏联人民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下子就失去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信任。可以说，苏联垮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垮于人民消费水平的低下。

第二，农民问题没解决好，妨碍了人的素质的提高。革命前的俄国，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被束缚在宗法体制下的村社之中，缺乏独立人格。苏维埃在改造农民时，虽然也进行了扫盲和宣传教育工作，但总的来看，并没有培育出新一代的农民。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实际上是村社的再版。庄员受到更严格的控制，自由加入和退出农庄只是无法兑现的一纸规定，庄员连到城市去都需事先得到领导批准。庄员长期生活在农庄这个封闭落后的狭小天地里，思想狭隘保守。在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大多数庄员只关心自己的副业生产，自私心理严重。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庄员习惯于服从命令，安于因循守旧，一切都依赖集体，依赖国家，缺乏竞争勇气和上进的动力。对政治，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也不关心，但在某种情况下又十分偏激，容易被人利用。农民的这种思想和习气在离开农村不久的工人当中，在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镇居民中也有很大的市场，使人感到苏联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苏联部分居民的这种文化素质，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制度的剧变。

第三，农民问题没解决好，使国家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尽管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是，农村的封闭落后使中央权力在许多地方被割断。一些人把自己管辖地区视为领地封邑，横行霸道，实行家长统治。这造成人民的不满，危机四伏。同

时，也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往往同民族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力量。

总之，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兴衰。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农民和穿着军装的农民顺利夺取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8年春，依靠贫农打击有余粮的农民，又使苏维埃陷入内战之中。1919年3月，党决定实行团结中农的政策，为内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1921年春，农民对共产主义政策不满，掀起暴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工农关系明显改善。但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问题并未解决。政府对农民政策左右摇摆，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也随之上下波动。1928年爆发收购危机后，斯大林否定个体农民和小农经济的作用，用行政暴力手段改造小农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以致带来诸多问题和争论，斯大林不得不用“大清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都首先抓农业问题，调整同庄员的关系。使50年代、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成为苏联大发展时期。但他们都没能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最后在农业歉收的困境中结束执政。戈尔巴乔夫想进行彻底变革，但他没从农业入手，更没有调整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长期积累下来的农民问题，最后虽然没有导致火山爆发，却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得于农民，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失于农民。

六　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

勃列日涅夫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1982 年 11 月 10 日在台上病逝，在苏联执政达 18 年之久。他在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之长位居第二，仅次于执政 30 年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在苏联 70 多年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全面和深入地加以研究。从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 18 年，苏联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60 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 70 年代初苏联还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了同美国的平衡。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一时似乎不可一世。但是正是在这 18 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本文拟从勃列日涅夫其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的教训等三个方面对这个时期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勃列日涅夫生平和其人

在过去苏联那种党的最高领导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其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发展状况无不产生深重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所以，要研究长达 18 年的这个时期，

首先需要对勃列日涅夫其人和他的特点作一番考察，以知其人而明其政。

勃列日涅夫一生共活了76个春秋。他于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的卡缅斯科耶市。他的父亲伊里亚·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小职员，母亲娜塔莎是家庭妇女。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弟妹各一人。卡缅斯科耶在俄语里意为"岩石"，该市因沿河有石矿而得此名。在19世纪末以前，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1887年，法国和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选中卡缅斯科耶，在此兴建乌克兰第一座冶金厂，该厂于1889年建成了头两座鼓风炉。勃列日涅夫的祖父雅科夫·勃列日涅夫原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农民，那时他带了全家来到卡缅斯科耶，进了这家工厂做工。他的儿子伊利亚也跟他进了这家工厂。卡缅斯科耶后来逐渐兴旺起来。到1913年末，已成为一个有2.2万多人口的热闹市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勃列日涅夫家的家境逐渐好起来，已从该市的工人区迁居到条件较好的另一个区。到1913年，卡缅斯克耶冶金厂已拥有5座鼓风炉和10座马丁炉，铁产量达到了49.9万吨，成为战前乌克兰最大的冶金厂。

勃列日涅夫就在卡缅斯科耶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十月革命前后，从1915到1921年(勃列日涅夫9岁到15岁)，他在卡缅斯科耶的一所学校(原名古典中学，革命后改名为工人学校)读了6年书。十月革命后，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在内战中遭破坏，直到1925年才恢复生产。1921年，勃列日涅夫从工人学校毕业时，卡缅斯科耶工厂停工，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勃列日涅夫一家只好回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老家去务农。约一年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带着家小又返回卡缅斯科耶。但勃列日涅夫本人仍留在库尔斯克，从1923年到1927年上了库尔斯克土地管理和土地改良技术学校。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女护士，那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维克托莉亚·彼得罗芙娜。1926年，他曾到白俄罗斯南部奥尔沙附近的一个区里当过土地测量员。

1927 年从库尔斯克土地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东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土地管理工作：1927—1928 年，任该州一个地区的副土地督察员；1929—1930 年，任该州比谢尔德区的土地部主任；1930 年，任该州一个地区的农业管理局副局长。1930 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乌拉尔到莫斯科，进了加里宁农机学院，在该校学习到 1931 年。此时，苏联农村正掀起了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此时却告别了在俄罗斯曾从事的农业工作，又回到了乌克兰老家卡缅斯科耶市(1936 年后改名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勃列日涅夫于 1929 年 10 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比谢尔特区被吸收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1 年在卡缅斯科耶的工厂里转正为联共(布)党员。

回到乌克兰后，勃列日涅夫在 1931 到 1935 年期间曾在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做过工，同时还参加过冶金学院函授班的学习，并先后担任过冶金学院的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不脱产）。1935 年，他从该校毕业，取得了工程师的文凭，成为一名党员技术知识分子；毕业之后到捷尔任斯克工厂当过几个月的车间主任。这之后，29 岁的勃列日涅夫应召去服了约一年的兵役，到赤塔坦克学校当过学员，后又担任过第 14 机械团坦克连的政治委员。服兵役回来，勃列日涅夫在 1936—1937 年又当了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冶金技术学院的院长。

30 年代中，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已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1934 年 1 月，联共（布）召开了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第 17 次代表大会。这年 12 月，发生了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其后苏联就开始了连续几年的“大清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大批干部遭清洗，干部队伍变动很大。当时在乌克兰，2/3 的州一级领导人，1/3 的市、区级领导人都遭撤换。这种历史条件为勃列日涅夫这一代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干部提供了向上升迁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7 年

勃列日涅夫被提升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的市苏维埃副主席，1938年被调任该市所属的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州的联共（布）州委商业部部长。1939年，33岁的勃列日涅夫升为州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后来又主管州里的工业和国防工作，直至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在该州为向后方拆迁工厂忙了约二个月，7月中当德军逼近第聂伯河湾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应征入伍，从此他在军队中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1941年他首先以中校军衔入伍，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4月—1945年4月，担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中获得上校和少将军衔。1943年夏末，第18集团军在高加索会战中发动了进攻德军的塔曼战役，收复了诺沃罗西斯克。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这场战役中的"小地"之战。是年冬，第18集团军归属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该集团军在1944年一年中多次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的战役，在1945年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5月解放了布拉格。勃列日涅夫这几年作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18集团军的整个战斗。1945年6月24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各特勋部队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个混合团，勃列日涅夫是率领这个团通过红场的四个将军之一。战后初期，勃列日涅夫仍在军队中担任乌克兰西部军区的政委。

从1946年8月到1950年初，当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参与了战后的复兴工作，曾先后担任扎波罗热州委书记（1946年8月—1947年10月）和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1947年11月—1950年初）。

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之一。经赫鲁晓夫提名，勃列日涅夫于1950年7月被调往摩尔多瓦担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取代因加速农业社会主义化和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残余不力而被撤的原第一

书记科瓦尔。当时苏共中央推荐勃列日涅夫担任共和国第一书记的文件中对他评价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个有20多年党龄、年富力强的同志。他当过土地规划员和冶金工作者，熟悉工业和农业。他多年来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就是证明。他是个经验丰富、有毅力而孜孜不倦的人，经历过战争的全过程，拥有将军军衔，处事果断……"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按他的看法，果断不是急于发号施令或匆忙地作决定，而是遵守制度、执行纪律和无条件地对党委托他完成的任务负责。[①] 从这份鉴定和近30年后勃列日涅夫对它所作的解释来看，苏共一贯把执行型干部作为好干部的标准。

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作为摩尔多瓦的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届代表大会，成为大会秘书处和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见到这位46岁的年轻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大概对他印象不错。在大会后的苏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提议设立有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以取代原来的政治局，并把书记处书记由5人扩大为10人。他提出的名单中包括勃列日涅夫。于是，勃列日涅夫被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并进入了书记处。根据档案材料，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和军队中工作时在干部登记表的民族栏中一直填写自己是乌克兰族，但到莫斯科苏共高级机关工作后就改填为俄罗斯族。这看来是出于更便于上升的考虑。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只工作了几个月。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不再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调任苏联海军部政治部主任，随即海军部与陆军部两部合并，勃又改任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全会上提出垦荒计划，当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在

---

①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哈垦荒。1954年1月，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被撤职，2月赫鲁晓夫派潘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到哈萨克斯坦担任第一和第二书记，在那里实施垦荒计划。1955年中潘诺马廖夫遭贬职，被派往国外当大使，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共工作了两年时间。

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后又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从此他（当年正好50岁）又回到苏共中央工作。在1960年前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中，他主要主管国防工业和宇宙航天事业，曾参与了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的建设和1957年苏联第一批火箭的发射工作。1956年苏共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把“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后，勃列日涅夫被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1958年任苏共俄罗斯联邦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笔记表明，在苏共20大上听了赫鲁晓夫做的秘密报告后，他对其反斯大林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档案材料说明，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则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1960年5月，赫鲁晓夫削减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此时，勃列日涅夫再一次离开苏共中央，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担任主席团主席，直到1963年6月。在这三年中，他从事了许多比较轻松的礼仪性活动，并多次到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访问。1963年6月，他重新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同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7月，米高扬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到书记处工作。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一贯顺从听话比较满意，此时似有意让他做第二把手，但嫌勃列日涅夫工作不够果断和对事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勃列日涅夫这次回到党中央后，权力较三年前在党中央工作时更扩大了，此时整个国防工业都归他领导。

勃列日涅夫重回苏共中央书记处后不久，1964年10月苏联就

发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根据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宫廷政变”中所起的远不是主要的作用。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尤其是谢列平。具体的重要组织者则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伊格纳托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尼。勃列日涅夫事先仅闻听其事，并表示同意。10 月 5 日，他率代表团去东德访问，参加民主德国建国 15 周年活动，12 日才回到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13 日早晨，他打电话通知在南方休假的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参加全会。根据这些材料，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接替者的问题是在 13 日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外加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等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共 22 人（有的材料说还有国防部长参加）讨论决定的。14 日召开中央全会时，在全会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主要是苏斯洛夫等几个人，勃列日涅夫主持了中央全会，发言不多。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遭到反对。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大家之所以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大家承认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求得暂时的平衡和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当时恰恰是他这样一个显得比较平庸的人物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有的人，例如谢列平，完全把勃列日涅夫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人物，准备等待时机取而代之。所以，正如布尔拉茨基所写的，“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在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三年任上，勃列日涅夫显得相当满足于那种平稳安逸的名为元首，但无实权的工作和生活。俄罗斯不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他对走上第一书记的位子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俄罗斯一些传记作家和学者所写的著作中提供的材料、分析和评论，我们可以把

勃列日涅夫在个人素质、学识、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特征描绘如下。

（1）他的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和战略家。

（2）他在学习和工作上都不够刻苦勤奋。他不爱读书，极少动笔写作。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便条之类，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常见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留下过什么思想火花。他不爱看文件和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所有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出错。

（3）他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躁冒失的举动。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他为妥协能手。

（4）他对人温和，不粗暴，对手下不提严格要求，注意外表礼貌，所以容易博得周围和下面人的好感。

（5）他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他对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

鲁晓夫两人的总和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4枚苏联英雄勋章。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的这种虚荣心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年有机会多次向勃列日涅夫单独汇报工作的苏联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作者），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做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成了制度，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去都说一些溢美之辞。他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6）他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与欢乐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汽车。直到晚年，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之风也很盛，而且礼物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赠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向勃列日涅夫家属把这件礼物要了回去。

（7）他在国内政策上一无坚强意志，二无宽广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目标；在国际政策上虽然追求和平和裁军，但信守对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传统观点。然而，他在政治圈里

搞权术，在安排和处理干部上却有一套本领。他能不急不忙地把他认为可靠和可信的人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 1967 年被撤下台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戈雷切夫说惟一的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列日涅夫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

总之，从他的气质、文化教育程度和经历来看，勃列日涅夫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党的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执行者，但绝不是一个合适的领袖人物，更不用说是能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大党的领袖了。对这一点，今天俄罗斯的学者、作家和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看法都是一致的。但对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时有没有可能选择别的更有才能的人上台，看法就不太一致。有的人认为当时推举他是看错了人，没有选准选好。有的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的领袖之才，但当时所有有条件可与他竞争的人也都不比他高明。相反，勃列日涅夫到过农村工厂，搞过农业工业，参加过战争，当过部队政委，领导过军工和民族共和国，经验比较全面，在这一层干部素质和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很难做出其他更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研究勃列日涅夫生平及其人之后，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现象在苏联的出现不能说只是历史的偶然。

（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三个阶段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执政期间，苏共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从 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在“宫廷政变”中上台，经苏共 23 大，到 1971 年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他执政的第一个阶段。

70年代上半期，从苏共二十四大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是他第二个阶段。从苏共二十五大，经苏共二十六大，到1982年11月他去世，也就是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各有特点。

1. 第一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从平等伙伴中的第一把手上升到领袖地位的阶段，也是他逐步放弃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全面恢复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路线上，标榜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连续性，强调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引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只是不再提赫鲁晓夫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1967年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2）消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赫鲁晓夫推行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作风。在1964年10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打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中以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孤独地度过余生。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把地方上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统一的党组织；1965年9月，取消了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中撤部而建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重建政府部门系统，恢复条条领导，同时废除了赫鲁晓夫强调的干部轮换制，提倡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1966年3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称恢复为政治局，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党内头衔就改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的那种急躁粗暴，到处发号施令的所谓

"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的作风，显示出他的不急不忙、谨慎稳定的风格。这些做法博得了不少人心。

（3）在斯大林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一些亲信曾建议他公开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他害怕这样做会引起社会上的激烈争论，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在实质上完全回到斯大林时期的体制、观念和方法上去。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苏联问题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是"新斯大林主义"。

（4）在经济方面，此时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在社会上尚有影响，改革在经济领域中还有其惯性作用。再加上柯西金在领导经济管理上的声望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而柯西金是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中进行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同时这时提出了加紧开发东部地区的任务，上了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第一批大项目。在经济方面，勃列日涅夫个人比较喜欢抓的是他认为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在196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6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生产下降和赫鲁晓夫采取的缩小庄员自留地、自留畜限额和合并农庄农场等错误做法，勃列日涅夫在"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和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固定农产品征购量和超额奖售、扩大自留地和自留畜限额等。由于进行了上述改革和采取了上述政策，那几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的态度，就可看出，他对柯西金并不真正尊重，而是力图缩小和排挤柯西金的影响，他对经济改革从来是不热心的，他所信奉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那套传统的管理方法。据说，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当时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所作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的一句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的工作，这就是

全部问题之所在。"①

（5）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一阶段中，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计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② 他确实善于培植、使用亲信，安排老相识、老部下。当年在地方上工作时，每次调动工作，变换地方，他都要带他认为可靠的一些老部下去。到中央工作后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那五六年中，一方面他施展各种权术，把领导层中原来跟随赫鲁晓夫的人、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对他的领导能力有怀疑的人或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一个一个排挤掉，如伊利切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尼、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叶戈雷切夫、杰米切夫等人都陆续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圈子，调任其他工作。与此同时，他把在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作时的一批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一个调到中央，安置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如契尔年科、谢洛科夫、特拉佩茨德尼科夫、巴甫洛夫、格鲁谢沃伊、茨维贡、齐涅夫、吉洪诺夫、楚加诺夫等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营造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苏共党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委领导人，这些人占到中央委员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一段时间里每天一上班，都要给各州或各共和国的党的第一书记打电话，进行问候，联络感情，询问情况，表示关心下情和下级困难。各地党的书记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胜感激。为保持地方上干部队伍的稳定，他还宣布，各地干部将主要靠本地干部来替补。他下去视察时，对各地干部的态度也同赫鲁晓夫大不一样。赫鲁晓夫爱挑毛病，动辄训人，甚至撤换干

---

① 〔俄〕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② 麦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部，而勃列日涅夫对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严格要求，使下面干部感到和善可亲。他还为中央级的高级干部恢复或提高了不少福利，如1966年规定，中央级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二个半月的休假。这些做法符合一大批干部的利益，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党的机关系统中，这批人成了他的重要权力基础。

二是军队系统。勃列日涅夫参加过二战，在军队中呆过，后来又主管过军工、宇航和尖端武器生产，同军方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军队中有不少熟人。1962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他上台后苏军方在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大大增加。国防工业问题，对一般政治局委员和财政部长来说，都成了“禁区”，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有权顾问，其他人谁也不敢问津。[①]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1976年由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此时勃列日涅夫同军方关系更加密切，军方成了他的权力的强大支柱。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他在格列奇科陪同下独自去白俄罗斯检阅了苏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三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系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克格勃掌握在谢列平派的谢米恰斯尼的手里，极不放心；1967年3月，他利用斯大林女儿出逃事件，撤掉了谢米恰斯尼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同时调他的亲信茨维贡和齐涅夫等三人任副主席。1968年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内务部，并任命他的摩尔多瓦的老部下谢洛科夫为部长。谢洛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他家就被安排在勃列日涅夫家的楼上。其后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也进了内务部，当上了副部长。这样，克格勃和内务部这两个实权部门都逐步为勃列日涅夫所直接掌握和控制，成为他的又一个权力

① 〔俄〕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俄文版），第一册，第198页。

基础。

(6) 从出版战争回忆录入手，逐渐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参加卫国战争的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据一些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别人帮助写的，书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而且都经出版社的编辑按照上面要求的调子做过加工。如《朱可夫回忆录》，原稿中曾讲到1937年斯大林对一批红军将领的大清洗，但后来出版的书中，这一处就被删除，另外为了宣传勃列日涅夫，加了一段完全虚构的、说朱可夫1943年视察高加索战区时曾提出要见见勃列日涅夫而未见到的情节。由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主持的庞大的编委会编写的《二战史》，也有很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从军事史和战争史开始，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逐步把5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活跃气氛压下去，教条主义的正统学术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重又压倒一切。在经济学方面，此时提倡多搞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少搞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而在侵捷事件后则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商品派的批判。

(7)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反华路线，并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东欧，则于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捷的改革。从军事行动来说，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捷，占领布拉格，劫走领导人，可以说是成功的。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末也加强了对西方的缓和攻势，迎合西德的东方政策，改善了同西德的关系，同美国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议。这些行动也有助于提高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国内的威望。

1964年，勃列日涅夫初上台时，虽然当上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但在领导层中并未被承认为领袖。10月全会后柯西金

取代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真理报》发消息时，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两人照片并列，还没有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1965年底，波德戈尔尼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苏联被称为“三驾马车”当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仍未突出。但是在采取了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况就不同了。这时苏联已开始到处挂勃列日涅夫的大像，其权力地位已明显地高居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了。

2. 第二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又为所谓的苏联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保守僵化，停止和放弃改革的严重后果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其70年代上半期执政第二阶段的两大特征。

首先，此时勃列日涅夫的自信心大大增加，认为苏共推行的路线和内外政策完全正确，对形势感到十分乐观。这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以下一些做法和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上，以及他们所表现的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心态上。

(1) 开始对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迷信，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编造历史，大肆突出其个人在战争、战后恢复工作、垦荒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作用。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尼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取代柯西金，扮演了国家首脑的角色。1977年，他取代波德戈尔尼，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这一阶段中，“三驾马车”的局面已经消失，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得到确立。

(2) 极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继续宣扬脱离实际的超阶段思想。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提出苏联社会和民族已越来越接近，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鼓吹勃列日涅夫

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大贡献，等等。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了无数的会议，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著作。在一批学者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报告和其他许多讲话中，虽已提出了科技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的概念，但仅流于空谈，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苏共领导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时，却极力宣传计划经济加计算机就会大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空想。

（3）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济危机，因而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着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所以，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做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4）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正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某些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5）也在此时，开发西伯利亚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机器设备，从而缓和了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

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6) 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的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加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潜力等，在 70 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过去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的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

(1) 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勃列日涅夫废除地方经济委员会，恢复部门的条条领导后，苏共中央主管经济的部门和处室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机关的办公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处级建制增加到 200 多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一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 1/10。

(2) 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根据苏联公布的统计数字，勃列日涅

夫执政期间，苏联经济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均为5.35%。从年均增长率看，经济情况似乎不算太坏。但是平均数字掩盖下的实际情况却要严重的多。首先，经济增长速度愈益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不断恶化。1982年的基金产值率比1965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1981—1982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只及1961—1965年的32.8%。第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消费品总是处于短缺状态。第四，农业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所以毫无成效。

（3）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此时勃列日涅夫与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的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开始进一步发展起来。

（4）人们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景日渐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主义、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逐渐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3. 第三阶段

从1976年苏共25大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的身体越来越衰颓，苏联整个国家则越来越走下坡路，苏联从稳定走向全面的停滞。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中患了两次中风，身体趋于衰颓，已难于正常视事。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74年年底在海参崴同美国福特总统会晤的时候，他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由于随行医生的努力，病情得到控制，会谈没有中断。但是在乘火车回莫斯科途中经蒙古时又患了第二次中风。此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大大下降，到党中央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持的政治局每周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与此同步的是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老龄化，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老态龙钟、思想僵化、行动不便的领导集团只能靠他们的助手班子来工作，一切都要靠助手班子提出建议和写好讲稿，即使是最简单的讲话也都要写成讲稿。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变得口齿不清，他的撰稿人得专门避开那些他不便发音的词儿，而挑选他便于发音的词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形式化。这方面的情况可由几个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见证来说明。

其一是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提供的见证。他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作好仔细安排。沃尔科戈诺夫曾多次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写过政治局会议讲话稿。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相互讨论，而是念助手们写好的2—3页的讲稿。大家的表现总是“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同事先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①]

---

① 〔俄〕沃尔科戈诺夫：《七个领袖》（俄文版）第二册，第27页。

其二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提供的见证。他说，在那个时期中所谓总书记的意见和主张已很难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不过是在当时能对他施加最大影响的这一派或那一派人的观点。那时政治局有些会议为了照顾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开会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坐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措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①]

其三是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档案材料。他写道，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或年初都要回顾一下前一年的工作。1980年1月3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主持开会后，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似地报告说，过去一年中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工交基建的159个、外交和内贸的1845个、经济计划的11个、干部问题的330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接着，安德罗波夫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讲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不光是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感和紧迫感。[②]

---

① 〔俄〕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俄文版），第一册，第217页。

② 〔俄〕沃尔科戈诺夫：《七个领袖》（俄文版），第二册，第35—36页。

(2)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方面的两个事例也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一个文件的遭遇。苏联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经下面一再反映，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勃列日涅夫就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专门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三位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反对，于是报告上交后再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上送的这份报告。[1] 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提出后，过了15年，也就是到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召开了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食品纲要》的经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调苏共中央后主管农业问题，感到问题极为严重：几十年中一千几百万公顷农田被毁或被占用；农村生活条件落后，非黑土地带（30个州）农村凋敝，大量农业劳动者流往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农庄农场入不敷出，年年靠国家150多亿卢布的贷款过日子，庄员生产积极性很低；在党政干部和工商业干部中存在着农业是无底洞、无可救药的情绪，等等。戈尔巴乔夫搞了不少调查，召开了大量专家和干部会议，经过几年时间搞出了一个《到1990年前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的方案。但当一接触资金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就摆困难，政府财政部

① 〔俄〕阿尔巴托夫：《当代人的见证》（俄文版），第172页。

长死活说没有钱，无法解决资金问题，要他参加会议也不来。最后把问题提到勃列日涅夫那里，吉洪诺夫等才勉强答应想办法解决。这样才在 1982 年 5 月得以召开讨论《食品纲要》问题的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了话。但即使在《食品纲要》通过之后，农业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变得更糟。[①]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这种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

（3）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粮食、肉类大量依靠进口，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1979 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虽作出了改善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决议，企图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改进管理，但都无济于事。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苏联经济几乎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

（4）在国家领导集团严重老化、国内政治社会形势死气沉沉和经济形势愈趋严重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军方、克格勃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却对外大肆推行扩张政策。此时，苏联同美国从缓和转向新的对抗和新的冷战，并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在非洲和中东，继 1975、1976 年伸手安哥拉之后，苏联又于 1977、1978 年伸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也门；在拉美，插手尼加拉瓜；在亚洲，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在金兰湾等地建立海空军设施，支持越南人侵柬埔寨。而于 1979 年底，苏联直接出兵，人侵阿富汗，这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这个小圈子决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是在出兵之后听新闻报道才知道此事，都是事后在文件上划圈的。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作出这个错误的冒险决策，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达 10 年之久，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5）苏联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大大增加，对苏共领导进

---

① 〔俄〕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俄文版），第一册，第 192—211 页。

一步失去信心，有关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在社会上大量流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大大下降，原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丧失。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已普遍感到，苏联已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于 1982 年 11 月去世后，苏联又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任总书记的不到三年的执政时期，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短暂的延续。1982 年 1 月苏斯洛夫去世后，在苏共政治局核心人物中，尤其在契尔年科和葛罗米柯之间，曾有过一段争当第二把手以成为勃列日涅夫的合法接班人的角逐。最终年迈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还是确定安德罗波夫为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在总体上坚持传统观念，坚守传统体制，但在苏共领导集团中为人清白，文化修养最高，也最有思想，在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有好评。他受命于危难之机。他上台后抓整顿纪律和秩序，处理了勃列日涅夫女婿切尔巴诺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书记梅杜诺夫等几名臭名昭著、为群众所憎恨的腐化干部，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等新提法。他上台后露的几手，虽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但也使人心为之一振。可是他也是年老多病，实际上只工作了半年时间，由于严重肾病缠身，剩下的近一年时间都是带病工作，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度过的。1984 年 2 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由老态龙钟且又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在吉洪诺夫等人的支持下，接任总书记。此时，全国陷入全面停滞状态。老百姓内心为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感到愤慨和羞辱，但又无可奈何。

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经历了营造和巩固自己权力基础、登上权力顶峰和进入晚年衰颓三个阶段。由于平庸无才、缺乏长远眼光、思想理论上的保守僵化、性格上的软弱和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作风上的贪图安逸玩乐和不勤奋刻苦，他虽然把苏联搞成了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但耗尽了苏联的潜力，拖延了苏联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苏联经济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败坏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使大批群众失去了信心和社会主义的热情，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空前的孤立。事实充分证明：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社会大震荡和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

(三)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主要教训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有很多教训需要加以研究和总结。这里只能简要地就几点主要教训作些探讨。

1. 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的全部历史和他给苏联造成的严重困境，清楚地说明，在二战后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尤其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苏联仍然坚守斯大林的那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走进死胡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方面搞了一些改革，如在政治方面揭开盖子，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提出干部轮换制；在经济方面进行局部的经济改革等；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和平共处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在议会取得多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等新观点。这些做法和观点反映了苏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新的世界形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本身就是有矛盾的：他在接触实际问题时具有较大的现实感，但在许多理论问题上仍固守教条主义，尤其是不能全面地总结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加上他作风粗暴鲁莽，在国内外政策上都犯了许多错误，终于在执政 10 年后被推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时，把赫鲁晓夫倡导改革的积极的一面也抛掉了，在进行表面的改良和修饰的情况下完全恢复了旧观念、旧体制、旧方法，结果路子越走越窄，问题越积越多，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而 60 和 70 年代正是世界科技革命有很多突

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取得很大发展，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的时候。正在这时，苏联由于停止和放弃改革，不但丧失了20年宝贵的时间，而且使自己的立国基础（理论和群众基础）开始逐渐发生动摇。

2.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之所以不搞或反对改革，主要是由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他们无视苏联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无视时代特征的变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一些理论当作教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他们坚持苏共的传统观点，长期陷入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误区，从苏共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一直把建立共产主义物质基础，向共产主义迈进作为苏共的总路线和当前的总任务。这一方面使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发展可能性，不能正视现实的国情，另一方面又使苏联广大群众因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包括同发达国家对比中看到的反差，而逐渐产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以致丧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过一定的探索。如果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一定的时候不是没有可能取得某些大的突破。可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严重地阻碍了这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在侵捷事件中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和"国际专政论"之后，完全堵住了改革的道路。70年代苏联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提出一些改善计划经济的计划和管理工作的思路，在传统的旧体制中转圈子罢了，所以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正是在柯西金改革的浪潮消退以后，从九·五计划开始，苏联的经济形势就每况愈下。

3.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恢复个人迷信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教训。在苏联，斯大林最早搞个人迷信和领袖的终身制。赫

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一旦大权在握也搞自己的个人迷信。他一方面提出干部轮换制，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同时又作了例外规定，为最高领导人的继续连任留了后路，实际上他自己还是只相信自己，有搞终身制的意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既热衷于搞自己的个人迷信，又完全恢复了终身制。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地搞个人迷信，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过去沙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家长制意识的影响，其次是在理论上对列宁提出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作出了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理解，导致只突出领袖的作用，把领袖凌驾于政党、阶级和群众之上，甚至把领袖神化；第三是在党政领导体制上党政大权过分集中于苏共总书记个人，而又没有任何可以对之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教训来看，对党的最高领导人规定严格的任期制也是必要的。如苏共党章严格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不得超过二届，勃列日涅夫在 70 年代中就下台，那么避免出现勃列日涅夫晚年那种苏共领导人的普遍老龄化、体制僵化和国家陷入全面停滞的可悲局面也许是有可能的。

在苏联解体前和解体后，有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回顾和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时，都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在 19 世纪能出大量人才，在十月革命时能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那样一批有才华和学识的人才，而在后来几十年中就出不了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那样的平庸之辈来当政？他们的看法是：问题就出在苏联当时形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谁当上了领袖，谁就认为自己最高明，他们要用的干部就是能听他们的话和执行他们的意志的干部，哪个干部如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撤职；这样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惟惟诺诺、平平庸庸的干部的制度，包括高级干部也是如此。另外，领袖的接班人问题，又都是在幕后，在很小的圈子里，甚至是在施展阴谋的背景

中决定的。因此真正有才干和学识的人就很难被发现。他们认为，这是苏联的教训和悲剧。

4.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国家机关严重官僚化的教训。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党政机关空前膨胀，党组织机关的官僚化十分严重。苏共已从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变成了无所不管的行政管理机关。苏共党组织越来越变成行政事务机关，而失去其进行政治和政策领导的政党功能。苏共庞大的各级机关干部队伍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特殊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的社会集团，同群众越来越疏远。此时，党政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日益滋长蔓延。有的学者提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党政干部是否已成为一个特殊阶层，苏共是否已经变质。这个问题恐怕还难于下结论，还需要很好的探讨。但严重官僚化和腐化，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是一方面由于苏共脱离苏联实际，推行“左”的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使群众感觉不到苏共真正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又由于苏共机关的日益官僚化和脱离群众，所以当后来苏联解体时，无人出来维护苏共，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5. 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同美国搞军备竞赛的深刻教训。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推行的对外政策是苏共传统的世界革命观念和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水涨船高的军备竞赛，无止境的扩张和霸权欲望，使苏联背上了沉重包袱。据一些俄罗斯学者估计，苏联在大搞导弹核武器等军备的年代里，差不多把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业生产能力都用于军事生产综合体，使苏联耗尽了国力。苏联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可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绝不可同西方搞军备竞赛。

七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年）长达18年之久，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1/4，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比历史上其他各个时期都高。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得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出现了深刻的危机。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剖析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揭示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择其对苏联整个历史进程，特别是对后来苏联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国家实力由盛及衰。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总的来说是有发展的，特别是在60年

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的顺利完成，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上任后烧起的“三把火”，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振奋。这五年内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7.4%，从而使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速度连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制止。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达到 6.4%。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从 1965 年的 2294 亿卢布，上升到 1970 年的 3473 亿卢布和 1975 年的 5112 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则由 1965 年的 883 亿卢布，上升到 1970 年的 1084 亿卢布和 1975 年的 1128 亿卢布。粮食产量明显提高，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七五”计划（1961—1965 年）期间的年均产量 1.303 亿吨增加到“八五”期间的 1.676 亿吨和“九五”期间的 1.861 亿吨。单位面积产量 1965 年为每公顷 9.5 公担，1970 年增加到 15.6 公担，1978 年又增加到 18.5 公担，与 1965 年比较几乎翻了一番。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认为，70 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生产的发展使苏联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1975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工业总产值的 80% 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 85%，[①] 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70 年代中期，也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极盛时期。这是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结果，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想指出，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大国和使美国感到畏惧的头号敌人与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体制的改

---

①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123、234—235、251—252、258、82 页。

革和政策的调整。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下开始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和广大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当时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当时在柯西金领导下工作，在苏联解体前夕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这次改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柯西金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仅在随后的五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提高23%），消费品（即“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最后终于同过去总是被特别重视的“甲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相等。”[①] 雷日科夫在这里提到的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甲、乙两类工业发展的速度已经十分接近。统计材料表明：从1966—1970年，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率为8.6%，乙类产品增长率为8.4%。[②] 这种情况在苏联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勃列日涅夫在进行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措施。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接着就陆续出台了调整农业政策的一些决定和法令，其中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收购计划五年一定、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宅旁园地限制以及国家每年拨专款补贴农庄庄员养老金

---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见《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4—5期合刊，第12页。

②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管理，加强了对农庄庄员的物质刺激。从1965—1975年间，曾先后三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该承认，所有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发展速度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在“八五”计划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是社会生产总值，或是国民收入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均直线下降；其次是经济增长大都是在传统的工业部门，新兴工业部门（如微电子工业等）开发较少；第三是生产效益不断下降。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生产效益不高主要表现在高投入、低产出以及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经营；第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苏联历史上一般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居民收入提高较快，出现了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和积累率降低的情况。出现上述各种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强化。“新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根本触动传统体制，但是即使这样的改变也半途而废。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深恐改革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他们的权力基础，因而逐步取消了各种改革措施，还组织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这样就使得传统体制更加强化，使固有的弊端进一步加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世界上正在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之所以未能及时引进，有些新技术即使引进了也未能很快应用到生产上去，这也与传统体制所起的阻碍作用分不开。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因为这样做不仅要承担风险，而且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成为领导部门提高计划指标的依据，而企业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科技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约化方针的实现，使经济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这仅是传统体制弊端加重的一个方面的例子而已。

除了体制这一根本性的因素以外，还有两个消极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特别突出的。一是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要加强消费品生产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重工业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3%—75%之间，大大超过了斯大林时期。统计资料表明，只有1968、1969和1970年三年的重工业增长速度略低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①] 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为农业服务。1975年的材料表明，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仅占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总产值的2.5%。[②] 二是军备竞赛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压力。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苏联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国民经济负担最不堪重负的时期。可以说，苏联作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全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由于以上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经济出现了日益衰退的现象，国家的实力逐渐由盛而衰。到了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

第二，政治体制由稳定而日趋僵化，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被赫鲁晓夫搞乱了的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纠正了赫鲁晓夫某些偏向和错误，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再加上第八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带来的经济发展使得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没有利用这种形势，抓住机

①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②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遇，进一步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相反，变得自满起来，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从而使固有的因循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使传统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由稳定逐渐转变为僵化。

政治体制僵化首先表现在权力的不断集中上。恢复部门领导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地方主义的抬头和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造成了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 1965 年的 29 个增加到 80 年代前期的 160 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到 80 年代初，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到 20 万种之多，[①] 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必然导致国家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 64 个部和 20 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 800 多人，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这个部共有正副部长 19 人，其中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 15 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②]

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尽管很多党的文化和国家法规对党政权限进行了划分，但在实践中却是党包揽一切，各级苏维埃形同虚设。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党代会和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多次研究过加强苏维埃的作用问题，并且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法令，如 1968 年的《关于村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971 年的《关于市和市辖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

---

① 〔俄〕A·H·博哈诺夫等：《20 世纪俄国史》，莫斯科 1996 年，第 581 页。

②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 页。

本权利和义务》和《关于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权利和义务》以及1972年的《苏维埃的代表地位法》等等。这些法令虽然明确规定了各级苏维埃的作用和职权，但是在实践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1981年，当时负责党的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曾经这样说过："党的一些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撇开苏维埃，对完全属于苏维埃管辖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某些苏维埃领导人也习惯于把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送交党的领导。"[①]

权力的不断集中导致个人专断的出现和加强。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也比较注意到地方和基层去了解情况并研究工作。在宣传上也强调所谓的"三驾马车"，把勃列日涅夫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并列。大致从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勃列日涅夫逐渐提高和突出自己的地位并不断加强个人的权力。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与此同时柯西金的实权也遭到很大的削减。"三驾马车"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独揽了全国的党政军大权。这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也开始出现。他特别喜欢别人对他的吹捧。宣传媒体的报导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曾经这样写道：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的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政治体制的僵化还反映在领导干部的老化和事实上的终身制上。稳定干部队伍在一定时间内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当稳定走向极端的时候便必然出现领导干部老化的现象。这种老化不仅体现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上。整个干部队伍缺乏新生力量和改革精神。他们无所作为，安于现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勃列日

①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涅夫本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先后担任过《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并与这位最高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院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应该说他在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的最初一段时日干得还是满不错的。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喜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在五年时间里竟获得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①] 以下数字足以反映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是后期最高领导班子老化和实际上的终身制的情况：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达到90%。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1984年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中央委员达12年以上。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和34年。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②]

由于体制的僵化、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特权阶层"。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西方和当代俄国学者简单地称其为"新阶级"。有些学者认为，"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

---

① 〔俄〕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② 〔俄〕A·H·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第581页。

已经出现。看来，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在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在全国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构不成一个“阶层”。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具有一定的分量。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客观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因此，在这一时期特权者作为一个阶层也尚未形成。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 50 万—70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 300 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①]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

① ［俄］A·H·博哈诺夫等：《20 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 年版，第 571 页。

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①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是这种为维持现状所作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剧变。"特权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消极影响在于他们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共产党人在人民中失去了往昔的革命形象，也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成功的。

第三，"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困扰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搞"解冻"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一些单个的人，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运动。"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一个运动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成为困扰苏联领导人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几乎时起时伏地存在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运动之所以发生并持续不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从国内来看，这一时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积累了不少问题，很多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未能得到真正落实；苏联传统体制的积弊日益加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对改革的期盼也日趋强烈。由于党内外的民主遭到遏制，

① 〔俄〕A·H·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第584页。

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可以表达意见。“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超越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采取了一些违反正常情况的表达意见方式，但在客观上和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要求。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对外政策上发生的两大错误：1968 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1979 年武装入侵阿富汗。这两个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批评，同时也先后两次激发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有其国际背景，无视或是低估这一点都是错误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渗透和反共势力的推波助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想方设法要破坏这一制度并对它进行和平演变。勃列日涅夫执行的“缓和”政策在客观上又为西方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 1975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协定”签订以后，西方国家更是公开地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把苏联套住，因而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例如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一些大城市相继成立了“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一类的组织，从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持续不断，反映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和失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一开始，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但以后的实践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究其原因，第一在于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以这一时期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力宣传为例，当时的宣传家以至党的领导人在宣传中把苏联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几乎是白璧无瑕，希望以此来加强群众对社会主

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向往。为此，宣传家们大谈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只能加剧群众的思想混乱甚至引起逆反心理。再例如，在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腐朽没落的同时，完全无视当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没有注意紧密联系苏联人民的思想实际。由于当时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的扩大，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已完全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了。于是，这样的宣传教育便成了“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在于方式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党和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和大专学校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各类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光说不做，空谈盛行，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一种典型的风气。它在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同样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也相当普遍，遇问题不作具体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去做思想工作，而是千篇一律地设法堵住矛盾，不做深入细致的解释与诱导。这就使得存在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加深了矛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之所以一直未能平息下去，而且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同情，与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软弱无力是分不开的。

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态度和具体处理上也存在问题。首先是没有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很不统一，不仅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类型内部又有不同的情况，其成员的观点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程度和国际背景也不尽一致。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还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政策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对党和国家在体制、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可是党和政府并未对“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区别对待，而是采取基本上相同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取缔和镇压。

尽管镇压的方式与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不同，但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也给西方舆论界提供了更多的反苏宣传“炮弹”。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未能针对性地提出一套自己的人权理论和有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政策和措施，以教育群众，同时抵消或减弱西方反苏宣传的影响。

第四，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拖跨了经济，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搞霸权主义。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宗旨是不相容的。

霸权主义集中表现在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争夺。这一争夺决定着整个对外政策的全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美争霸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美争霸不完全相同。赫鲁晓夫从他倡导的所谓“三和路线”出发，把苏美合作和与西方搞缓和放在第一位，而把与美国的争夺和对抗置于从属地位。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从总体上看是有限的，有时是被动的，同时又是比较软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淡化乃至否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当时的国力相对还比较弱，不足以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和平等的争夺。因此，赫鲁晓夫要大力发展核武器，希望以此为捷径在军事力量上迅速超过美国，从而加强与其争夺的实力。这固然与赫鲁晓夫迷信核武器有关系，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苏联军事力量以及整个国力与美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与美国的对抗和争夺多少带有被动性质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对抗与争夺便转变为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勃列日涅夫对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估计得比赫鲁晓夫要重一些，同时也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苏联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勃列日涅夫不仅注意发展战略核武器，同时也重视发展常规武器，最后终于达到了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程度。这是争霸和扩张的资本。如果没有这种资本，

主动的争夺便无从谈起。

勃列日涅夫也提倡与西方“缓和”和“和平共处”，而且调门比赫鲁晓夫更高，实际行动也更积极，所取得的成果也更实在。这种“缓和”势头在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高潮，1975年欧安会“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便是一个集中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争霸服务的。“缓和”的一个目的是促进国内局势的稳定；再一个目的是需要与西方搞贸易和得到西方的技术以发展经济。只有国内安定和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争夺。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缓和”是第一位的，争夺是第二位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两者的位置倒了过来。当然，这个时期与美国的争夺和对抗是有张有驰的。一般来说，60年代后半期是有限的争夺和对抗时期，70年代则是主动的争夺和对抗时期。尽管70年代前期缓和有明显的进展，但并不因此而减弱争夺和对抗的势头。到8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和苏联国力的削弱，对抗和争夺的形势已使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

与东欧盟国的关系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基本特征是加强控制，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提出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更是企图从理论上论证控制东欧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相互支持的，不存在谁对谁发号施令的问题。任何国家，不论其国力多强和国际地位多高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形式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与东欧盟国的关系中违背了这一原则，从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对苏联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对东欧国家造成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损害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束缚了它们进行体制改革和结合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东

欧各国也提供了大量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和支持，一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另外，勃列日涅夫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并非都像对付“布拉格之春”那样严峻。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也有某种容忍和宽松。例如对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就是如此。当然，这与匈牙利领导人对改革的小心谨慎态度也有关系。这场改革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与支持，也为国际所注目。因此，匈牙利人民至今还怀念着卡达尔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从其主流和总的倾向来看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外交是世界范围的。这一时期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规模和强度明显地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可说是不遗余力，其中既包括所谓的经援、军援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渗透，也包括通过代理人进行武装干涉，甚至本国军队直接入侵。这种扩张和争夺行动，在70年代后期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1979年出兵阿富汗使这种行动发展到最高潮。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也使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士兵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对第三世界进行扩张时是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的。其实这不过是对武力输出革命和明目张胆的扩张行为作掩护。为了显示这种行动的正义性，还宣传说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走上“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种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歪曲，其结果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庸俗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日益拖垮了苏联的国民经济。首先是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从1963—1973年军费总额为674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率又逐年提高。1971年军费支出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

又增至1023亿美元，1980年为1750亿美元。[1] 在70年代，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0%—25%，[2] 80年代初期，苏联大约有500万至800万人在军企中工作，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其次是国民经济的畸形结构进一步加重。军工生产的发展使工业内部的比例更加不合理，使得苏联的产业结构成为名副其实的“超重型结构”，从而严重影响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似乎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实际上却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实在是得不偿失。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教训，前面已多有论及，这里再集中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主要历史教训是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亟待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切实的改革，也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20—30年代形成并在战后初期进一步巩固起来的。当时的世界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种体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其固有的弊端在开始时就已见端倪，但还不是主流。正是这一体制的动员力和组织力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工业化的实现，也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时代特征的变化。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60—70年代之交，随着新一次世界科技革命的开始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

①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② 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济、政治的发展与相对稳定，以及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逐渐被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主题所取代。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国内情况，包括人民群众的心态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与赫鲁晓夫时期也不一样。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苏联传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形成时期的那种生命力，而其缺陷与弊端则暴露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和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紧迫性，贻误了改革的时机，特别是没有把已经初见成效的柯西金经济改革坚持下去，并进一步深化，并且逐步扩大到政治领域。这一重大的历史性错误最终把苏联引向了危机的边缘。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之所以未能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并付诸行动，除了对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他们在时代特征和苏联国内外情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抱着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观不放，把那时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高度集中的体制进一步凝固化和绝对化，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一个表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并被载入1977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更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突出反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仍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与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条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应当指出，改革之所以被贻误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个人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能力不强和缺乏远见的领导人，到了执政后期，特别是在1974—1975年之交患了两次中风以后，更变得暮气沉沉、求稳怕乱。他贪图安逸，盲目乐观，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一个革命领导人应有的条件和

品格。

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另一个主要历史教训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这样做不仅拖垮了经济，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严重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从而为苏联以后的演变埋下了种子。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也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时代的主题已经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原来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已经开始被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显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吸引各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形式所代替。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从以军事领域为主转向以经济领域为主。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仍然固守着原来的观念和教条，因而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霸权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根源是把武装输出革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混淆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义务。武装输出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干涉别国的内政，造成这些国家内部更大的混乱，勃列日涅夫时期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再一个思想根源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这是沙皇俄国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恶劣传统，可是苏联好几代领导人均未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在以上种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不断膨胀，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不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时期的话，这是苏联发生演变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体评价应当采取一

分为二的态度。尽管这时期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加以全盘否定。无论是从极"左"的观点或是从右的观点出发，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看成是漆黑一团，都是不符合历史情况，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这一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等方面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即使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现象和值得肯定的地方。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是苏联走向衰落的 18 年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不是说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出现了衰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 18 年也是由盛而衰的 18 年。因为在 70 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可以说达到了鼎盛的程度。当然，这种鼎盛与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时期，或是 30 年代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和 40 年代卫国战争赢得胜利时期不同。那时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初露锋芒和生机勃勃的时期，是这一新生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示得最突出和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最强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鼎盛主要是指综合国力而言的，而且其持续的时间较短，不久就从实力的顶点跌落下来。显然这是其体制的弊端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程度的必然结果。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在各方面都走向衰落的时期，是国家濒临全面而深刻的危机的时期，也是对以后苏联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期。但是这并不等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处于注定要失败的境地。从 80 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苏联 60 多年中积累起来的国家实力尚未耗尽；经济发展虽然连年滑坡，但还没有停止增长；上层建筑，包括党、政、军各级权力机构并没有完全失控；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之间那种与离心力长期并存的凝聚力尚未消失；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也还没有泯灭。这些情况都表明，如果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出一套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并努力加以贯彻的话，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完全能够重新振兴的。



第　二　篇

苏联剧变最为直接的现实原因



一　有关苏联剧变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扩展到欧亚十几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对旧模式、旧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是互相影响的。到1989—1991年。东欧八国和苏联的改革先后都以共产党的失败和下台而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的后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着重谈对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的看法。

（一）关于苏联剧变的几点看法

能不能正面吸取苏东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苏东改革和中国改革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苏东失败了，导致三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导致三兴：兴党、兴国、兴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大约只有3600万党员，现在发展到5800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实力大为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苏东改革为什么改了40多年，最后灭亡呢？理论界流行三种观点。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

第一种观点：苏东改革失败，关键在于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改革，从赫鲁晓夫起到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长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苏联。这是一种很权威、很流行的说法。这种看

法认为，苏联的变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鼓吹“三和”（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把苏联搞亡了。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第一位掘墓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最后的埋葬者。对赫鲁晓夫应该怎么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揭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错误、有缺点，对斯大林的评价并不公正，确实一度引起思想混乱。但整个来看，赫鲁晓夫主义仍然是“左”，不是右。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加以具体说明。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的话，就不能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赫鲁晓夫是右，这样就把是非搞颠倒了。实际上赫鲁晓夫路线是形右实“左”，少右多“左”。赫鲁晓夫不是苏联的第一个掘墓人，而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个改革家，但他是一个蹩脚的、不高明的、不成功的改革家。斯大林“左”的东西，他并没有改革，只作了局部的修补。正因为斯大林“左”的错误长期没有改，才导致苏联后期的右。从赫鲁晓夫到1987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一直是“左”。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半以后，到1987年11月《新思维》一书出来后，才开始转向右的方面。

第二种观点：苏联剧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人认为苏联是被党内外三种资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搞垮的。一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二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即所谓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苏联在1936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长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1991年苏联剧变以前，苏联并不存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能说苏联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靠戈尔巴乔夫等一两个领导人就能够把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2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悄悄搞垮吗？这不能让人信服。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

内部原因。

第三种观点：苏联失败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苏联失败，不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方向。

目前理论界流行的这三种观点，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时，都受了“左”的思潮的影响。

苏联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从1991年起，我就苏联东欧剧变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都已收入我的四本文集之中）。在1992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原因探究》中，我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原因：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发达国家的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应该正确处理四个“主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四个主义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封建主义糟粕比发达国家多，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比发达国家少。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掌握好它的特殊规律，应该着重铲除封建主义糟粕，适当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不能急于建成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封建主义糟粕没有很好地铲除，而是深入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没有充分利用，而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一建立社会主义，就马上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根子上说，苏联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在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发达国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地搬到苏联来。如：急于消灭商品市场经济，急于搞

产品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不发达国家还存在许多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封建主义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难以改正，到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转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长期的“左”，促进后期转向右的极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如果只看到了后期的右，而无视或忽视长期主要的错误是“左”，那就是目兴短浅，只看到病象、病变，回避了病根、病源。苏联东欧剧变的病根、病源是“左”的东西，病象、病变是后期右的东西。

（二）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导致“三个危机”和“三个灭亡”

苏联剧变，从长期来考察，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深层的矛盾，而苏共长期无视这些矛盾，也无力、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最后引起三种危机，苏共急剧转向右，导致前面所说的三个灭亡。在1936年以前的过渡时期，苏联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过渡时期结束后，苏联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出现了新的矛盾。到80年代，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些新矛盾。苏联社会存在哪三大矛盾呢？

第一个矛盾：过“左”的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

1. 过“左”的路线。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从路线方面看，大约60年都是推行“左”的路线，大约有九年（1921—1929年）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最后四年转向推行右的路线。

九年正确路线时期，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逐步改造小农经济。在

1921年以前，1918—1920年，列宁也是推行“左”的路线，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搞实物分配，实行余粮收集制。本来这些是战时特殊的政策，列宁误认为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犯了三年“左”的错误。但是列宁能够及时承认并纠正了错误，及时提出正确的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救活了苏联。邓小平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惟一肯定的也就是新经济政策。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至少实行25年，可实际上只实行了九年。

1930年，斯大林急剧地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急于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它。1939年斯大林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的整个指导思想是急于求成，对富农、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都采取了过“左”的政策。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于1946年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急于实现世界革命。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不是搞右的呢？不是，这需要拨乱反正。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是缓兵之计，其中心还是要“埋葬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他觉得斯大林时期跟帝国主义搞得太僵硬了，要缓和一下。赫鲁晓夫多次提出：我们这一代要埋葬帝国主义。只不过方式改变了，过去是暴力革命，现在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认为他放弃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要暴力革命，是右。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形势。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势。而赫鲁晓夫非要用“和平过渡”统一各国共产党，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还是“左”的表现。

“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针对苏联国内提出的。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否认了党和国家的阶级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是右。实际上，是“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建成了，党和国家就要消亡了。但赫鲁晓夫不愿意让党和国家消亡，在理论了陷入了困境。于是他的智囊团为他炮制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两全”的理论认为：到共产主义建成后，还有党和国家，不过那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全民的党和全民的国家。“两全”是为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的，主导面是“左”的东西。总的来看，赫鲁晓夫主要是“左”，或者说是少右多“左”，形右实“左”。

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左”的错误没有克服掉，只是稍微作了点变动。赫鲁晓夫时期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到苏联在20年内还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60、70年代，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安德罗波夫对“发达社会主义”又作了修补，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还是要逐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他认为苏联还没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又接近了些实际。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战略，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转向搞市场经济。到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党才猛醒过来，意识到再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行了，在1990年才改变提法，急于要在500天之内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这样就进一步把苏联的经济搞乱了。

总之，苏共推行了50多年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的路

线，长期难以改正，致使广大人民和党员对党的领导和改革失望了，于是社会上和党内右的思想必然滋长，想从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去找出路。这样就促使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从 1987 年底以后逐步转向右的方面。

2. 过渡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

过"左"路线如果仅仅是路线问题，那还是认识问题。通过实践检验以后，认识容易改变。但是由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使得苏联过"左"的路线长期难以纠正。斯大林最大的错误不是前面讲的肃反扩大化等等，那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他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请注意，这里用"过度集权"，而不用"高度集权"，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必要时要有高度集权，但过度集权，就过头了），给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长期的、广泛的危害。

（1）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斯大林搞了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按照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与君主专制国有三点区别：前者国家领导人应该实行权力制约制、限任制和选举制；后者则实行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指定继承人制。自古以来这两种政体的区别截然分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怎样实现民主共和制？马克思还只有巴黎公社 72 天的经验，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六年，在民主共和国方面作出了表率。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行集体领导。他作为政府总理、党的政治局委员，与其他人民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一样，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而且列宁常常处于少数。典型的例子就是 1918 年 1、2 月，在讨论是否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列宁四次在中央居于少数，多数人反对他。列宁没有强加于人，提出准备辞职。在最后一次表决中，才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列宁对反对者并没有什么惩处。在领导人限任

制问题上，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托洛茨基说，我们夺取政权后，准备55岁就退下来。可是1924年列宁54岁病故。列宁不指定接班人。列宁临终前，给党代表大会一封信，被称为列宁遗嘱。列宁对身边的政治局委员每一个人的优缺点作了评价，没有暗示谁接班。

但是，后来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既是党的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又是全军武装部队总司令、最高统帅。斯大林还搞领导职务终身制，他任职直到1953年73岁过世。他于194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任期12年；他还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斯大林的三制，带有封建君主专制的色彩，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原则，对苏联有长远的影响。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始终没有触及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只有某些政策方面作了调整。赫鲁晓夫59岁上台，1964年70岁时被赶下台，如果赫鲁晓夫不被赶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何以见得？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专门作出规定，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三届，但是德高望重者可以例外。实际上为赫鲁晓夫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开了绿灯。勃列日涅夫上台时58岁，任期18年，76岁病故。安德罗波夫1982年68岁接班，70岁病故。契尔年科74岁接班，75岁病故。苏联在1982年至1985年的两年四个月内，党和国家三易其首，这是老人政治、终身制的贻害。

从一般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三制，从社会主义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还加强了、加深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高干特权制。前三制加后三制，这六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形。消灭等级授职制和官僚特权制，实行主要领导人普选制和待遇不超过熟练工人制，这本来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两条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保证社会公仆不会变质的两大保证。实际上斯大林都背弃了。

（2）在党的领导体制上，斯大林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再加上政治局中心制、监察机关附属制和取缔不同政见制，这六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前三制前面已经解释过，后三制再展开说明。

第一，政治局中心制。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的政治局从何而来，政治局在党内是什么性质的机关，总书记何时才有，他在党内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在广大党员心目中，大都认为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并非如此。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是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建立的，中央根本没有政治局，也没有总书记。当时中央设有中央委员会，五人组成，有主席，主席主要是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马克思在1848年2月革命爆发后，也一度担任过中央主席。后来，1863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主席，他最早搞个人集权，并且指定接班人。1869年，德国工人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德国工人的这两个党合并以后，为防止拉萨尔式的个人专断和个人集权，中央设两个平权的主席。互相牵制。

俄国党1898年建立，没有设过主席，只是在1903—1904年，设过总委员会主席。当时俄国党有两个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委员会。为了协调这两个中央机关，设立了一个党的总委员会，推举德高望重的普列汉诺夫为总委员会主席。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分裂，总委员会和主席都取消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没有主席，长期也没有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也不多，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人，实行集体领导，并没有设政治局。政治局从何而来？过去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的一些书歪曲了历史。苏共中央编的列宁传、斯大林传，都说列宁、斯大林是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没有这回事。1917年4月的这次代表会议上没有决定建立政治局。十月革命前夕，为了加强党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政治局，只是一个

临时机构，并不是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起义胜利后，政治局便取消了。苏共中央正式建立政治局，是在1919年的苏共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这时中央委员已增至25人，有必要在中央建立领导核心机构，但政治局并不是党的权力中心，而是和中央组织局并列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执行机关。组织局负责人事的调配，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主要是政策的执行和某些具体政策的制定。政治在俄文中与政策是同一个词。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从1847年马克思建党以来，在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实行旬会制（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委员会闭会后，由政治局、组织局负责贯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还有一个机构即书记处，也是1919年才正式建立的，是日常办事机构。最初没有设总书记，只有三五个书记。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因书记处处理的事务繁多，在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之后，才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作为书记处的首脑。在俄文中，总书记为秘书长之意。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担任了总书记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才是俄国党公认的领袖。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党内职务是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长期不设常委，直到斯大林后期，苏共中央才有九个政治局委员。

身兼政治局、组织局委员的斯大林任书记处总书记一年后，列宁认为他独揽大权，脾气粗暴，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在给党代表大会信中，列宁提出：建议大家另选一位脾气好一些的人，接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但是代表大会没有很好传达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选了斯大林为总书记。斯大林后来明确地说，在苏联，中央全会决定一切，政治局决定一切，把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30年代之后，政治局会议经常不召开，由总书记独揽大权。

根据马列建党学说，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

的权力中心，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主张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度。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领导六年，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1925 年以后，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从相隔 2 年、3 年、4 年、5 年，以至 13 年之久。斯大林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表大会转移到政治局，使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他在党政领导体制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后来长期也难以改正。1952 年党的十九大党章规定党代会至少每四年召开一次，1917 年党的二十四大又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

第二，监察机关附属制。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有效地对中央进行监督，列宁继承国际共运好的经验（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于 1919 年提出，从 1921 年起，苏共中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任务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1923 年，列宁在临终前写下《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主张国家的监察机关与党的监察机关合并，合并以后的机构专门监督中央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在内。斯大林感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的监督，是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和威胁。1934 年苏共十七大修改党章，把原由党代表大会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其任务是监督地方党委是否执行中央的决议。从此中央监委的性质完全改变。从 1934 年以后，没有任何机构能监督苏共中央领导人。

第三，取缔不同政见者。

党内在决策问题上、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同意见应该自由、平等地展开讨论、争鸣。不能求得共识时，以少数服从多数来进行决策。决策错了，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纠正。列宁领导的六年，党内有很多派别，列宁反对派别活动，但是赞成党内民主自由。列宁指示《真

理报》办争论专页，发表党内对决策的不同意见。各种争论最后在党代表大会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十月革命后，党内争论很激烈，也有很多派别，列宁从来没有把谁打成反党集团，只是反对派别活动。从斯大林开始，把党内不同意见打成反党集团，人为地加深、加剧了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总之，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苏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如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等都看到了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意见。但由于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们都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集团、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开除党籍，还枪毙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变种，是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并对苏共党内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

第二个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与劳动大众的矛盾。

过度集权的体制固然阻碍了路线的端正，更深层的原因，是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根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巴黎公社开创了两个原则，一是主要领导干部选举产生；二是领导干部和工人工资平等，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而斯大林搞的是等级授职制和高薪特权制，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苏联在斯大林中期（1935—1936 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也有的同志认为，在斯大林时期干部有特殊化，还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特权集团的形成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认为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

根据什么这样说呢？1935 年 6、7 月间，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后写下《莫斯科日记》，并作出将日记封存 50 年后发表的决定。1989 年，罗兰夫人将日记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罗曼·罗兰在莫斯科访问

时，看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包括高尔基在内，过着非常豪华奢侈的生活。罗曼·罗兰认为，苏联在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产党人贵族阶级”。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头，但此时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恐怕是事实。托洛茨基早提出过，苏联出现一个工人官僚阶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成《新阶级》一书，也认为南斯拉夫出现了新阶级。可以不用“阶层”“阶级”这些词，而用“官僚特权集团”较为合适。

苏联出现的官僚特权集团，显然是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的产物。苏联在分配方面，对群众实行“左”的平均主义，对领导干部实行右的封建主义等级制。这个官僚特权集团从计划经济体制内获得了很多好处，害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有风险，害怕失去他们的利益，所以就以马列主义为招牌，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特权，成为反对改革的阻力。

第三个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

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一个民族大监狱变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这是很大的进步。苏联民族结构与中国不同，在120多个大小民族中，俄罗斯民族不占绝对多数。十月革命时，俄罗斯民族只占人口的43%，其他民族占57%。1989年俄罗斯民族也才占50.8%，刚过半数。苏联革命胜利后，列宁以各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采取联邦制的形式组成多民族的国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联邦。但是，长期以来，大俄罗斯主义严重，实际上是过度中央集权。1940年，苏联以兼并的形式增加了四个加盟共和国，即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从罗马尼亚地区占领的摩尔达维亚。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长期以来，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把俄罗斯族往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推行俄语，甚至搞民族大迁徙，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在宗教、文化、语言问题上歧视少数民族。

总之，这三个矛盾长期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导致了苏联经

济、社会政治、民族三大危机。

经济危机：苏联战后 50 年代，经济增长接近 10%，60 年代降至 8%，70 年代是 5%，80 年代经济增长 2%—3%，1990 年经济负增长，为 -2%，1991 年达到 -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不足，通货膨胀严重。

社会政治危机：党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对党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满，要求实行多党制。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工人罢工、怠工增多。

民族危机：民族要求独立、分离。苏联的解体从 1940 年被兼并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开始。1939 年 9 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瓜分东欧。波罗的海沿岸划归苏联势力范围，捷克、波兰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940 年，苏联策动这三个地区的共产党员闹革命，要求加入苏联。由于斯大林的个人过度集权，苏德密约一事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知晓，苏方的文本由莫洛托夫个人保存。但是西方有这个文本。此文本在西方被公布后，遭到了苏联领导人的一概否认。莫洛托夫去世前，他把保存的文件交给国家档案局。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公布了这份文件。由于处理不当，引发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于 1990 年 3—5 月率先独立。到 1991 年 8.19 事件后，各民族害怕又回到过度集权的旧体制中去，到 12 月 21 日 11 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这样苏联就完全解体了。

于是，上述“三个危机”导致了苏联的“三个灭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制度）。

（三）苏联改革是不是必然导致灭亡？

有人认为，斯大林过“左”的路线、过度集权的体制，培植了

一个官僚特权集团，留下了民族矛盾的祸害，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无法解决。有人说，苏联原是老人、病夫治国，到戈尔巴乔夫手里，已是治病夫之国，实在难治。戈尔巴乔夫的中文谐音字是“锅巴焦糊”，没法治，苏联非亡不可。

曾彦修同志写了读《莫斯科日记》的佳作（见《随笔》1997年第1、2期）。但是有一点值得商榷。他认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之所以50年内不发表，说明他看到了苏联大约过半个世纪就要灭亡。等苏联灭亡之后再出版他的书就不至出丑。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之所以要在50年后发表，是因为他预计苏联高干特权的弊病，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是可以改正的。到那个时候再出版此书就不至于对苏联的声誉有所损害。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共产党还有救。苏共应该高举反“左”、反教条主义、反封建主义大旗，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端正党的路线，改革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苏维埃民主，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总书记集权制和政治局中心制，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党代表大会，恢复列宁的传统，恢复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度。这样党内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见就容易被大家认可，就可以及早转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只召开了两次党代表大会（1986年二十七大，1990年二十八大）和一次党代表会议(1988年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党的权力中心没有转移。戈尔巴乔夫还是搞个人集权、个人专断；高干特权待遇也没有取消，处理民族问题又不当。1990年以后他转而去引进西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多党制，这样必须使政局更为混乱。

如果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进行改革，改变党对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方式。每年先由党代会提出决策建议供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最高苏维埃可以采纳、也可以作局部修改。使最高苏维埃真正成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苏联还是有救的。现在有

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党内走资派头面人物，是坏人，存心下毒药把苏共和苏联害死。还有人认为，他还是好人，好心开猛药，使苏联暴死。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庸人，有私心，开错药，把苏联治死了。他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搬进来，必然要亡。如果他发展党内民主，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使苏维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还会重新振兴。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是不顾党和国家的灭亡，只考虑个人得失。他要苏共解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同叶利钦会谈，只求保住他下台后的住房、保镖和年薪待遇。足见他是个庸人。

（四）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和平演变”？

波兰出现团结工会，实际上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长期不民主，漠视工人的福利、漠视工人的意见和要求有很大的关系。一些人在西方的策动下，于 1980 年 9 月成立了团结工会，与官方工会相对立，并且吸引了很多人，1300 万职工中有 1000 万人参加，其中大多是原官方工会的人。波兰被迫于 1981 年 12 月至 1983 年 7 月实行军管。军管期间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军管结束后东山再起，要求与统一工人党平等竞争。团结工会终于在 1989 年 6 月议会大选中获胜，9 月上台执政。原来与统一工人党合作的民主党和统一农民党也与统一工人党分手，但是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认为它们是附庸党，缺少独立性。

西方的和平演变，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二靠市场经济，三靠多党制，四靠文化自由。因此，对付西方的和平演变，要有正确的对策。靠什么？（1）要把科技搞上去；（2）要自觉地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行党代会年会制，把党的权力中心回归党代会，成立能监督中央的最

高监察机关，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提高民主党派的地位；（4）发扬文化“双百”方针，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我们现在讲民主自由，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只强调民主自由的阶级性，民主自由固然有阶级性，但民主自由也有它本身质的规定性。没有这个质的规定性，不符合这个质的规定性，民主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例如选举，应该是自下而上提名、有差额的选举，有竞争的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另一方面，改善党对工会的领导，允许工人对党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不赞成他们另搞一个工会。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苏共、苏联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加快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向前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样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的胜利。

二　浅析苏联崩溃的原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冲破了多年来党内的思想禁锢，抛弃了“两个凡是”，开始了我们党的历史上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中国人民沿着20年前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党的十五大总结了20年来的经验，确定了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指针，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了十分美好的前景。

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崩溃了。我国学术界早在苏联刚刚崩溃之后，就开始研究导致苏联崩溃的原因，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大

事，要弄清楚是很费时间的。党的十五大使笔者十分鼓舞，试图本着十五大精神，运用邓小平理论，谈一谈自己的一管之见。

1. 思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　在苏联历史上，思想理论上的大辩论大体上只有两次，大都处在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之下。

第一次辩论，是列宁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经济发展滞后的俄国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论。过去，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在落后的俄国单独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分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具体情况，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就会产生矛盾。俄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在当时是一次思想、理论上的突破。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列宁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和俄国的具体情况，打碎了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家机器，建立了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方面，列宁只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其他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走了很多弯路，造成极大经济困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次创新。但因当时经验不足，他一再说明这只是“暂时的退却”，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要继续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晚年还提出在农村实行“合作制”，“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一切都反映了他受历史的局限，还走不出旧框框。

第二次辩论是在2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这次辩论可分成两个回合，第一回合是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斯大林坚持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客观地说，斯

大林的主张是对过去寄希望于“世界革命”这一教条的突破，有积极意义，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解决国内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淡化关于“世界革命”和冲破“帝国主义包围”的清谈，改善苏联的国际处境。第二回合的辩论是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斯大林根据苏联的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坚持应按照列宁的设想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转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农业则按列宁关于合作制的设想，实行全面集体化。在哈林等人则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坚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反对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结果是斯大林再一次取得胜利。斯大林被认为是“捍卫”了列宁主义，他的主张教条主义色彩较浓。后来用他的办法使苏联很快转入了社会主义模式，但付出的代价很高，留下的后遗症也很大。

30年代斯大林在党内实行大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了党内所有的持不同观点的人，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提不同看法了。党成了一言堂。党内再也没有类似的思想理论辩论，更谈不上思想、理论上有所创新了。

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之后，对党内部分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为苏共带来了一线生机，迎来了短暂的“解冻”时期。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又变得严厉起来，党的生活又变成一潭死水。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的论点，并载入新的党纲，表面看来他的思想很“解放”，但没有落实为任何实质性措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口头上说说，想捞到一点宣传效果而已。

勃列日涅夫总的表现是因循守旧，人们把他执政的年代说成是“停滞时期”，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他执政期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两次试图进行经济改革，但碰上了市场经济这一理论禁区，他的改革中途夭折了。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按照传统的接班程序而不是根据民主原则选举接政人，前后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的竟是两个病号，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干，白白耽误了3年的宝贵时间。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着“危机前”的形势。他手忙脚乱地投入改革，致使改革“空转”。1988年以后他摸准了苏联的病根，提出要进行“革命性”改革：在政治上适当扩大民主，在经济上试图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外交上则谋求同西方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在主要分歧问题上达成妥协。他苦于无法为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和做法找到理论根据，只能孤零零地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这句话出自列宁晚年撰写的《论合作社》一文，有点引用不当，帮不了他什么忙。他既拿不出本本，他的“革命性”改革必然会在党内引起保守派的非议，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派则认为他步子迈得太小，也不予以全力支持。这就引起思想混乱，导致各种政治派别林立。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失去了主心骨，经常反反复复，朝令夕改，致使党和国家陷于瘫痪，至此，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革命性”改革的结局，已经可以未卜先知了。苏共的思想理论禁锢，实在是太久、太沉、太深了。

2．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弊端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列宁建立起来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列宁就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立即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一党制政府——人民委员会，由列宁任主席。列宁原打算采取灵活做法，成立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立宪会议”，保留一点类似西方的议会民主，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十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利用掌握政权的有利条件，全力投入“立宪会议”的竞选工作。但1917年11月25—27日选举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布尔什维克只夺得全部707个席位中的175席，不到总席位的1/4。而社会革命党却夺得了全部席位的一半以上。社会革命党即过去的民粹派，由一些自称为社

会主义者的左翼知识分子组成，同农民有较多的联系。这一选举结果使列宁不再寄希望于“立宪会议”，于 1918 年 1 月宣布将其解散。列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定苏维埃制度是苏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惟一形式。为了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列宁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主要对手，列宁强调，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停止阶级斗争，而应用另一种形式和方法把阶级斗争进行下去。鉴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右翼的“立宪民主党”人数不多，威胁不大，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革命党”及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即所谓“中派”。当时列宁把矛头对准“中派”，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也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对列宁的一些主张，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观察，不能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我们肯定列宁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功勋，肯定他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肯定他在理论问题上的某些创造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不能把他的言行都当作代教条，他的言行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许多言行都是当时的权宜之计。

列宁为了在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的形势下维持政权，成立了“全俄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负责镇压反对势力的破坏、怠工、投机倒把或其他反革命行动。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在苏维埃政权稳固之后仍然保持甚至大大加强这个镇压机构，并几经改名，一直保持到苏联崩溃。

1918 年 7 月列宁被刺后，苏维埃政权宣布实行“红色恐怖”，对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等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进行了镇压，使大量知识分子流亡国外。

列宁为了消除权力过于集中所形成的弊端，曾在党内、政府内设立监察机制，并经常过问它们的工作。但看来效果不太理想。

斯大林在执政初期，由于苏联国内形势日趋稳定，执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原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思想情绪也有所改变。在党内，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为了反对

托洛茨基，对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采取了团结、宽容的态度，因此20年代中期党内生活也是比较宽松和民主的。这本来是适当改进政治体制，拓宽民主范围的大好时机。然而，1928年3月，斯大林却制造了“沙赫特案件”，即指控煤矿工程师进行暗中破坏的事件，再次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国家的政治气氛又紧张起来。在1928年联共（布）七月全会上，斯大林趁势宣布：“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套用了列宁的公式，但实际上1928年联共（布）面临的政治形势，远非1918年那样严峻。随后斯大林又制造了好几起政治案件，使整个气氛更加紧张，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更为加强。

1934年初在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后，党内普遍要求缓和政治气氛，拓宽党内民主。很多中央委员希望选举性情比较宽容的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本人坚决拒绝。斯大林得悉这件事后，便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性事件。先是1934年12月基洛夫被谋杀，接着是追查暗杀基洛夫的幕后主使人。斯大林的许多党内政治对手被牵连。后来查明，这一系列案件都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

从1935年到1937年，数十万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参与谋杀基洛夫为由遭到处决。斯大林还把总的幕后主使人说成是早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已变成“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杀人犯”，凡过去同托洛茨基有过接触的人都不能幸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制定了新宪法，说什么国家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消失了”。言行相悖何至如此！

赫鲁晓夫执政后申讨了斯大林的罪行，说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搞“个人崇拜”，但就是避而不提政治体制的弊端，更不用说对这个体制进行适当改革了。赫鲁晓夫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发挥党

内民主，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没有妨碍他1957年无情地清除党内政治对手，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出中央，甚至清除出党。他本人则身兼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两职，像斯大林一样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一意孤行。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对知识分子进行压制，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和卡皮察因有不同政见而受到政治迫害，然而趋炎附势的伪科学家李森科却受到垂青和庇护。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仍坚持原来的政治体制，但做了一点小的改动：他只担任党的总书记，而把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留给别人，不再把两个关键职务集于一身。但这也没有妨碍他利用党的无上权力排拆异己。党的高级领导人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谢列平、谢列斯特等一个接一个被逐出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干部还在生活领域拥有了特权。这些特权包括：优越的生活和医疗待遇，按级别占有不同规格的别墅，享受“特供”食品，部分高级干部可在“食疗餐厅”用餐等等。高级干部中还滋长了贪污腐化现象，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和女婿也卷入了贪污腐化丑闻。据知情人透露，在他执政时期，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把地方举办的经济建设项目纳入国家计划，常以重金贿赂负责计划的中央领导人，既腐蚀了干部，又破坏了国家的计划工作。

领导集团的无端镇压、享受特权和贪污腐化，使苏共和苏联政府日益脱离人民群众。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于1988年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实行政治改革，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一小部分人民代表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能当选，在这个机构里开始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由于苏联历史包袱过于沉重，见不得人的事做得太多，这样的改革挽救不了苏联的垮台。

苏联的联盟体制，也是列宁创立的。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主张民族自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

翻了沙皇统治之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主张建立一个原沙俄范围内各民族组成的尽可能大的单一制联邦国家。在1918—1921年国内战争时期，苏俄红军击败了俄罗斯境内的白军之后，进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按照联盟宪法，联盟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愿参加，同时享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是，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党是按照阶级原则而不是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是联共（布）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以党作为领导核心和连系纽带的联盟国家，加盟共和国提出脱离联盟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规定只不过是装点门面，徒有虚名而已。然而，在党和国家陷于瘫痪之际，这个规定却成了联盟瓦解的法律依据。

实际上从联盟成立之日起，一些民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地区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就不太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又把过去一度受沙俄统治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东欧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中、苏、蒙三国边境的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分别成为单独的加盟共和国或成为乌克兰、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新并入的国家和地区中，波罗的海三国和西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非常严重，这就更增加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格鲁吉亚人），也更加激化了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矛盾，勃列日涅夫在各加盟共和国推广俄语，试图加速各民族俄罗斯化，使俄罗斯同其他民族的矛盾普遍激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倡“公开性”，泄露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密谋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丑闻，使这个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势如烈火，难以收拾。这个地区的民族运动又带动了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民族运动，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同意与各加盟共和国签订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

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这个新的联盟条约受到苏共中央教条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91年8月19日一些党和军队领导人发动了政变。但这次政变因没有获得广大党员群众、军人和平民百姓的支持而流产。这次不成功的政变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声誉，成为苏共和苏联瓦解、崩溃的导火线。

3．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弊端　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它同列宁原来的设想没有矛盾，而是其设想的继续和发展。

列宁在世时，就已宣布将土地、工业企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收归国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流通领域，则实行日用品供应制，对商业实行限制。为解决粮食供应困难，列宁于1918年5月决定对农民征收余粮。这种做法引起农民的不满，导致1918—1921年的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平息后，又于1921年2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这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叛乱，参加的人有普通工人、农民出身的战士，甚至还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叛乱表明，不满情绪已渗透到革命队伍的内部。列宁在叛乱平息后，立即停止执行余粮征收制，宣布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卖余粮；二是把已经收归国有的部分企业租让给俄国或外国的资本家经营管理；三是恢复商业活动。列宁一再声明这是“暂时退却”，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继续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对租让制不太担心，因为产权在国家手里，转为社会主义企业并不困难。他最担心的是新经济政策下的农民，他们都是小生产者，他们之中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他晚年写了《论合作社》一文，设想用合作社把农民“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了把商业置于党和国家的监督之下，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经商。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续执行他的新经济政策，经济恢复很快。1925年，农业已接近一战前水平，工业已达到一战前水平的

3/4。1928年开始利用农业积累资金以发展工业，决定提高工业产品价格，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就导致农民不愿卖粮，造成粮食短缺和农民涌入城市等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决定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对工业实行行政管理，把国民经济全面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从1929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和运转。这个体制运转的初期，积极成果是主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许多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而中断。苏联能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与头两个半五年计划奠定的良好的工业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曾使苏联农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约有550万—600万农民被划为富农而被赶往边远地区，他们之中很多人死于饥饿和寒冷。这是其一。其二，苏联的工业化是依靠大量出口农产品筹集资金的。在“一五”期间，城市人口猛增250万人，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这些粮食，全部取自集体农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结束的时候，许多产粮区的集体农庄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农民饿死无数。饥荒不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是由于被政府大量征调粮食所造成的。

苏联模式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的设想的。至于行政管理，这仅仅是个管理方法问题。要执行国家计划，就必须实行行政管理。市场经济是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的。这个体制保留了商业，即所谓“商品货币关系”，则是斯大林吸取了列宁执政早期推行供给制度失败的教训而采取的一项变通措施。据斯大林解释，这是因为苏联还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一是国家（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在流通领域，全民所有制可以通过产品调拨来实现。而在广大农村，等价交换是农民能接受的惟一形式，因此在集体所有制和个

人生活用品这些领域，保持“商品货币关系”是必要的。但是，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受政府控制，价值规律不起“调节者”作用，而后者则是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的。

大体上从1929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这个体制被苏联认为是社会主义惟一的经济模式，虽有缺点，也只需“完善”而已。因为在1976年以前这个体制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期曾经扬言，20年内苏联可以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勃列日涅夫没有公开这样说，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那个目标是达不到的。但他仍着眼于缩小同美国的差距，注意寻找苏联经济体制内在的缺陷，并设法对这个体制加以“完善”(请注意，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改革”这个词，常以“完善”一词代之)。经过多方研究，一致认为苏联经济体制的缺陷，一是效益低，二是产品质量差。勃列日涅夫把1976—1980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名为效益和质量的计划，以示改进的决心。然而，事与愿违，计划执行的结果反而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大滑坡，增长数字仅为4.3%（其中工业增长4.4%），比九五计划的5.7%（工业增长7.4%）还要低，比美国的增长率高不了多少。考虑到美国经济基数大，苏联经济的绝对增长数字甚至可能低于美国。更加糟糕的是，在新兴的电子、化工领域，苏联已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了。

“十五”计划不仅表现为增长速度滑坡，更为严重的是表现为经济效益滑坡。如果苏联在1958年生产基金每增加一卢布，可以使国民收入增加52戈比，那么，到了1980年，即“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则只能增加16戈比了。即使在1958苏联经济效益，也远远比不上美国。据美国人估算，美国从1929年到1957年，投入每增加一美元，则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3美元。苏联从1928年到1966年每投入7.4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只能增加5.5美元。由此

苏美经济效益的差距可略见一斑。

苏联经济效益低下和逆减的原因，一是公有制和行政管理造成大量浪费。苏联每单位国民收入所耗石油，比美国多一倍，钢多70%，水泥多1.4倍；1979年，苏联社会总产值中物资消耗要比国民生产增长快；二是基本建设周期长。苏联兴建一个工厂平均约需5年，而美国一般只需2—3年；三是苏联是封闭型经济，同国外没有竞争，在国内则更不存在公平竞争。企业领导人两眼只盯住国家计划，以超额完成计划讨好上级，对采用新技术远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那样感兴趣。苏联技术创新本来就少，而在少量的创造发明中被企业采用的只有1/4左右。苏联的某些重要发明，如连续铸钢、粉末冶金、直流输电、超强人造纤维等，在国内采用反比国外少得多；四是企业机器设备更新缓慢。全苏设备更新平均需要18年，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到10年。五是农业拖后腿。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一般都能自给有余，而苏联却经常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实践证明，苏联的集体农业只能使农民过穷日子，对生产起“牵制”作用。赫鲁晓夫时期曾以减少农民自留地税收和开垦生、熟荒地的办法增加农产品生产，收到了某些成效。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大农民自留地并允许农民拥有小型生产工具，使总面积仅占全部耕地面积3%的农民自留地，生产出约占市场30%的农产品。勃列日涅夫还要求集体农庄保证农民最低收人，使每个农民都有一个铁饭碗（实行工资制)。尽管勃列日涅夫把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到占总投资额的27%，但仍满足不了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从70年代初开始，苏联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

经济效益递减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勃列日涅夫晚年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的投资额仅较第十个五年计划增加12%—15%，只相当于第十个五年计划投资增加额的1/2，第九个五年计划增加额的1/3。如此下去，将使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的惟一选择，只能是抛弃这个体制，另觅他

途了。他提出对体制进行“革命性”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迫不得已。

4.“左”倾的对外政策　十月革命后，苏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3月，苏德签订了布列斯特—立多夫斯克条约，虽摆脱了战争，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德军根据条约长驱直入进驻了乌克兰，对苏俄构成了更大威胁；协约国对苏俄违反盟约单独议和也十分不满，进驻了苏俄一些港口。好在德国于1918年秋战败，苏俄于同年11月宣布废除和约，收回乌克兰，才逐渐站稳脚跟。

苏俄从理论上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它的敌人，它们想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包围”，苏俄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的工人阶级身上，盼望他们起来闹革命。1919年，苏俄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的革命，同年晚些时候又支持了匈牙利的革命。苏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还在同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宣布革命进入了“新纪元”，把一些国家的“左”派组织吸收为它的支部。

苏俄还在境内组成了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人民政府，试图用红军把他们分别送到赫尔辛基和华沙，但遭到了失败。

直到1921年苏俄被邀请参加热那亚会议，它才提出可以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并逐步打开对外关系之门。

经过这一次反复，苏联的对外政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一方面，在国家关系上争取“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际支持各国“左”派闹革命，扩大苏联的地盘和影响，以冲破“帝国主义包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击败了希特勒德国，占领了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许多国家，为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这一地区造成了良好的机会。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顾1944年10月他

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口头协议和1945年他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关于波兰的协议，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广到除奥地利苏军占领区以外的苏联占领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东西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在苏联崩溃之前，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关于“铁幕”笼罩欧洲的演讲说成是冷战的起源，实际上那篇演说只不过是对斯大林上述行动的反应。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力求缓和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他同西方就奥地利保持永久中立的问题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和约)，苏军撤出了包括维也纳在内的奥地利广大地区。赫鲁晓夫想利用苏联的这一让步，换取西方承认苏联在德国东部地区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把德国的分裂状况长期固定下来，从而使易北河成为东西方永久的分界线，但遭到西方的反对。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以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共渡”三个理论问题，反映了他的上述思想。他把支持革命在提法上改为“和平过渡”，只是一种策略手法。实际上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使用了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法谋求扩张。他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曾试图把西方在西柏林的占领军赶走，多次同西方闹得很紧张。1962年他为了争取在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曾一度使世界走向战争的边缘。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是十分友好的。50年代末，由于中苏双方国家利益不同，引起一些争论。本来双方的利益关系是不难协调的，但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却不允许这样做，双方都要把自己的立场说成是惟一正确的，而要求对方改变立场，因此引起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辩论。赫鲁晓夫自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老大哥”，政治影响比中国大，在经济、军事实力上中国也远非对手，从60年代初开始，相继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甚至

军事压力，试图使中国屈服。中国是个大国，历史上又饱受屈辱，是不可能向赫鲁晓夫低头的。中苏关系终于从友好结盟走向全面对抗。赫鲁晓夫的粗暴做法固然使中国蒙受了损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使苏联方面感到战略上处于被动。苏联后来承认，它为了同中国对抗，花掉了 2000 亿卢布的资金，这是它战后外交上最大的失误。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火箭核武器在数量上赶上了美国，具备了对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的能力。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和所有欧洲各国于 1975 年同苏联在赫尔辛基共同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承认欧洲各国边界不可用武力改变（言外之意是可以用和平方法改变），同意发展东西方贸易和合作，并进行人员交流。苏联方面强调《最后文件》的签订，意味着西方国家承认了“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和领土现状”，标志着东西方缓和的实现。苏联和美国、西欧各国在欧洲的和平共处局面，是符合苏联长期以来的愿望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实现了苏联的夙愿之后，又进一步谋求“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缩小资本主义阵地”。他在亚洲和非洲，侧重于争取一些民族独立国家走“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道路，而在拉丁美洲的“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趁它们资本主义制度立足未稳，争取某些亲苏的政治家、军人掌权，最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甚至对“拉丁欧洲”（南欧）也寄以希望。1979 年末，正当苏联经济处于“危机前”状态的时候，他决定直接武装入侵阿富汗，试图使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成为苏联的附庸。武装侵略没有缓和国内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在欧洲已经到手的缓和成为昙花一现。美国为了应付苏联的挑战，大力扩充军备，从而引起美苏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这对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苏联来说是不堪重负的。苏联为了扩充军备和履行对外承担的义务，花掉了约 7000 亿卢布的资金。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为了摆脱经济困难，进行“革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对外政策“新思维”，否定了过去片面强调“阶级利益”的说法和做法，认为对外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之外，也要照顾对方利益，寻找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这种看法是理智的。它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和撤走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于1989年5月访问北京同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同年12月，他又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尔他举行非正式会晤，就苏联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使用武力的问题达成了谅解，为这些国家脱离苏联的羁绊创造了条件，解决了东西方战后以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为1946年开始的东西方冷战划上了句号。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政策，不宜从意识形态出发断言他是叛卖和投降。我们反对别人干涉内政，也不要自己把手伸向别的国家。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应有鲜明的原则，应该言行一致，不能打着“国际主义”的招牌干民族利己主义的勾当，更不能背着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和侵略者签订秘密条约、协定或议定书。回顾苏联的历史，这种事它干得实在太多了。连戈尔巴乔夫宣扬“公开性”的时候，都不敢直截了当地承认1939年苏德签订了关于瓜分东欧、波罗的海沿岸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而是推说文件找不到了。后来才吞吞吐吐地承认有过这么一回事。苏联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

苏联的崩溃，主要还是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的。相比之下，它错误的对外政策还是第二位的，是导致它崩溃的催化剂。

早在1990年3月，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苏联也摇摇欲坠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

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同年 12 月，邓小平再次告诫说，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正是按邓小平的指示对待苏联东欧巨变的。

几年来，我国同俄罗斯之间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清除了历史的积垢，基本解决了边界问题，发展了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1996 年 4 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双方商定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国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业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几年来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将指导我们正确地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外交工作永远朝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

三　从党群关系、“社”“资”关系看苏联剧变的根源和教训

在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中，我们看到，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如果认识上简单片面，处理时走极端——过火或不及，就会铸成大错，导致严重后果。这些矛盾、“关系”如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执政党和人民群众、民主与集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计划调节与市场作用、推进体制改革与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理论与实践，等等。其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影响的是本文标题所示的两对关系。苏联剧变与没有处理好这两对矛盾关系极大。

（一）

1. 党群关系，即先锋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听起来普普通通、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涉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的问题。

所谓共产党丧权，在苏联其实就是选民的多数不投共产党代表的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现象，一个历史事实。不少原苏东国家执政党的负责人认为，共产党不是被反革命推翻的，而是被人民抛弃的。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不承认这个事实则无法治好党的机体

的痼疾。

共产党的宗旨也好，理论、原则、纲领也好，都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党，而且从总体上说，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共产党确是为国家，为广大百姓谋利益的党。那么，它为何走到脱离人民，有时甚至同人民群众相对立，最后落到在选举中成为少数的地步呢?

2.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时，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和平、土地、面包、自由”是广大工农兵的迫切要求，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口号是得人心的。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是在全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的苏维埃（列宁称之为政治晴雨表）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的条件下进行的。把它说成是少数人意志的产物、密谋的结果不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取得政权之后采取何种改革的步骤和措施是另一回事。

当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社会主义措施、迈向社会主义时，到底有多宽的群众基础？多少阶层有实行布尔什维克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人们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之反叛、布尔什维克内部不断发生的分歧和分裂，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被当成改造和教育的对象等等，就可以作出大体的估量。实际上，一些被当成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措施是把先锋队的意志端给社会、端给人民，并以权力为后盾强制社会接受的，很难说已成为社会大多数大众的自觉要求和自觉行为。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就是典型。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是以伤害（镇压、清洗、流放）上千万名农民为代价的。[①] 这样的政策、措施引起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抗（积极的、消极的）就是难以避免的。

既然一些社会主义步骤和措施受到抵制，既然权力基础时有不

---

① 参见〔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1页。

稳，于是，即使明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任务——维护权力的任务摆在首要的、中心的地位。列宁的“政治遗嘱”许多人很熟悉。这里谈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与改革问题。列宁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权的巩固问题。他把工农政权、苏维埃制度作为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①] 这个意思稍微理解歪了——权力的诱惑力使一些人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理解歪了——就会变成为巩固政权而巩固政权。而权欲心重的人又容易把权力视为个人和集团所有，把任何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任何批评、规劝、建议都当成对自己权力地位的威胁而加以打击、镇压。旗号当然是维护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受害者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民的敌人的帽子。理论武器就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办法和手段是政治运动、“肃反”运动、大清洗，造成千百万无辜之人。[②] 这成为苏联模式的硬伤，是最终置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死地的硬伤。这种大镇压运动实际上使执政党同部分人民大众和受错误处置的干部及其亲属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这种伤痕长期难以愈合，尽管事过半个世纪，又经50年代赫鲁晓夫的平反、恢复名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派中，许多人就是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直至90年代中期的竞选运动中，叶利钦利用其掌握的媒体反复再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71页。

② 受迫害和镇压的人有多少，至今未见官方公布的确切资料。有各种估计和推测。布热津斯基估计：“单就1937—1938年期间，有100万人逐个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在20年代后期斯大林掌权后的前几年还有100万人被处决。在集体化期间和人为引起的2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几百万人死亡。”“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这不会是夸大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2页。）1991年6月，当时的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说，目前已查明，1920年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塔斯社，莫斯科，1981年6月14日电）。

现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场面而使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处于难以争辩的尴尬地位。

造成党群关系出现这种情况,有其理论根源,即对"自发"和"自觉"在认识上的偏差。轻视自觉性、崇拜自发性自然是错误的;对人民群众自发的要求、愿望、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是不正确的。群众需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组织和领导,否则就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形不成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但共产党并非天然正确。常说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它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有什么体制和机制来体现党是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保证它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自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呼声的正确集中、科学地反映和表达。如果自命正确、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轻视实践,那只能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那就会走向群众的对立面。苏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超阶段论① 和与此相关的强迫命令就是这种错误的集中反映。至于念念不忘个人和小集团的权力地位,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甘苦,甚至是老百姓死活置之脑后,那它宣称代表人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是自欺欺人了,那已经是另一种问题了。

3. 从苏联的国体,从苏联的根本制度上看,它的每部宪法都标明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生产资料则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假的,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但在这样的国家里,并不能像列宁在革命前设想的那样,人人当"官",人人参加国家管理,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很长的

---

① 1936 年斯大林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1939 年宣布要过渡到共产主义;1961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在 20 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尽管在超阶段的道路上退回了一步,但仍在 1967 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超阶段理论正是苏共脱离群众的理论表现。

时间里只能是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特殊职业——从事管理的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由于共产党对社会一切领域都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领导，这个阶层比社会主义以前的官僚阶层更加庞大，而且越来越庞大。如何防止这个管理阶层打着“代表人民”、“为公”的旗号谋取特权和私利呢？这就需要有一套具体的体制和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

然而在苏联，选举制度长期流于形式，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社会团体的选举，常常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是委任制，监督制度和机制也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党政干部甚至是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干部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看法。于是，巴结上司，漠视百姓，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而老百姓对于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劣吏们则往往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于是，一些庸人、奸人、恶人便心安理得地活跃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上。至于党政高层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处于权力宝塔的顶端，几乎是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这是苏联党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体制上的原因。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政领导制度有些改良，社会主义民主有某些扩大，但远未革除上述弊端。

苏联的历史告诉人们，迷信和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或拘泥于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或搞“大民主”，会酿成政局的失控和动乱；但如果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忽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便容易为削弱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创造条件，使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不受抑制。这就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

4. 特权阶层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政治性很强的理论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20 年代初，托洛茨基提出老近卫军在“蜕

化”的论调，50年代吉拉斯提出共产党执政后会产生“新阶级”，中国“文革”前毛泽东提出要搞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扫除代表“社会障碍机制”的“官僚阶层。”我们这里不对他们各个人以及这些提法、理论作具体评价。他们的政治面目很不相同，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背弃马列主义的；他们的政治倾向也不一样，有“左”有右。但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史上著名的活动家，他们在不同时期都提出类似问题的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他们提出，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遭到失败，这更是意味深长。

特权阶层问题很值得研究，不容回避，也不必回避。认真思考一下，似可得出几点看法。

一是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阶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人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人人当官是不可能的。

二是这个阶层在法制不健全、民主（选举、罢免、监督）制度不完善和脆弱的条件下，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现象几乎是必然的，清明的政治、廉洁的政府不是自然形成的。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存在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的干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对突出的矛盾。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一方面是由于工农大众同作为阶级的旧剥削阶级的敌我性质的矛盾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形成起来。“官民矛盾”更形突出，有时是非常尖锐和剧烈的。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运动，苏联剧变中推倒共产党政权的民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这种矛盾的爆发，中国1976年“四五”运动，更属这种性质。

四是对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的限制反限制、监督反监督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种斗争必须掌握一个“度”：如果采取大民主的办法，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则会给社会主义政权带来颠覆性的危险；如果不通过体制改革，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建立起有效

的限制和有力的监督，任其滋长泛滥，则会造成党和政权变质，最后被人民所抛弃。苏联的结局是一颗需要我们反复咀嚼的苦果。

5. 苏联在党群关系方面的教训在于，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即使这种意志、主张是代表“先进”的思想、是出自“好心”的，也不能如此，否则就非失败不可。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离开这一根本观点，就谈不上历史唯物论，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强制推行广大民众所不理解、不接受的主张和措施，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那些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一意孤行，推行违背民意、不得民心的措施，其政治意图值得怀疑和警惕了，不管它是表现为极右还是极“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是真正的尊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付诸实践，如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邓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都是老百姓家里养的猫。这是一个平淡如水的真理，但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正像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

（二）

如果说党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对内部最重要的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一对最重要的外部关系。

既然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这对矛盾、关系就必然存在；既然取得胜利的国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和严峻。

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个关系，笔者曾在自己主编的专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史论》（《红旗》出版社 1993 年版）的结束语中，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若干历史经验》一文中（北京大学学报，1993 年第一期），作了比较全面的论

述。这里说的“社”、“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不只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本文主要说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国家关系和文化方面的关系。

1.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这里不准备细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是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还是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二者常常是矛盾的。苏联对外战略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其间变化不小。但在决定苏联对外战略的主观因素中，存在着几个几十年一脉相承、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其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时期在不同程度上要考虑其“国际主义义务”。其对外战略，既有“俄罗斯色彩”，也有“共产主义色彩”。

其二，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常常对其采取包围、封锁、孤立、甚至是颠覆的政策。苏联不能不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警惕战争的危险。

其三，苏联是一个从具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传统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传统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这些好听的词句使得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旗号、包装。因而70年来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这个思想，只是国际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

其四，苏联是世界大国而且是一个国土广袤、资源其丰，历史上曾多次打败强敌的侵犯，具有辉煌文化的大国。这种状况使它自觉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使它比一般国家更想在国际社会中起作用。在当今如此尖锐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赛中，它不可能甘于寂寞，安于国内事务。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当苏联超出自身安全考虑，当它想用扩张主义把自己的社会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时，它尝到的已经不是苦果，而是毒果了。

苏联在世界称雄争霸对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其实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常使内政被置于服从的地位。为了实现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方针不易改变；① 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无法理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易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从而限制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②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苏联扩张主义有一个认识根源：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新的情况缺乏正确估量。苏联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危机不断深化。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苏共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适应世界上新的形势"，但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在"继续加深"。二十五大进而强调"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二十六大的提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半个世纪过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苏共看来，仍然是"总危机"，实际情况如何，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苏共搞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的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不能埋头苦干，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于是，它踌躇满志、东张西望，宣称"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并"随时作好使经济转入战

---

① 据统计，苏联60%的优秀科技人员以及大量的精良的技术设备集中于军事部门；战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机械工业部门70%的产值是军事工业。

②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每年花在阿富汗、越南、古巴等国的开支竟达百亿美元。叶利钦总统的顾问谢尔盖·加拉加诺夫说，前苏联几乎把国民收入的25%用于军备，仅每年用于援助中东欧国家和亚非拉"盟友"的经费就达230亿美元。

时轨道的准备”;于是它凭借着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张,同美国争霸天下。

2. 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1] 人们常常记住“掘墓人”而忘记“继承人”。列宁对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认识是很正确、精辟的,而且是比较一贯的。他有的话说得很肯定,甚至可以说是很绝对。如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把这个不少人熟悉的公式再抽象,便是苏维埃政权+西文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结果使这些文明成果变成似乎资产阶级一家独有。其实,许多东西是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共同规律的东西,是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会离开或偏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大道,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机制的病根之一就是始终未能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当时党纲规定要以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取消货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卷,第244页。

币。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的使市场“常态化”的理论，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到了商品货币不断消亡的阶段。到50年代初，斯大林的认识有了变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他又留下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对立的，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等教条。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人们在市场问题上的理论视野。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60年代后半期，当东欧改革掀起高浪潮，人们对市场问题认识又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又发起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把它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计划生产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要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等等。①

苏联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几起几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化教条。然而它始终没能根本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因而苏联经济长期以来计划与市场脱节，产需脱节，劳动者的贡献同个人利益脱节，科技发明同生产脱节等等，经济没有内在的动力和活力，直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产品价格仍由国家规定，95%左右的物质仍由国家调拨。当苏联认识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时，已是积重难反。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崩溃，陷于“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可悲境地，苏联经济体制的瓦解和政治制度的解体几乎是同步的。

我想再说说关于政治文明成果问题。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

① 参见中国社科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92页。

果，也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它是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不应该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而包含着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批判继承的民主政治的一些共同规律的东西。

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对于苏共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并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对立来、没有注意批判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果。笔者至今未查到斯大林谈论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经验的言论。

苏联政治模式的主要弊端是什么？我们常说是“高度集权”。这两年来笔者常想，这么看似未抓住关键。看来，其致命的弊端有两个：一是国家安全机关对包括高层人物在内的全社会的控制、监视和无法无天的镇压；另一个是监督制度和机制的薄弱、极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之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苏联，监察、监督机关缺乏相应的、实际的权力，而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最需要制约的恰恰是监督体系达不到的地方。于是，最高领导人所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和灾难的错误、罪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只有在他们身后或他们在具有政变性质的党内斗争中败北之后，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是已经太晚了。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个“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它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历史经过几千年积累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的经验总结，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认真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清洗，不正是由于他的权力没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吗？如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规定了“向富农进攻”的政策，一个多月以后，斯大林个人又提出了“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从“向富农进攻”，变成“消灭富农阶级”，这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这一转变竟是由他个人决定的。1934年12月，即基洛夫被杀之后，斯大林竟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就发出在全国清洗“恐怖组织”如此重要的文件。大清洗正是这样开始的。1939年初，斯大林竟以个人的名义发出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一步步把改革之车推向泥潭，不也是由于他的权力同样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吗?!

7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说明，当主要的领导人尚缺乏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权威”、并受到一定制约，尚能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时，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反之就常常把事情办糟。

这是值得深思的。

四　痛失改革机遇和改革失误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的“兴”与“亡”，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最大事件，也是人类社会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它必将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苏联的兴亡，特别是研究苏联最后垮台的原因和教训，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将是理论界和史学界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历届苏共领导人延误改革是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

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恩格斯的这个至理名言，完全适用于苏联的情况。过去苏联的问题，恰恰在于让原有的体制基本上保持“一成不变”，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对它进行及时的改革。

人们在分析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时，常常列举苏联历届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事实。的确，他们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民族问题、对外政策等等方面都犯有许许多多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们最严重的错误应该说发生在改革问题上。也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说，不对原有的体制及时进行改革，是戈尔巴乔夫以前历届苏联领导人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

我们知道，列宁是十分重视改革的。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虽然是在列宁时期开创的，但这种体制在当时尚不完备，还未定型，而且变化较多。列宁晚年曾倡导实行具有伟大意义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是，后来的领导人没有按列宁的思想坚持改革，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改革的时机。

现在看来，苏联几十年来起码错过了三次改革的良好时机。

第一次良机是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斯大林晚年时期。当时，世界战争已经结束，开始出现和平和发展的机会，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摆脱孤立，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同时，苏联的经济规模也扩大了，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迫切需要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本应当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在国内克服高度集权带来的弊病，限制个人迷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则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的有效办法。但苏联领导人未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面对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斯大林骄傲了，不谨慎了，主观主义越来越严重了，因此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反而被固定起来，出现僵化的趋势，个人迷信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斯大林还提出一个著名论点："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也是对立的世界市场"。① 斯大林提出这个论点，显然妨碍了苏联的改革开放，割断了苏联同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导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战后的苏联，国内的确出现过改革的思潮。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辛斯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基，首先提出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他在1947年出版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强调：价值规律是“生产耗费与产品分配方面最起码的规律”，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应“利用价值规律来确定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所必需的比例关系”，国家计划要“运用价值规律来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正确分配社会劳动”。然而，这个主张当时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谋求资本主义的复辟”。随后，沃兹涅辛斯基本人也被撤职查办，乃至处决。

当时的农村也出现过改革的实验。1947—1950年间，苏联很多地区的集体农庄建立了独立的生产小组，实行“包产到组”的试验。其中以库尔斯克州最为突出。这个州的集体农庄根据州委指示，把农具、牲畜和所有耕地至少在一年期间或者一个轮作期间内固定包给生产小组。每个小组负责自己地段上的全套农活，并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粮食。这种有效的试验，当时得到负责领导全国农业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的支持。然而，这种试验后来也遭到严厉的批判。1950年2月19日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说，这是“倒退”，是“把统一的大型集体经济分割成为小的生产单位”，“损害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基础”。文章还指名批判了安德烈耶夫。于是，安德烈耶夫被迫作了公开的检讨，随后在苏共十九大上被排挤出政治局。

第二次时机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当时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严重弊病，主张并实行改革，但他的改革路子不太对头，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例如1957年，赫鲁晓夫把工业和建筑业的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撤销管理经济的中央各部，成立为数众多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改革，不是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市场取向，而是维持行政命令体制，仅仅是换了一个“婆婆”，把中央的行政命令变成地方的行政命令。结果，改革未见成效，反而产生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

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虽然改变了农业计划制度，赋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一定的自主权，但同时又强调“一大二公”，用合并的办法大大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并把许多贫穷的、亏损的集体农庄改成国营农场。

赫鲁晓夫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直到1962—1963年，苏联才组织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强调利润、工资、奖金等等经济刺激手段。但整个说来，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路子不对头，使苏联又一次失去了改革的良好时机。

第三次时机是在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虽然实行“新经济体制”，减少计划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改革的办法不多，步子不大。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前后，苏联的改革就停止和后退了，从此对原有体制只讲“完善”和“发展”，讳言“改革”。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著名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美化了现实社会，掩盖了存在问题，夸大了成绩，满足于现状，从而使人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按照这个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既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必要实行改革呢？

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改革的形势已经十分紧迫，改革的条件也已相当成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在全世界广泛掀起，苏联原有体制的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更加严重，其经济的增长率也越来越下降，社会主义各国都在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纷纷进行改革，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苏联的政局和社会长期比较稳定，优于以前各个时期，其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达到历史的顶峰，人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因此，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条件都已相当明显和成熟。但是，勃列日涅夫才能平庸，生性谨慎，求稳怕乱，他就是不搞改革。还有一个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初得了中风和心肌梗塞，此后健康状况

一直很差，根本没有精力工作和思考问题，只能勉强维持现状。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重大错误之一，是错过了科技革命的大好时机。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浪潮，苏联不仅没有跟上，而且大大落后了。这对苏联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不利的消极作用。勃列日涅夫晚年也看到科技革命的重要性，口头上多次强调要搞科技革命，但没有采取实际措施。

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又一次错过了改革的时机。这是第三次错过时机，比前两次的危害更大，而且更不可原谅。客观地说，在斯大林晚年和赫鲁晓夫时期，原有的体制还在发挥积极作用，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比较高，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也有某些欠缺，因此当时错过改革的时机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勃列日涅夫在形势十分紧迫和条件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再次错过改革时机，而且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后一次良机，这就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了。这样，便使苏联社会积累了大量矛盾，形成严重的潜伏危机，从而为苏联的剧变提供了条件。所以，从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来说，勃列日涅夫要负主要责任。

（二）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路线是苏联剧变的关键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体上以 1988 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改革基本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并未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轨道。当然，他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已经包含严重错误。而在后一阶段，他开始推行错误的路线，改革的方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结果，便导致苏

共逐步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具体说来，这条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片面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导致社会混乱

戈尔巴乔夫大讲特讲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在实践中又有严重错误。

例如，关于“公开性”。应该说，针对过去政治生活过分保密和封闭的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任务本来是无可非义的。但戈尔巴乔夫所搞的“公开性”有两个错误，第一，他鼓吹“彻底的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彻底的公开性”，即使在具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很多事情也是保密的。第二，“公开性”的导向有严重错误。这种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专门用来揭露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而且允许利用“公开性”来反共反社会主义。这样，便走上了全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所以，这种“公开性”实际上成了苏联剧变的重要突破口。

再如，关于“民主化”。针对过去民主不够的弊病，提出发扬民主的任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前提，不能允许利用民主化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强调，苏联要有“无条件的民主”。这种“民主化”也有两个错误。一是不分阶级，不要专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讲民主。二是不要集中，不讲法律和纪律，走向无政府主义和绝对民主。结果便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社会动乱的普遍发展。

2. 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列主义指导

戈尔巴乔夫大讲特讲的“多元论”，起先说的主要是“意见多元化”。其实，针对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

承认和允许存在“意见多元”的事实，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允许“意见多元”不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去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片面宣扬“多元论”，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他反复强调，要“摒弃精神垄断”，要“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他还用总统令颁布《新闻出版法》，宣布实行“新闻自由”，从而以法律形式固定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否定马列主义指导的必然结果，一是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二是破坏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主张“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

戈尔巴乔夫的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鼓吹“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并把“议会制”、“多党制”和“总统制”作为自己的实践纲领。

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戈尔巴乔夫强调现行政治体制已成为改革的“阻碍”，必须加以“根本改革”，同时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便使领导和群众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领域，忽视了经济改革和生产建设。我们看到，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二十八大的两年间，苏共中央开了十三次全会，其中只有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1989年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其余全都主要讨论政治问题。在此期间，开了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搞了三次群众性的选举（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和苏共二十八大代表），并对宪法作了两次重大修改。面对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苏联领导人还有什么精力去考虑和研究经济问题呢？同样，广大群众的注意力也被引导到争取民主权利方面。结果，游

行、示威、罢工、民族冲突此伏彼起，社会动乱遍及全国。

第二次，推行“议会制”，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决定，要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并强调要区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使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但是，会议忽视了如何保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问题。其实，这一套是按照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搞的，其代表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所谓“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实际上就是剥夺苏共中央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权。所谓“自由选举”，实际上就是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合法地进入国家权力机关。

第三，实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1990 年的二月全会，是苏联剧变过程中的一次突变。这次会议决定，要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所谓“多党制”，实际上就是否定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向共产党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就在苏共二月全会之后的一年里，便出现全苏性政党 20 个，共和国一级政党 500 多个。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大部分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它们利用共产党的错误，积极开展反共活动，夺取各级国家政权。

第四，实行总统制，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总统制，并不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总统制，而是美国、法国式的总统制，其实质是进一步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因此，自苏联实行总统制后，苏共中央便丧失了一切权力，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出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不再受共产党的制约。他后来甚至利用总统职权，解散苏共组织，停止苏共活动，没收苏共财产。

总之，所谓对政治体制实行“根本改革”，实际上是“根本摧毁”原有的政治体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其结果便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一步一步夺取了国家政权，共产党则丢失了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彻底摧毁。这正是导致苏联剧变最重要的

原因。

4. 大搞党的“彻底革新”，实际是在一步一步搞垮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虽然宣称“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实际上从未认真地依靠党的组织来推行改革。相反，却把“改革”的矛头始终指向共产党，把苏共看作改革的“障碍”，把党的领导看作“行政命令体制”的根源，把广大学员和党的干部看作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从否定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分裂共产党的组织，到宣布解散共产党、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共产党搞垮的。

第一，撤换党的领导干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在“改革”的旗号下大批撤换领导干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他又对苏共的领导干部动了三次大手术。第一次是1988年9月30日的苏共中央全会，撤换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葛罗米柯等五人。第二次是1989年4月5日的苏共中央全会，让110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退休辞职，从而消除了一支可能起来抵制和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潜在力量。第三次是1989年9月9—20日的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等人的职务。结果，苏共内部的“传统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沉重的打击。

第二，与此同时，他又大力改组党的领导机构。1988年9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成立关于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经济、国际、法律、农业共六个委员会，以取代书记处的工作。这六个委员会，实际上只起咨询机构的作用。按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的说法：这就“埋葬了书记处”，“党失掉了战略司令部”。后来，政治局的会议也开得越来越少，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总之，经过这样的“改革”，苏共中央已经近乎瘫痪，它不再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而且越来越失去对国家大事的影

响力。

第三，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苏共二十八大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转折。这次大会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大会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五个“变化”上：一是指导思想变了。苏共不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提“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同时强调“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明确表明：“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二是奋斗目标变了。苏共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三是阶级性质变了。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只提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四是地位作用变了。苏共不再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而变成是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的平等伙伴。苏共也不再是“战斗先锋队”，而是“起着议会党作用”。五是组织原则变了。民主集中制不再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其实质内容大都已被否定。例如规定：少数人有权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从基层组织开始的所有苏共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

总之，苏共二十八大确定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基本面貌。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便破坏了苏共的团结和统一，搞乱了党员的思想，瓦解了党的组织，使苏共在反共势力的强大进攻面前丧失了战斗力。

第四，分裂共产党的组织。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其实早就搞乱了党内的思想。后来由于改变党的性质、抛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使党内从思想混乱发展

为组织分裂。1990 年二月全会前后，苏共内部分别成立了“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等等。到 1991 年，苏共组织分裂的趋势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各种派别组织。连当时的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都说，苏共内部究竟有多少派别，他也说不清，比较大的派别大概有 10 个。由此可见，苏共已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

除了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分裂以外，苏共还按民族特征出现分裂。1989 年 12 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独立时，该党同时发生分裂，一部分党员赞成独立，一部分党员反对独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也因独立问题发生分裂。“8.19”事件后，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纷纷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而各党内部也随之发生分裂。整个苏共就这样分崩离析了。

五　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形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联邦国家分裂成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苏联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总爆发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矛盾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里就有关问题作一概括分析。

（一）民族关系的特点和隐患

考察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首先应当搞清楚苏联民族关系的状况。从联盟最终解体的角度看，苏联的民族关系蕴含着如下一些特点和隐患。

1. 历史上的民族积怨甚深，潜伏着巨大的离心力

大家知道，苏联的前身是沙皇俄国。在14世纪以前，沙皇俄国原本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至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以后的300年时间内，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吞并了周围100多个民族国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它不是自然接近和融合的结果，而是凭借武力征服所致，因此，也就谈不上具有内在的涵摄力、凝聚力，倒是潜伏着巨大的离心力。历代沙皇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充满离心力的庞大帝国，采用的是高压同化政策。政治上建立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派驻俄罗斯总督和官吏主持政事，凭借庞大的军队严加控制。经济上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不仅摊派名目

繁多的苛捐杂税，而且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阻挠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极力摧残少数民族的文化，禁止他们使用本族语言，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人为地强行俄罗斯化。在民族关系上，沙皇赋予俄罗斯人以种种特权，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对立，以便分而治之。这样，就使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形成很深的民族隔阂，积下了很深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给后来的联盟国家留下了隐患。

2. 列宁的民族与国家思想精萃

关于民族与国家问题，列宁思想精华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列宁认为坚持与巩固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原则。1913 年，列宁在谈到“中央集权制和自治”时，明确地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 1917 年 4 月，列宁重申：“无产阶级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2] 1920 年 10 月，列宁在《论修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4 卷，第 148—149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三卷，第 52、80 页。

改党纲》中说："……我们决不希望分离。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①] 直到建立苏联前夕，列宁仍明确坚持："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②] 其次，针对俄国的具体历史状况和当时表现在俄共（布）一些领导人身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认为这会有害于苏联的长远发展利益，因而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③] 再次，列宁对民族分裂倾向也同样是持批判立场的。他说："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他认为，历史上像德国那样分裂成许多小邦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现象。[④]

综上所述，列宁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并巩固社会主义统一大国的基本原则，为此，共产党人必须针对具体问题，既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也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3. 民族聚居且具备一定的经济独立发展的条件

苏联的民族构成体分加盟共和国（15个）、自治共和国（20个）、自治州（8个）和自治专区（10个）四级。每一个民族构成体分别聚居着相应的民族。这种以大小领域聚居而不是分散杂居的特点，是由沙俄先后兼并相邻民族国家决定的。苏联的这种民族聚居状况为各民族搞地区独立提供了方便。

就各个加盟共和国而言，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经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对某些共和国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它给离心倾向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德意志银行按工业化水平、适合于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70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760页。

③ 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载《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755页起。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13页；并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三卷，第174—175页。

口的产品比重、农业生产、全部农产品中适合出口的比重、工业品自给率、矿产资源、全部原料产品中适合于出口的比重、具备市场社会意识、邻近欧洲的程度、教育程度、居民单一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等12项指标，对苏联所作的分析结果表明，15个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分为三类（得分愈高，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愈大；反之，则愈小)：(1) 高类——乌克兰共83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77分，俄罗斯72分；(2) 中类——格鲁吉亚61分，白俄罗斯55分，哈萨克55分，摩尔多瓦49分，亚美尼亚47分，阿塞拜疆47分；(3) 低类——乌兹别克32分，土库曼27分，吉尔吉斯24分，塔吉克18分。[①]

4. 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微弱多数，阻止国家分裂的力量单薄

在苏联100多个民族中，俄罗斯族是主体民族。但是，俄罗斯人在全苏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仅占微弱多数，且呈下降趋势。根据1959年人口普查资料，俄罗斯人占全苏人口总数的54.6%，1970年普查为53.4%，1979年普查为52.4%，1989年普查为50.8%。而从各个加盟共和国看，俄罗斯人除在俄罗斯联邦所占比重达82.5%（1979年人口普查数字，下同）外，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均居少数地区，有的还很少。如在亚美尼亚只占2.3%，在格鲁吉亚占7.4%，在阿塞拜疆占7.9%，在立陶宛占8.9%，在塔吉克占10.4%，在乌兹别克占10.8%，在白俄罗斯占11.9%，在土库曼占12.6%，在摩尔多瓦占12.8%，在乌克兰占21%，在吉尔吉斯占25.8%，在爱沙尼亚占27.9%，在拉脱维亚占32.6%，在哈萨克占40.8%。这种情况使国家一旦面临分裂威胁时，阻止分裂的力量显得相当单薄。何况主体民族中也有民族分离主义倾向。

---

① 〔苏〕《莫斯科新闻》周刊，1991年第42期，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12期。

（二）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失误

对于苏联这样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民族积怨甚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有很大差异的国家来说，能否正确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及时妥善解决民族矛盾，是关系到联盟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上，列宁依据马克思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结合当时俄国国内外的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原则，以及为巩固和发展联邦制国家而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构想。但因逝世过早，他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为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在苏联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都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并且采取了有利于保证那些过去工业较不发达的共和国的工业产量有较快增长的投资政策，从而使各共和国间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据统计，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总产值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1940年为7.8:1，1990年为6:1；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总产值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1940年为5.7:1，1990年为3.8:1。但是，他们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上，在执行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其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概括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民族进程等同于社会进程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理论上简单化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进而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片面强调民族融合的趋势。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就能消灭民族矛盾、民

族对抗；实行经济一体化，就能实现民族融合。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因而也“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1961年，赫鲁晓夫不仅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把它当做一种新的理论概念，认为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1977年更进一步宣称苏联“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上做到了民族平等”，“我国各民族正日益接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并把它写进了苏联宪法。提倡“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前任的看法。1987年，他认为“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

这些说法不仅不符合苏联民族关系的现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剥削阶级的消灭固然会大大减少民族间的对抗，但剥削阶级的消灭不等于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问题比起阶级问题来，面要广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列宁早就指出，民族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要保持很久、很久。”[①] 他还说，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

苏联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支配下，一方面刻意粉饰太平，掩盖矛盾，对激烈的民族矛盾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当然谈不上采取逐步妥善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案和措施了。另一方面，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无情的打击和压制，当然更谈不上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了。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6页。

2. 只反地方民族主义，不反大俄罗斯主义

在多民族国家里，通常都有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存在。正确地解决好这两种倾向，不让其自由泛滥，是多民族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沙皇俄国一直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导的统一集中制国家，俄罗斯主义的泛滥处于主导方面。民族主义既表现为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又是潜在的分离因素的一种表露。列宁为了建立联盟和巩固联盟，把反倾向的重点放在大俄罗斯主义一方，甚至提出了为了实行民族平等，俄罗斯民族做出让步，甘愿吃亏，实行不平等。这是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斯大林虽然在组建联邦时提出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联盟的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但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他还是遵守列宁的教导，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的危险，重点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但自从联共（布）十七大（1934 年）以后，斯大林在反倾向重点问题上发生了态度转变，开始提出两种倾向都可能成为主要危险，继而发展为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过分地宣传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和奉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言行，无疑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滋长，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压抑感。由于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造成政策上的明显失误。在肃反运动中清洗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大多是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表示不满的人，其中包括当年反对斯大林“自治化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穆吉万尼等。卫国战争中因有以下几种情况而遭到整个民族迁移：(1) 由于少数民族中出现民族败类，而遭到整个民族的放逐；(2) 对新占领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批迁移；(3) 对某些与邻国同族的民族，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迁移，用刺刀逼迫他们离开故土。这种所谓“政治移民”，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人为地造成了更深的民族隔阂。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已成为列宁所说的“俄罗斯化了

的异族人"。斯大林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非俄罗斯民族曾经得到较温和的待遇，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从没有放松过。总体上，他们都是沿着斯大林的路子往前走的。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正是孳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宣传机器对俄罗斯民族大加褒扬而有丝毫改变。

3. 强制少数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又人为地"拉平"地区差距

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强调"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单一化，畸形发展。本来，组织专业化生产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发展地区优势、加速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但是，苏联当局滥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使它们不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应的经济部门，形成适宜的经济体系。结果，严重损害了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利益，滋长了不满情绪。

例如，苏联当局为了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1956 年把哈萨克 1 万平方公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让哈萨克只生产粮食。1963 年，又一次把哈萨克 350 万公顷土地划给乌兹别克种棉花，同时把乌兹别克 505 万公顷可作牧场的土地划给塔吉克专门发展畜牧业。1971 年，又把乌兹别克 2.2 万平方公里不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哈萨克种粮食，迫使乌兹别克成为专门生产棉花的共和国。近 20 多年来，乌兹别克每年都提供占全苏 60%—70% 的棉花，可是棉纺工业却得不到发展，纱锭数只占全苏的 4% 弱，棉布产量只占全苏的 2%—3%，针织内衣、外衣和长短袜的生产所占比重居全苏最末位，每年要从共和国外运进 1.5 亿米左右的棉布和大量的针织品，以解决居民穿衣问题。从 1965 年到 1989 年，乌兹别克的棉花种植面积增加 24%，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31%，以致该共和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一直是全苏最

落后的共和国之一。

进入80年代，苏联又提出了要“拉平”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别的方针，结果，大大加重了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它们的经济利益。因为，要迅速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投资拨款的增加。国家为支付这笔巨额资金，一方面加重了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上交任务，另一方面又相对减少了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追加投资，这就不能不抑制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发达地区民族的怨言，俄罗斯人就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充当奶牛”。

4. 以长官意志代替民族特征作为民族地区归属划分的依据

对于民族构成体的归属，理应按照民族的特征，但苏联在一些民族地区归属的划分上没有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而是依长官意志办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归属的划分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纳卡州位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交界处，80%的居民是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仅占18%。历史上两国为争夺该地曾多次发生战争。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初期，双方都表明了高度的族际主义精神。1920年底，阿塞拜疆表示自愿放弃纳卡地区的管辖权，把它交给亚美尼亚。翌年7月4日，俄共（布）高加索全会通过了把该地区划给亚美尼亚的决定。但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干预，它最终还是被划给了阿塞拜疆。其理由是，当时阿塞拜疆有着比亚美尼亚较强的工人阶级队伍，划归阿塞拜疆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纳卡州人有利。斯大林的这一变更显然有悖于民族地区归属划分的主要依据——民族性标志。纳卡州归属的不当成了阿亚冲突发生和难于解决的根本原因。

又如克里米亚半岛，65%的居民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仅占25%。历史上曾经是克里米亚汗国，1783年并入俄国。1918—1954年归俄罗斯联邦管辖。1954年2月，为了纪念乌克兰与俄罗

斯合并 300 周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划归给乌克兰。这样，就给后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间发生争端埋下了种子。

在苏联，各民族构成体的边界，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不是由各方协商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划定的行政界线，长期存在着许多未定边界，这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俄罗斯与各民族共和国之间、各民族共和国之间一系列纷繁的边界争端。

5. 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在下文里将对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做些分析。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强调。

确实，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时，时时刻刻不要忘记的是，苏联的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二战后，苏联凭借其优越的战略态势、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本可以集中力量大搞和平经济建设，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苏联没有这样做。它把战略重点放在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上，人力、物力资源大部分都投向了这方面，结果，正如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所说："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 70%。"[①] 这是爆发民族危机的总根源。

（三）民族危机的爆发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苏联的民族关系复杂，在民族关系中存在着不少不利于联盟巩固的隐患，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① 俄新社 1998 年 4 月 13 日俄文电。

时期苏联民族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又给联盟前途埋下了新的祸根。在此期间，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的民族矛盾和争端逐步发展，有的时候还表现得相当尖锐，但毕竟限于局部地区，且很快得到解决或被抑制，没有发展到危害全局的程度。那时，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凭借苏联宪法赋予的自由退盟的权利提出过独立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共产党领导作为团结各族人民的核心，作为维系各民族联合的纽带，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有一个握有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利剑的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加上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在那样的条件下，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当然不想提也不敢提退出联盟的要求。

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倡导的"新思维"，大力倡导和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为各民族倾吐积怨提供了机会。随之，在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不大、较为"顺遂"的领域内却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民族动乱，而且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5年秋，在莫斯科红场出现了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米亚祖居地的静坐事件；1986年4月雅库特大学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同年12月哈萨克首府爆发了数千哈萨克人闹事从而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这些在当时被苏领导人认为是个别偶然的事件，实则是发生民族动乱的信号。

1987年8月23日正值苏德条约签定48周年之际，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共和国同时爆发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随之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应运而生并提出独立的要求。以后，这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民族冲突和大规模抗议活动接连不断，致使当地民族与当地讲俄语的居民及共和国同中央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了三国与联盟分道扬镳。从1987年10月起，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民族发生激烈冲突，进而扩展为两共和国间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

对抗，从刀枪棍棒的械斗升级为动用大炮、飞机、坦克和导弹的武装冲突。

随着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民族与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对抗持续升温，新的民族动乱地区不断出现。到1990年底，民族动乱已覆盖苏西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西南部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南部的高加索和东南部的中亚等，约占苏联领土1/3的辽阔区域，苏联人口的近1/3卷入了民族冲突，15个共和国几乎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族骚乱或族际冲突。

民族动乱的加剧，使民族分离倾向日益强烈。1960年3—5月间，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通过独立宣言，声明脱离苏联。特别是在联盟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俄罗斯联邦，在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不久，便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加速了各共和国的分离过程。不仅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步其后尘通过了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连一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也竞相效仿，要求独立和建立共和国。在独立风潮遍布苏联境内的同时，各共和国相继颁布自称“至高无上”的宪法与法律，并接二连三地颁布中央宣布的政令无效。在俄联邦率先向中央争权的带动下，各共和国不断加码，要求拥有土地和财产主权，作为国际法主体直接与外国交往，确定本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乃至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控制财政信贷和海关等等。

在苏境内民族矛盾重新爆发之初，苏共领导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对少数几个热点地区采取某些临时性安抚措施，没有拿出通盘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一直拖到民族动乱蔓延之际，戈尔巴乔夫才于1989年7月惊呼：“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现象的巨大危险，如果冲突蔓延，那我们的日子就可能更糟。”当年9月，苏共中央通过《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放政策》的决议提出，“现实要求必须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决定对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留政放权。但这些大多停留在纸面上的承诺，已不能满足各共和国越来越高的要价，

俄联邦议会更是带头向中央索要内政外交大权，并以有权退出联盟相要挟，其他共和国也一哄而上。

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一再妥协退让。1990 年 6 月 12 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联盟各成员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享有充分国家主权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以代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91 年 3 月又取消了“社会主义”字样，改称“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给予共和国更多的权力。在 1991 年上半年围绕新联盟条约草案的斗争激烈，特别是 6 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后加紧胁迫中央就范的情况下，7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与其初始设想“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大相径庭，使联盟中央几乎完全丧失管理国家职能从而遭到苏联议会、政府、军队和克格勃首脑会议的条约新版本——“9+1”方案。8 月初，戈尔巴乔夫绕过中央与俄罗斯和哈萨克的总统商定，8 月 20 日签署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结果，条约签署的前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 事件”。此后，苏联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公开向苏共开刀，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非法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联盟中央名存实亡，民族分立进程大大加快。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宣布独立（9 月 6 日苏予以承认），其他共和国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俄联邦在其境内主宰联盟中央、各共和国在其所辖领地分别独自行使内政外交职权，从而使联盟陷入崩溃。1991 年 12 月初乌克兰独立，随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明斯克会晤及 11 国阿拉木图会晤产生了独联体，正式宣布了联盟的解体。

民族矛盾发展到民族分立的程度，民族工作中的错误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如下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实行政治多元化，放弃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经济改革受阻的情况下，求助于政治体制改革，搞政治多元化和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先是允许党内外与党对立的派别、团体和组织合法存在，然后是自动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结果是作为维系各民族团结和各共和

国联盟的核心力量的党丧失了战斗力，党被分化瓦解，甚至一些党组织和党领导人演变为搞民族分立主义的先锋和骨干；这样做还为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之迅速膨胀，并夺取政权，与中央分庭抗礼。

其次，不适度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戈氏等领导人一味强调党和国家生活不受任何约束地、最大限度地公开，超越了苏联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势必导致舆论失控、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尤其是对社会阴暗面的大肆揭露和渲染，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泛滥，诱发了无政府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

最后，经济状况全面恶化和滑入崩溃的边缘。一个具有不同语言、宗教、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国家是否有较强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状况。戈氏没有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致使这六年多里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各族人民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每况愈下，怨声载道，这就为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六　从民族角度看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从民族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一）苏联组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原苏联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1991 年解体前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个自治共和国、8 个自治州和 10 民族专区组成，如此复杂的国家体制是世界上少有的。

苏联的前身是沙俄帝国。俄罗斯国原来并不大，16 世纪中叶只有 280 万平方公里，从 16 世纪开始，俄罗斯逐渐扩张，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形成了囊括 100 多个民族和十几种宗教、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

当年被沙俄帝国兼并的地区，实际上就是它的殖民地。沙俄帝国的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殖民地与沙俄帝国本土相连。沙俄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有“各民族的监狱”之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解体，沙俄国内各民族也纷纷起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沙俄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状态。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苏联的成立，在原沙俄帝国的版图上才没有形成若干独立

的小国。

十月革命的炮声从彼得堡打响，然后推向其他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存在革命力量，但势力较弱，政权多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手中。只是在以俄罗斯人为主组成的红军的帮助下，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等地才建立起红色政权。而在波罗的海地区，政权最终为资产阶级所掌握，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承认了这个现实。波兰和芬兰也是在此前不久脱离俄国，获得了独立。

共产党掌权的一些共和国，如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等为对付外来武装干涉，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难题，使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感到有必要走联合的道路。然而，在如何联合的问题上，当时的俄共（布）中央内部和少数民族地区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列宁和斯大林的方法也不同。列宁主张采用联邦制，即各独立的国家以自愿、平等、民主的方式结成联盟。斯大林主张乌克兰等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此前巴什基尔、哈萨克等地区皆以这种方式成为俄联邦的一部分。在讨论组建联盟方案时，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国领导人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在格鲁吉亚甚至发生了殴打不同意斯大林方案者的事件。最终，苏联是按列宁的主张建立了。这种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各共和国仍为“主权”国家，联盟以民族为特点组成，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自由”退出。当时苏联所以组建起来，除上述各共和国有共同的需要和愿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当时领导各独立国家的共产党是统一的，即它们皆受俄共（布）的领导，是俄共（布）的地区组织。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是苏联建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即使这样，一些共和国加入苏联也很勉强，当时少数民族对俄罗斯联邦某些部门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现也时有怨言，共和国之间摩擦不断。

苏联得以建立应归功与列宁，归功于他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灵

活的政策。苏联学者后来称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列宁的创造，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因为此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联邦制是以地域为特征建立起来的。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形式使分散的小国组成一个大国，这符合列宁认为大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苏联的建立，使昔日沙俄帝国的疆土和民族组成格局基本上以苏联这个框架保留下来。一个新政权和新制度在原沙俄帝国版图上诞生了，它的创建者——列宁不久病逝了，接替他掌管新政权的是斯大林，此人却没有彻底抛弃沙俄帝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遗产，使列宁追求的“民族平等”的理想，在其一手制造的新体制下化为泡影。

（二）斯大林体制与苏联民族关系

斯大林从20年代末逐渐控制了苏联大权，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即所谓“斯大林体制”。这种体制在苏联一直沿用近60年，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才逐渐改变。

何谓斯大林体制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通行的说法是，政治上：一党执政、个人专权、缺乏民主；经济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文化上：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追求文化发展的单一性。这种体制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没有越过上述框框。

斯大林体制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在民族关系领域也不例外。在斯大林体制下，原来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较快发展，社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苏联能够存在70来年，与此并非没有关系。然而，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对民族关系伤害之处。由于本文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并希望以此为戒，因此较多谈到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的伤

害。该体制对民族关系的伤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集权，而当年列宁设想的苏联是分权制。尽管斯大林从形式上强化了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如将苏联分成若干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分权原则，各联盟主体感觉不到宪法规定给自己的权利何在。各联盟主体领导人看到的却是现实与法规存在很大的差距。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处境，不时引用列宁的话去追求“民族平等”，向中央索权。由于联盟中央领导人确实存在违背法理之处，因此，不得不依靠手中的权利对共和国领导人施压，甚至严厉镇压反对者，从而使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始终处于“弹簧”状态：中央强硬，共和国就软些；中央一放松，共和国就谋求分立。在苏联存在期间，这些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或者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可能像火山般爆发。

第二，高度集权体制的最大弊病是缺乏民主、个人专权。由于权力过大，缺乏制衡机制，苏联领导人在民族关系方面犯了许多错误，有些错误相当严重，尽管当时有当时的情况，但其影响是恶劣的，也是深远的。现列举几点：

——在农业集体化时不顾民族地区特点，采取“一刀切”做法，使民族地区农牧业受到严重破坏，引起饥荒，少数民族因此死亡或被迫迁出国外的达数百万人。哈萨克斯坦1929年约有500万人，到1933年竟减少了170万人。那里的畜牧业产量到1953年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乌克兰在饥荒中也死亡了近300万人。

——30年代发生的大清洗运动，滥杀无辜，使民族干部、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和普通百姓受到严重摧残。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被捕、被杀的还有大批民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后查明，所

谓“肃反”事件，绝大多数系冤假错案。

——1937—1944年间将涉及20多个、约440万人的少数民族从世代居住地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整个民族被迁移的有11个。迁移工作是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搬迁过程中，不少人病死。在新居住地点又受到“流放者”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对民族实行集体惩罚的做法骇人听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陆续为被迫迁移的民族平了反，但仍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不准返回原居住地。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闹事的主要是这批未获准返回家乡者。

——对外扩张留下后患。这是指1939年斯大林通过与希特勒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用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摩尔多瓦部分领土划归苏联，对当地民族不满者，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苏联此举的根源在于斯大林的“帝国思想”，他认为，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要求独立并非偶然。

——以“反对世界主义”和“医生事件”为借口，掀起排犹运动。二战后，苏联当局借口苏联犹太人参与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反革命活动”，逮捕了苏联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后反犹运动扩大，发展到禁止犹太人在外交、司法等部门工作，关闭犹太人剧院、学校、报社。1952年，斯大林听信诬告，以“谋杀领导人罪”将大批犹太人医生逮捕，还有更多的人被逐出医院、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这些皆为冤假错案，斯大林死后，很快平反。

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伤害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并非没有，但数量明显减少，性质也没有那样严重。伤害民族关系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民族问题本身，因为仅上述事件并不能使苏联解

体。问题在于，人们通过这些事件看到专制体制的危害性，由此产生对国家制度和苏共领导的怀疑。如果说，在事件发生的时代人们尚不能或不敢说出这种想法，那么在尔后年代，当人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提高了，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增强了，势必要对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提出质问，并希望这种现象不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时，会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当有人以这些事件为例而要求改造制造这些事件的制度时，也容易唤起一些人的共鸣。

斯大林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剥夺了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当年组建苏联时曾答应赋予它们的。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 11%。赫鲁晓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 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 3%，勃列日涅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 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 6%。[①] 这就是说，共和国所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甚至为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必须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得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本共和国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

这种体制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由于经济封闭，脱离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道，使经济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逐渐丧失了活力，国家发展逐渐缓慢甚至到了停滞状态。计划体制下的商品供应始终处于紧张的分配状态，人民的生活无法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一

---

① 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0 页。

点也使一些共和国，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共和国，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感到在苏联的体制下共和国不会得到大的发展，因此竭力想摆脱现有体制，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放权想法时，这三国率先要求拥有经济主权。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使苏联失去了对某些共和国的凝聚力。如果说20年代苏联成立时的重要条件是参加国为了谋求共同发展和惧怕外来进攻以求生存，那么到了90年代，一些共和国对经济共同发展已丧失信心，对西方的影响并不惧怕，甚至想方设法去靠近，去加入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集团。这种变化与斯大林体制造成的经济落后分不开，因此可以说，是斯大林体制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体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推行文化单一化的政策，也对民族感情有所伤害。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以俄罗斯为中心展开的，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色彩。例如，在阐述历史时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自愿归并"。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当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抗俄英雄时，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少数民族从小就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而不知道本民族的文化哲人。事实上，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要比俄罗斯的历史长得多，也不乏作家诗人。又如采用行政手段大力推广俄语，也对少数民族的感情造成伤害。如果说，在少数民族全民文化水平不高，知识分子队伍未形成时，这种做法还不会引起多大非议。而到了80年代，各少数民族已完全消除了文盲，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这种文化政策势必与民族自我意识增长这一趋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在滋长，甚至包括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皆因不赞成苏共中央的某些政策而被撤职，一批下属因此受到株连。有的人如乌克兰作家伊凡·久巴，由于反对苏共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政策，竟被逮捕入狱。至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极力宣扬的“苏联人民——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的理论，则是加速苏联各族人民向俄罗斯族同化的理论。由于苏共从斯大林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从而激发了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滋长。布热津斯基在谈到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①]

如上所述，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问题在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历任苏共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成绩的一面，而忽视问题的一面，甚至还在自安自慰，说苏联民族问题解决了，甚至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为民族问题是“顺遂的”领域。这样看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往往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三）戈尔巴乔夫错在哪里？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苏联垮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仅此而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是有过错的。那么，错在哪里呢？

首先，他忽略或者说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1985年，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

他接过的苏联已经是危机四伏的国家。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经济的停滞，政治上缺乏民主，并为此提出了改革的设想。但他惟独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因为他当时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直到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才承认，“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藏的危险性。”[①] 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危险性，因此，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到来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②] 思想准备不足导致戈尔巴乔夫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步伐混乱，先“左”后右。

其次，政治改革的错误有三方面内容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时，没有想到这会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怨。正是在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民族问题一下子抖出来，使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二是由舆论多元化转向“政治多元化”，最后发展到多党制，使苏共丧失了以往的地位，给民族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三是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提出改变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向加盟共和国放权，结果导致权力失控，联盟中央被逐步架空。这个问题与苏共丧失领导权是同步发生的。

第三，同经济没搞好也有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六年，非但没有改变苏联经济停滞的状况，相反，却把国家引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共和国对戈尔巴乔夫治国方略失去信心，都在想方设法另谋他途。

第四，与苏共的变化有关，而且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在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能不提到苏共，因为苏共与苏联民族进程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苏共有关，问题同样与苏共有关。苏共强大和稳固时，民族问题

---

① 《真理报》1990年7月3日。

② 同上。

就少一些；反之民族问题就复杂一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化，随着改革的矛头指向苏共，特别是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法律地位之后，苏联民族问题就越来越多，民族问题的性质也从一般性民族矛盾转向谋求分立。随着苏共对加盟共和国控制的减弱或者丧失在共和国的执政地位，民族分立的势头就越来越猛。“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统一的苏共不存在了，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苏共与民族关系这样密切？这与苏联权力集中在苏共手中有关。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名义上是政党，实际上是政权组织，而且是垂直领导、辐射到全国各地的组织。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皆控制在苏共手中，并通过各级组织行使权力。苏共犹如一条纽带把各加盟共和国牢牢拴在一起。当年苏联组建时，因为有统一的俄共（布）存在，即使有的共和国不情愿参加，也得参加。我们说，苏联成立有三个条件：在敌对势力的压力下求生的需要；谋求共渡经济难关的需要；有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前两个条件由于斯大林体制的错误已近于丧失，那么，统一的苏共还是存在的。尽管它本身也存在问题。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致命一击等于剪断了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有着复杂民族关系和联邦制结构的国家来说，需要有一条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也需要有对搞民族分裂的势力施加威慑的力量。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而戈尔巴乔夫在尚未找到可以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时，放松甚至抛弃了苏共这条纽带，导致“诸侯”四起，国家权力失控，这不能不说是苏共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关于外来影响问题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明显存在外来影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鞑靼

人的抗议活动，还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脱离苏联开展的活动中，都有西方势力插手。乌克兰未独立前，美国即放风说可以考虑承认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外来影响的另一面，还是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苏联各共和国所起的诱惑作用。关于这一点上面已谈到，就不赘述了。

这里我想就“和平演变”问题谈点想法。

西方国家反对苏联是一贯的，苏联反对美国也是一贯的。同样作为联邦制国家，苏联解体了，美国则没有，说明问题出在国内。写到这里，我想引用布热津斯基 1971 年讲过的一段话。他在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① 的文章中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苏联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苏联同时出现国内危机和国际灾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的瘫痪，社会上层的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外灾难是指因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使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并没有发生，苏联国内形势却出现布热津斯基所设想的变化。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在内乱的作用下解体了。看来问题并非出在外面，关键在于自己。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苏联解体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

（五）对一个问题的回答

这里还想回答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那样容易就解体了，而且刚好按联盟主体的数量即加盟共和国的数量解体的，不多不少恰恰分成 15 个？苏联的民族数量决不止 15 个，而有 100 多个。无独有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情况也与此

① 此文译文见《民族译丛》1989 年第二期。

相似。

应该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是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国家。苏联最早建立，后两个国家是仿效苏联的产物。

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具有的特点是，联邦主体即各加盟共和国：①除外交、国防外，基本上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所有管理机构；②形成了以当地民族为主的领导班子，这已成为惯例，并为法律所规定；③联邦主体内的主体民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把用本民族命名的民族自治实体视为“自己的”国家，把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视为“外来民族”，并采用各种手段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④受示范效应的影响，联邦主体内的一些“次主体民族”也谋求享有同样的特殊地位，建立“自己的国家”，从而导致不时出现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上述几点决定了，一旦有条件独立时，联邦主体很快就可以独立，因为现成的机构设置，领导班子构成，特别是主体民族的国家意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为了赢得独立，以主体民族为主形成的领导班子往往起着组织和推动作用，这从苏联解体中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表现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苏联当年采用这种联邦制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当时，还看不出这种联邦制具有的局限性。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这种联邦制形式极易产生移民、语言、干部使用等民族冲突，更主要的是不时会发生谋求分立的问题。这种联邦制形式客观上在不断强化民族观念，使生活在某个联邦主体内的各民族公民并非真的享有平等的权利。苏联所以能存在 70 多年，主要是靠有统一的共产党组织这条纽带在起着作用。而这种条件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发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情况，解体就真的发生了。那么，为什么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其他民族自治实体不能呢？这缘于苏联宪法。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是“联盟主体”，拥有主权，可以自由退出，其他民族

自治实体则没有这种权利。苏联宪法给予加盟共和国的自由度甚至超过美国宪法对各州的规定。加盟共和国正是利用该规定自由地、合法地解体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亦然。南斯拉夫波黑发生内战，受到国际社会干预，这与交战各方均非联邦主体有关。相反，西方国家动用武力保证作为联邦主体波黑的统一。前苏联的鞑靼和车臣两个自治共和国谋求脱离苏联独立未果，在苏联解体时它们也没能独立，同样与它们不是联盟主体有关，事实上鞑靼斯坦按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已超过现已独立的某些国家。因此，我们在深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对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此举的目的不是要追究责任，而在于总结历史，以警示后人。正是由于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存在这些不足之处，新独立的各国均不采用这种国家体制。由于历史原因而无法改变体制的俄罗斯联邦，也通过宪法和其他法规，克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的弱点，强化“俄罗斯联邦的完整性”、“公民平等”，弱化民族意识，增强国民意识，以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家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七　苏联何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垮台
——评苏联早期决策机制的形成

苏联解体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然而人们探索这个超级大国解体的原因的兴趣始终未减。国内外各种研究著作中都强调戈尔巴乔夫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何以能搞垮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况且许多研究著作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能力和魄力的政治家。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共产党拥有1900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人反对放弃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解体，但是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政策和苏联国家即将解体的现实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因为苏联的决策机制本身赋予最高领导人的权利限制了普通党员和干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本文试图对苏联决策机制的形成作一探讨。

（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按照苏联宪法，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由俄语 COBET 一词音译而来）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时期由俄国无产阶级创造的群众性政治组织。1905年10月，俄国爆发了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沙皇制度的公开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心，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此外，当时还出现了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人民创建的苏维埃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

在1917年二月革命过程中，彼得格勒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形成了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且掌握了实际上的领导权。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过程中，列宁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思想。

推翻专制制度后，在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治势力是有原则分歧的。比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孟什维克认为苏维埃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简易木房"，立宪会议才是"坚固的大厦"。当时同在苏维埃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既拥护苏维埃，也拥护临时政府。他们对临时政府寄予更大的希望。他们号召建立地方苏维埃并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但是社会革命党人不认为苏维埃是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他们认为，主要的国家管理机关是临时政府，而苏维埃是"人民和社会主义力量联结的纽带"，是革命的发动机，其作用是推动临时政府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监督政府的活动。因此，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主张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批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性，认为议会不过是个"清谈馆"，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弊病。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①] 列宁认为，苏维埃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是比任何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更加民主的制度，它使一切劳动者真正享有平等权利，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管理，而不是像在所谓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第722页。

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按照列宁的构想，苏维埃把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保证工农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并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

在实际生活中，苏维埃政权的确是这样组建起来的。最高国家权利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两届代表大会间隔期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 年苏联成立后，各加盟共和国也建立了相应的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是立法机关，也是执行和管理机关。它负责组建政府，制定政府活动的总方针，监督宪法的执行情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既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时也在各苏维埃机构和企业中工作。最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常设办事机构，几乎经常不断地开会，从 1918 年起，改为定期开会，而到 1919 年，由于其所有成员都到前线作战，就无法开会了。

苏联成立后，建立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开始是一院制，从 1923 年 7 月起为两院制。两院具有平等的权利，分别进行表决。最初，两院是分别讨论问题，共同讨论问题的建议经常得不到支持。从 20 年代末起，经两院同意，经常召开联席会议。这同 20 年代末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

根据 1924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和 1923 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批准有关政治和经济生活准则的法令；通过苏联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建立全苏的税收制度，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解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废除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违反苏联宪法的决定，建立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制度，确立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举借外债，批准条约。

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临时工农政府——俄

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成立后，建立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这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管理机构。

（二）从多党联合执政到一党执政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多党参政的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左”翼政党的代表。但是，作为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的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人民委员会最初是一党政府。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没有建议他们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初也没有接受参加政府的建议，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参加了苏维埃政府。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何对待立宪会议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克伦斯基政府曾指定在 1917 年 11 月 12 日（旧历）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没有改变这个日期。在 68 个选区中，布尔什维克获得 24%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各民族地区政党的代表共得 59%的选票，立宪民主党和比立宪民主党更右倾的政党得 17%的选票。在立宪会议 703 个议席中，社会革命党人得 229 席，布尔什维克得 168 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得 39 席，立宪民主党人得 17 席，孟什维克得 16 席。选举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千方百计将立宪会议开始工作的时间推迟到 1918 年 1 月 5 日，即召开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犹豫不决，是解散立宪会议，还是把立宪会议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组成革命公会。许多人根据 1789—1794 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因此他们建议建立作为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公会，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当时俄国已经有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即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需通过全国的代表机关使它的权力合法化就行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立宪会议，苏维埃例行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俄国宪法（基本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反对工人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人，对立宪会议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希望立宪会议能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那里把政权夺过来，并按照议会民主国家的模式来组建政权，即有一定任期的当选议员是立法权力的惟一代表。从原则上讲，当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由于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立宪会议同意十月革命后通过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组建政权，而自己只根据国内社会革命日益发展的需要从事制定最重要的法律的工作。此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反对在俄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经济生活。比如，孟什维克认为，只有工业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社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大多数人民都关心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国家坚决地干预经济生活，国家调节生产、运输和分配，对最重要的消费品实行专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拿起武器保卫立宪会议。1917 年 11 月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

但是，多数工人和士兵是忠于人民委员会的，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准备解散立宪会议。

1918 年 1 月 5 日 16 时，立宪会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举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宣布俄国立宪会议开幕，然后宣布前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 这实际上是向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多数派发出最后通牒：或者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或者反对苏维埃政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三卷，第 386—388 页。

权。在就会议日程进行表决时，立宪会议多数派拒绝讨论《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暂时休会，以便召开党团会议。两党领导人决定让大家随便发言，但是第二天不复会，而是宣布立宪会议解散。复会后，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首先发言，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发言。他们宣读了退出立宪会议的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1月6日，人民委员会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此前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①] 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1月6日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赞成，二票反对，五票弃权，通过这项法令并在苏维埃报上发表。

因此，在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的斗争中，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胜利。立宪会议被取消，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受到一次打击，使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断缩小。

此外，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布尔什维克曾经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府中进行过和谐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密切起来。在许多场合下，他们都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之一斯皮里多诺娃曾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惟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诚恳地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与执政。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其常设委员会中获得了1/3的代表资格和名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平等原则共同承担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机构即各局的领导工作。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主张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的统一，而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451—452页。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分权原则并主张议会制，要求人民委员会在重大问题上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联合执政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许多重大问题向政府进行质询，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和签定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发生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尤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粮食政策和农民政策，坚决反对《关于粮食专政》等法令。1918 年 6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俄共（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实行高度集中制，用专政代替官僚机关，成立不受地方苏维埃监督和领导的征粮队，搞乱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卡姆柯夫在总结发言时甚至号召再次进行武装起义。

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彻底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批准同德国签定的布列斯特和约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顺利合作以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918 年 7 月 6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了德国驻俄国大使米尔巴赫，希望以此造成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既成事实。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德国人并不急于撕毁布列斯特和约。于是，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自己免遭逮捕，竟去逮捕捷尔仁斯基。他们更没有想到，党的领袖之一，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普罗相的举动大大超出了他们事先约好的范围，他竟占领电报局，向全俄发出通令，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掌权。这一天，历史的公理无疑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布尔什维克国务活动家们对这种有可能破坏以高昂的代价得到的和平喘息时机的作法，采取了坚决而果断的措施。当时正在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 年 7 月 4—7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一个强大的政党在两天时间里失去了政治空间和统一的领导，变成

一群乌合之众，各奔东西。

从此，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党——俄共(布)。俄共（布）成了惟一的执政党。它要带领俄国人民沿着一条全新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随着布尔什维克在政治舞台上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其他政党纷纷从苏俄政治舞台上消失。这些政党的消失，同它们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有必然的联系。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和苏维埃，他们主张搞西欧式的议会民主。在同布尔什维克的争论和斗争中，他们不惜采用暴力和暴动手段。而布尔什维克对他们也采取了势不两立的立场。应当指出，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主张搞一党制的。当国外有人批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搞一党制，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活动时，托姆斯基曾并非开玩笑地说，我们这里不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政党，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政党存在，所不同的是，我们这里一个政党在执政，而其他政党在监狱。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在多党竞争中确立自己的执政地位，有各方面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在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无疑是最出色的。且不说黑帮、立宪民主党等大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腐朽和没落，即使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虽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以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为指导原则，但是，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甚至在一些纲领性原则上受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的影响太大，提出的策略和观点往往脱离俄国的实际。而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虽然也常年流亡国外，但是，他始终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进行过科学系统的研究并根据俄国的实际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斗争策略。正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引导布尔什维克走向胜利。

在客观方面，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对俄国一党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俄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没有建立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私有者阶层、中间阶层。政治上实行沙皇君主专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严格地讲，革命前缺乏民主设施和民主传统，居民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心理。在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甚至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也无法达成协议，不能互相理解，经常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解决分歧。这也是苏俄最终形成一党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布尔什维克能在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则与其党内铁的纪律有关。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 那么这种铁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列宁指出："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②] 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仍能顺利地实现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从而保证布尔什维克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正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之处。而其他政党，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的分歧和分裂之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136页。

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策略和行动。

严格的集中和纪律是布尔什维克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执政特点。

（三）执政党与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众所周知，列宁希望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让全体人民都来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但是，列宁后来发现由于俄国文化和教育发展落后，不可能立刻实现这个想法。列宁承认："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

这样一来，实际上明确了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替劳动群众进行国家管理的思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对此作出了更加明确和详尽的规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共产党要特别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在所有的苏维埃组织中，绝对必须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在该苏维埃组织中工作的全体俄共党员都应该参加这种党团。"俄共应该把自己最坚定忠实的党员提拔到所有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②

这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论述党和苏维埃关系的文件，该文件同时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三卷，第770页。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0—571页。

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根据这样的原则也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的其他机构包括行政—政治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以及军队，等等。理论上，共产党是实行一般政治和政策性领导，即通过制定政治路线来解决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问题，把自己的政策变成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法律、法令、决议等贯彻下去，并通过党员保证和监督这些法律、法令、决议的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宁曾多次强调，干部的选拔和配备不仅是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于是各级苏维埃、国家管理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由党组织推荐，实际上是任命。此外，还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采取兼职的形式。比如，区委第一书记都在同级苏维埃执委会中兼职，俄共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协调党和国家机关的行动。当时列宁就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共产党和各级权力机关的这种相互关系自然而然地使党内的纪律和领导作风推广到苏维埃及其他管理机关中去。这种工作作风的典型特征就是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以及行政命令。此外，由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①] 因此更加重了行政命令的作风。这种状况导致党、苏维埃和其他国家管理机关职责不清，经常是以党代政，官僚主义现象严重。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虽然无论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列宁本人，都一再强调不能混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22 年，列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 698 页。

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①] 很多小而具体的事情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而从形式上规定不允许这样做有很大困难，因为国家是由惟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执政党内部又实行严格的集中和纪律。列宁曾坦率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能动了……”。[②]

但是，党政不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党的有关文件已经确定了党同其他机关的关系，党员对党组织应负的责任。虽然党员在政府各机关和各级权利机关中担任负责工作，但是他主要应该服从党组织领导，听从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这一点已经深深地印在党员的脑海里并有党的纪律的约束。举一例子。1922 年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在讨论检查机关条例草案时，因“双重”领导问题引起激烈争论。司法人员委员部起草的条例草案第五条规定：“地方检察长越过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受共和国检察长的领导；地方检察长的任免、调动和停职也只通过共和国检察长”。常会有关委员会在审议该条款时，多数委员主张地方检察长受省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通过共和国检察长）的双重领导。俄共（布）中央为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实际上，这是否定司法、检察机关独立，把司法、检察机关置于地方行政当局，主要是置于俄共（布）地方党委的领导之下。因此，列宁专门通过电话口授给政治局一封信，建议中央委员会否定“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5 月 22 日，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审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 696 页。

② 同上。

议。可是，常会共产党党团仍主张"双重领导"。最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出面干预，才使否定"双重领导"的条款获得通过。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执政党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事实上，一切重要问题，甚至并非重要的问题都要由俄共（布）最高机关解决。久而久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又有了发展，发展到党就是国家政权，发展到机构重叠、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由于机构重复设置，党的机构一般负责通过决议，而政府机构一般负责执行，因此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脱节，决策缺乏科学性，执行缺乏积极性。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直至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种作法一直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体制存在于所谓的苏联模式之中。

（四）执政党内的决策机制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并确立了对所有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因此党组织的组织政治活动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党组织的建设对国家的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

俄共（布）的组织政治原则是在 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众所周知，这时正值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和苏维埃国家正实行严格的集中制、铁的纪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政治活动原则的制定有所影响。

按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设想，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俄共（布）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表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由 19 名委员和八名候补委员组成。根据俄共（布）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讨论"一切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

问题"。为了主持日常的政治和组织实践工作，俄共（布）中央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局也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组织局还主管中央鼓动宣传部、登记和分配部、党的新闻部等部门。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由组织局成员担任）和五名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组成。决议明确要求党组织"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决议号召党力争在当前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全部统治。[①] 实际上，这意味着俄共（布）中央组织政治结构的权限不仅扩大到各级党委会，而且扩大到包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国家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被忽视，从宪法规定的实行最高立法和执行权力的集体领导机关变成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长制领导的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只是为批准俄共（布）中央起草的法案。

俄共作为主要决策机关，干部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共的干部制度是这样的：在俄共（布）中央注册的干部为俄共（布）中央"主管干部"；在省委注册的人为省委"主管干部"，以次类推。各级"主管干部"职务的设置和任命需经上级机关批准。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官吏发明的这套工作程序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涉及一个特殊的共产党员阶层，在俄共（布）（苏共）的历史上俗称负责工作人员，得到中央或地方省委员会的特殊信任，一般不受人民或党员的监督，或无法对他们进行监督。久而久之，干部任命制又发展成干部任职终身制。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70页。

应该说，俄共和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但是，列宁的建党学说还是重视发扬民主的。列宁主张发扬党内民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但是包含一系列民主原则，如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通过决议要通过简单的多数，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每个党员或者同党有来往的任何人，都有权要求把他们的声明文本送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所有党组织都有权处理它专门主管的党的工作范围内的事务，等等。1905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确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进党的组织章程。

在党内生活中，列宁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自己处于少数时，一方面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一方面为自己的正确观点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十月革命后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都充分反映了列宁的民主作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合法条件下和不合法条件下，在和平条件下和战争条件下，在党执政条件下和不执政条件下，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讲，列宁尽量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然，党内民主程度不仅取决于党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党的宗旨、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党的政治文化水平、党的领导者的民主作风等等。列宁主张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通过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

值得指出的是，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在苏共、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众所周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而载入史册的。在此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专门为代表大会起

草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1] 这个草案作出的主要政治结论是：党的统一，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党内生活不可违背的准则，是党的革命改造活动赖以取得成就的不可少的条件。决议要求解散所有小集团，而且今后也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这项决议的，就立刻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授权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一切党内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把他们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及其规定的严厉措施虽然保证了党在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开创了党内有意见分歧就是分裂党的前奏，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也不能展开。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个决议。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决定当时不公布有关处分办法的条款。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宽经济活动中的限制、扩大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自由而著名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的是集中。这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矛盾现象，也是新经济政策年代的一个矛盾现象，即经济上放开，政治上强化控制。这个现象的产生在学术界引起很多争论。尤其是近年来，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给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反对党内过分的集中制甚至独裁造成了困难。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列宁当时曾认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决议可能导致的后果。

此外，《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同列宁当时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有危险的，“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2] 而且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469—472、477—484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608页。

列宁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在历史上新经济政策与清党几乎是并列进行的。列宁希望今后在情况变化时能够恢复党内活跃的民主生活。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个决议的有效期被无限期地延长了。综观历史发展的过程，列宁虽然重视党内民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强调集中制，列宁在世时未能完成新形势下党内民主原则的完善和具体化，在党的生活准则、党内选举制、监督机制的建设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未完成。

列宁逝世后，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斯大林正是利用党内现存的这种机制，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确立了自己的党内的领袖地位。党内民生生活开始不断恶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被定为反对派，而且往往被视为反党集团，视为阶级敌人，“人民的敌人”。从此党内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意见。这种作风还扩展到国家各机关，形成一种制度。虽然表面上出现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但是全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受到压制。享受不到正当民主权利的党员，不可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这种体制下，唯意志论和教条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斯大林让古比雪夫一夜之间编制出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表的荒唐事。

显而易见，这种决策机制是不科学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

（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之前，还必须了解苏联及苏共的干部政策和监督机制。众所周知，苏共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任命制和终身制的干部制度。领导干部的任免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印象和态度。管理和决策上的高度集中制和干部政策上的任命制助长了党内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列宁在世时已经发现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监察机构，负责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同“违犯党纪”、“滥用职权”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但是，党内监察制度并没有得到完善，监察机关后来逐渐演变成党内斗争的工具。此外，当时苏维埃俄国还有另一个监督和检查机关——工农检查院。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等。但是，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列宁曾多次对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列宁在晚年曾建议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以便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但是实践表明，列宁的一些设想并没有实现。监察机构的作用如何，不仅取决于条例，而且取决于党内整个民主生活制度，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整个框架。苏联的历史表明，由于执政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对各级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责任制度是层层对上负责，公职人员的升迁往往只由一个上级领导决定，只接受领导的监督和考验。公职人员首先具备的是忠心，而不是对党、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的忠心，而是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忠心。结果，俄共（布）作为执政党，虽然自己建立了一套监督机制，但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列宁希望建立起一套少而精、高效率的政权机关，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却是多而滥、低质量的机关。一个不受监督的政权是无法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的。一个脱离群众的政权是不可能得到人民忠心拥护和爱戴的。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一旦当上最高领导人，他就自然地拥有了无上的权力，拥有了“真理”。

我们不应忘记，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我们不否

认，苏共执政时期，不少领导干部是有抱负，有作为的；许多共产党员是诚实、正派的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种体制也给那些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庸碌无为之辈创造了机会。这些人无须具备什么才干，只要善于赢得领导者的欢心，就可以轻云直上。

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出众的才干和能力，但是他却善于赢得领导者的欢喜。正是这个特点使他成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从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回忆文章和书籍看，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一个政治家的坚定意志来自于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理论修养。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影响他的人，他时而想让所有的人满意，时而迎合暂时占上风的势力，一味地随波逐流。戈尔巴乔夫喊出了一个个响亮的口号，但是他并不清楚哪些原则是不能放弃的。用与戈尔巴乔夫共事多年的苏联前总理尼·雷日科夫的话说，改革是一部背叛的历史，充满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由于在苏联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担任了最高领导职务，他就具有了“无限的权力”，其他政治家面对这种局面显得束手无策，于是那些不愿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人纷纷离戈尔巴乔夫而去。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超级大国垮下去。

我们不应否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夸大他的作用。没有这种体制，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同样，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不会解体。这是个人和体制合力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列宁曾设想建立一个比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更民主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权结构。历史的发展表明，他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苏联历史上形成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的

决策机制本身决定了这种体制的脆弱性。正因为如此，俄国“左”翼学者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指出，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突变性。

在研究苏联解体的教训时，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努力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的决策机制。

八　从经济发展实绩看苏联剧变的原因

（一）问 题 的 提 出

对于苏联剧变的原因，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于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和估价差异最大：一些研究者认为，苏联经济建设未搞好，是其社会剧变的根本性原因；另一些研究者则说，苏联的经济建设成绩显著，把苏联剧变归咎于经济缺乏根据。

应该说，上述争论确实涉及到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决定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对立和竞争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就尤为突出。看来，争论的双方在基本认识上似乎并没有大的分歧，但它们对于苏联经济状况的估价却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估价苏联建国7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和问题，特别是与其他类型国家的横向比较，就成了判断上述争论是非的关键。也正因如此，本文的着眼点并非争论双方的种种断言和结论，而是苏联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是想充当争论双方的裁判，而是为同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政性数据和素材。

（二）关于经济增长速度

人们一向认为，高速度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特征。苏联历届领导

人都把速度摆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保持速度优势，是苏联历届领导人共同的既定方针。列宁说，速度事关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斯大林说，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其任期提出的苏联最后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仍名之为“加速战略”。

从官方数据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确也维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远高于西方国家。例如：从1917至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14%，年均增长率高达9.6%，而同期美国GNP只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只为2.3%，在西方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德国，1925—1939年间相应指标也只增长了283%，年均增长率为7.8%。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苏联的差距则更大（见表1）。

表1　苏联与主要西方国家战前经济增长率对比

国　别	年	指　标	口　径	指　数	年均增长率（%）
苏　联	1917—1940	国民收入	1913年为100	814	9.6
美　国	1917—1940	GNP	按1958年价格	168	2.3
德　国	1925—1939	GNP	按1936年价格	283	7.8
英　国	1917—1940	国民收入	按要素成本	165	2.2
苏　联	1917—1940	工业产值	1913年为100	1200.0	10.9
美　国	1919—1940	工业产值	1967年为100	178.6	2.8
德　国	1917—1938	工业产值	1928年为100	205.6	5.3
英　国	1917—1938	工业产值	1913年为100	142.0	1.7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相关数据计算。

在与西方国家的对比中，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优势，一方面反映了苏联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适合当时的国情和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在这一时期比西方国家更早、更长时期地使用了增强军备和增加政府开支这一刺激经济增长的通常办法。在这一时期，德国经济增长率快于其他西方国家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是，苏联当时形成的政经合一、军民合一、高度集权、以国家为核心、以军备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政府的资源动员和支配能力更为强大。苏联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不仅保证了它免受当时西方世界大危机的影响，而且更好地利用了这种危机，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封锁，大力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但也应看到，苏联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潜伏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正如尔后的实践所表明的，它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高效和平衡发展，而且有些矛盾当时已经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为，农业偏枯，轻工业落后，重工业孤军奋进，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 年，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为 8600 万吨，到斯大林去世的 1953 年，尽管苏联的领土面积由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并入而明显扩大，但粮食产量只为 8250 万吨，其他农产品也大多低于战前水平（见表 2）。

苏联农业的落后乃至倒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震荡和破坏，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制度无效率；二是为了确保工业化的高速度，农业为工业首先是为重工业让路。由上可见，苏联战前农业基本上是在 1928 年以前，也即大规模工业化开始之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而工业化开始之后，大部分农产品的生产都趋于停滞，甚至下降。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破坏性更大。从下表可以看到，集体化高潮的 1932 年，所有农产品均大幅度下降。

表 2　　1953 年以前苏联主要农产品产量

	1913	1916	1928	1932	1937	1940	1950	1952	1953
粮食（百万吨）	86.0	—	73.3	69.6	97.4	95.5	81.2	92.2	82.5
牛（百万头）	—	58.4	66.8	38.3	47.5	47.8	58.1	58.8	56.6
猪（百万头）	—	23.0	27.7	10.9	20.0	25.5	22.2	27.1	28.5
绵羊（百万头）	—	89.7	104.2	43.8	46.6	66.6	77.6	90.5	94.3
马（百万头）	—	38.2	36.1	21.7	15.9	17.7	12.7	14.7	15.3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8 年、1973 年相应额数字。

战后，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优势总体上仍旧保持，但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注意。

其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递减趋向（见表 3）。

表 3　　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的变化　　（年均，%）

年	国民收入	工业产值	农业产值	投资额	社会劳动生产率
1951—1955	11.4	13.1	4.1	12.0	9.6
1956—1960	9.1	10.4	5.7	13.0	7.4
1961—1965	5.7	8.6	2.3	6.2	3.9
1966—1970	7.8	8.5	3.9	7.3	6.8
1971—1975	5.7	7.4	2.5	6.7	4.5
1976—1980	4.3	4.4	1.7	3.7	3.3
1981—1985	3.2	3.6	1.0	3.7	2.7
1986—1990	1.8	2.6	0.5	0.3	2.0
1990	-4.0	-1.2	-2.3	-19.0	-3

资料来源：按相应时期《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由上表可见，1986—1990年与1951—1955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11.4%下降为1.8%，到1990年已由昔日的高速增长演变为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经济由高速到低速再到负增长，并非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趋向性递减，除了1966—1970年由于体制改革启动和领导人更迭等因素的推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外，其他各五年计划期间，其经济增长率都是直线下降的，而且每隔五年大体下降1.5个百分点。由此算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国民经济演化为负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反映了苏联经济运行的特有轨迹，是其经济发展中内在深刻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一点下面我们还将涉及。

由于经济增长率递减，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竞赛中的速度优势也呈递减趋向，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从昔日优势变成了劣势(见表4)。

表4　　**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

	国民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	
	1961—1985	1971—1985	1981—1985	1986—1990	1990
苏　　联	5.6	4.5	3.2	2.7	-2.0
美　　国	3.3	2.8	2.5	2.7	0.8
西方国家平均	3.7	2.9	2.2	3.2	2.3

* 1987年前，苏联没有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故只能用国民收入指标与西方国家对比。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数据。

其二是以上引用的数据均来自苏联的官方统计，但这种数据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不仅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对它的可靠性早已提出了疑问，即使按官方本身的数据，也有许多疑难之处。例如，按官

方统计的增长速度，直到1989年仍高于美国，但同样按官方的统计数字，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规模为美国经济规模的比重就已不再上升。苏联学者也提出了这种矛盾。例如，格尔瓦诺夫斯基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按苏联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29—198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8.1%，那么早在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比美国多半倍了，而官方的统计却只为美国的65%。作者认为，即使65%这一数据也是不可靠的。

（三）关于经济规模

苏联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把美国作为突出的比较和追赶对象。在比较中，除了突出其速度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苏联的经济规模占美国百分比的提高。按苏联官方统计数据，在7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的总体经济规模为美国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其国民收入早在1975年已达美国的67%，但自此之后就不再变化，到80年代中期则开始下降（见表5)。

表5　　**苏联主要经济规模指标为美国%的变化**

年	1950	1960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国民收入	31	58	65	67	67	66	64
工业产值	30强	55	75强	80强	80强	80强	79
农业产值	—	70	85	85	85	85	82

*1988年之后，苏联统计上不再进行这种对比。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8项；《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第680页。

对于苏联经济规模的上述数据，不仅西方研究者，许多苏联学者也不完全相信。这是因为：除了统计数据本身的可靠性之外，苏

美两国指标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此外，卢布的官方汇率也定得比较高。因此，不同的研究者总是按自己的计算方法来计算苏美两国经济规模的对比，结果都比苏联官方的数据低得多。下面引用一些计算方法和结果，供读者参考。

1976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把苏联社会总产值指标，换算成世界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并与美国的相应指标做了对比，其结果见表6。

表6　**7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美GNP对比**　（10亿美元）

年	1913	1928	1940	1950	1960	1970	1975
苏联	95	95	176	218	394	661	786
美国	243	353	420	657	902	1337	1489
苏为美的%	39	27	42	33	44	49	53

资料来源：〔美〕《苏联经济新剖视》（中译本），中册，第5页。

由上表可见，美国学者的计算结果虽然比苏联官方的计算数据小些，但相差不大，而且在1975年以前，苏联经济规模占美国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了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并与美国的相应指标作了对比，其结果与苏联的数据差别更大了（见表7）。这一数据不仅大大低于苏联自己的数据，而且也比上述美国学者的数据低得多。原因在于：美国学者的上述计算方法，只是两种指标的换算，而联合国的计算则又剔除了卢布汇率偏高的因素；此外，美国学者的上述计算截止到1975年，当时苏联经济尚处于上升时期，而联合国的计算取的是1990年的数值，这时苏联经济已经下滑。

表 7　　1990 年苏美 GDP 对比

	苏联	美国	苏联为美国的%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1696980	4277274	39.6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6000	17615	34.06

资料来源：联合国 1990 年《人文发展报告》，由王诵芬教授提供。

法国《国际经济学》1993 年第 54 期刊载的文章按联合国的方法计算的结果，与联合国的结果大体相同（见表 8）。

表 8　　苏美 GNP 对比（10 亿美元，按 1974/1975 年价格计算）

年	1950	1960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1
苏　联	218	380	626	751	856	942	992	878
美　国	657	902	1328	1529	1870	2126	2421	2392
苏为美的%	33	42	47	49	45.7	44.3	40.9	36.9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94 年第 1 期。

西方学者对苏联经济规模的上述计算，与苏联一些学者的计算结果也大体相同。例如，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现俄罗斯总理）1987 年访华时公开承认，苏联的统计数字有水份，他认为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不会超过美国的 50%。1991 年 7 月，该所首席研究员博洛京博士在《论据与事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则认为，1990 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 38%。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数据，本作者认为，到苏联剧变前的 1990 年，苏联的经济规模（GNP 总额）只为美国的 40%左右。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 1913 年与美国的相对水平（按美国的计算为

39%）大体相同。这就是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1990年苏联解体的前夕，苏联与美国对比的相对经济规模并没有提高，在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只取得过阶段性的（战前到70年代中期）和局部性的（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胜利或优势，而总体上并未占优势。如果考虑到苏联为达到这种经济规模所付出的资源代价和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实惠以及二战后领土扩大等因素，那么苏联在竞赛中不仅未占优势，实际上是处于劣势。

（四）关于经济效率和效益

如果说苏联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增长速度方面曾居优势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方面从来都是劣势。而且，战后以来，苏联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趋于扩大。

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科技进步的高潮，国民经济都在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化。而苏联在50年代则批判新科技革命的观念和认识，断定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出现什么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此同时，也就忽略了在这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陶醉于种种“世界第一”的自我标榜之中。结果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在科技水平，特别是在社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上的差距越拉越大（见表9）。

由下表可见，就增长速度而言，这一时期苏联高于除联邦德国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而就效益而言则总体上低于所有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高于固定资本的增长率，而苏联则相反。同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明显上升，大多达到了60%左右，而苏联只为40%。

到了60年代末，苏联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依赖的粗放性投入要素（投资、劳动力乃至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经济增长率递减的

趋向也日趋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于70年代初提出了"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党和政府决定，将集约化确定为今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自此，苏联一反常态，开始高喊科技革命的口号，学术界和报刊对西方国家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介绍和报导日益增多，并且在科技投入等方面确实作了大投入。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苏联的研究开发费用平均增长率高达10%左右，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5%左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投入水平。

表9　　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指标综合比较

（1950—1962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主要投入要素的平均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与投入要素增长率之比	
	国内生产总值 (1)	劳动力 (2)	固定资本 (3)	(1)：(2)	(1)：(3)
苏　联	6.3	1.9	10.5	3.3	0.60
英　国	2.6	0.7	3.0	3.6	0.87
法　国	4.7	0.6	3.6	7.8	1.30
联邦德国	7.2	2.1	5.5	3.4	1.30
意大利	6.1	1.5	3.6	4.0	1.70
美　国	3.4	1.1	3.2	3.0	1.06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著的《苏联经济新动向》一书（华盛顿1966年版）的资料整理。

但是，苏联在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面付出的巨额资金和巨大努力并未取得相应的成果，社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进一步下降。

第一，苏联社会生产的物资消耗率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更为突出了。据苏联的数据，到80年代初，苏联生产每单位的国民收入所

消耗的电力比美国多 20%、用钢量多 90%、石油用量多 100%、水泥用量多 80%；生产每单位农业产值的化肥用量比美国多 40%、拖拉机用量多 160%、投资多 400%；苏联的钢材在加工中的利用率只为 40%—50%，而西方国家则为 80%—90%，苏联每年提供给农业的拖拉机、卡车 80%左右是抵补报废的，只有 20%左右增加保有量；苏联生产的煤炭、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在运输、储存、使用中的损耗达 1/3 左右；等等。这些乃是苏联许多产品产量居世界之首，但仍总是供不应求的重要原因。

第二，由于不断增加设备投入，用死劳动代替活劳动，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社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但与西方国家仍保持很大差距（见表 10）。

表 10　**苏联和美国劳动生产率对比**　（苏为美的%）

年	1950	1960	1970	1980	1985	1988
社会劳动生产率	—	—	约 40	约 40	约 40	—
工业劳动生产率	30 不到	44	约 53	55 以上	55 以上	54
农业劳动生产率	—	20—25	20—25	20—25	20—25	16*

* 1981—1987 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82 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8 年），第 680 页。

由上表可见，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到 1985 年只为美国的 40%，这一比例自 70 年代以来就没有变化，1988 年以后实际上是下降的，因此苏联在官方统计上也就不再进行这种对比了。同时还应看到，苏联的产值中包含着相当大的水份，如扣除这些水份并换算成世界通用的 GNP 或 GDP 指标，然后再计算劳动生产率，那么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到 1990 年大体只为美国的 25%左右，而不可能是 40%。

第三，由于大幅度增加设备投入，而产值并没有相应增加，因而生产基金产出率不断下降。1960年，苏联每卢布固定资产生产1.75卢布产值，1970年下降为1.07卢布，到1985年已下降为0.68卢布（见表11）。

表11　　苏联国民经济中生产基金产值率的降幅　　（%）

	年均降幅		1989年降幅	1990年降幅
	1981—1985	1986—1990		
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基金产值率	3.3	3.5	2.2	8.2
工业基金产值率	3.1	2.3	2.9	5.1
农业基金产值率	3.9	4.3	4.3	8.9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第321页。

由上表可见，自80年代以来，苏联的基金产值率不断下降，而且降幅不断扩大，1990年一年就下降了8.2%。

第四，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这与基金产值率下降是一致的。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1971—1975年底，每卢布的基建投资工业产值的增长额为83戈比，1976—1980年间下降为52戈比，1981—1985年间又进一步下降为44戈比。自1985年后，由于投资大幅度缩减，投资回报率不再下降，但1986—1988年间也只为47戈比。

第五，科技投入的效果不断下降。首先，科技投入的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1960—1985年期间，苏联科研费用增长了6.3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只增长了2.9倍，这本身就反映了科研投入的低效益。其次，要把苏联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越来越困难。在60年代，苏联注册的发明创造在生产中得到利用的比例为1/2左右，到70年代已下降为1/3左右，到80年代中期又进一步下降为1/4左右。在80年代中期，苏联的发明创造从科研到

生产运用平均为9年多，而西方国家则为3—4年，苏联的“科研—生产周期”比西方国家长一倍以上。

下面，将苏联战后以来投入要素和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做一综合对比，它从总体上反映了苏联社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状况（见表12）。

表12　　苏联各五年计划时期社会生产效率和效益状况　　（%）

	国民收入	国民经济投资	固定生产基金	科研投资	基金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
1951—1955	11.4	—	10.1	—	1.2	9.6
1956—1960	9.1	—	9.4	—	—0.3	7.4
1961—1965	5.7	6.2	9.7	12.8	—0.7	3.9
1966—1970	7.2	7.5	8.2	11.3	—0.9	5.5
1971—1975	5.7	6.8	8.7	7.1	—2.8	4.1
1976—1980	4.2	3.7	6.8	13.0	—2.7	3.2
1981—1985	3.6	3.7	6.4	5.0	—2.9	3.1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值整理、计算。

由上表可见：(1) 所有指标都呈下滑趋势；(2) 所有投入指标的增长率都高于产出指标的增长率；(3) 所有效率和效益指标都低于产出指标。这种态势集中反映了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粗放性、低效性和消耗性。

苏联提出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本来是想扭转其经济发展的粗放性、消耗性、低效性特点，但其结果却不仅未能改变这些特点，反而使它们更加突出了。这集中表现为，反映集约化方针成效的综合指标——“社会产品中集约型扩大再生产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不断下降（见表13）。

表 13　　　　苏联各五年计划时期集约型生产在产值增长额中所占的比重变化　　　　(%)

年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按社会最终产品指标计算	33.8	35.2	26.9	30.5
按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	33.6	37.1	32.9	24.6

资料来源：〔苏〕《经济科学》1981 年第 10 期。

集约性扩大再生产比重下降说明，苏联向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并未能实现，经济发展仍主要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追加各种粗放性投入要素。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加紧张，经济增长率愈益下降，到 80 年代末，国民经济已呈现负增长。

集约化方针之所以不见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矛盾越来越严重，而改革又受阻。

（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

判断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败，有各种标准，但我想最重要的标准还是看它是否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对于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这种标准则更为重要。

从实践来看，如果从纵向比较，即与本国历史上相比，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无疑都大大提高了，但从横向比较，即与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就复杂多了。

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按苏联官方的统计，苏联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在相当长时期里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根据 1985 年苏联国

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在1950—1984年间，苏联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550%，而美国只增长了100%，英国为90%，意大利为240%，法国为200%，联邦德国为270%，日本为720%。

但是，经西方学者换算后的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仅数额比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小得多，而且增长率也低得多。例如，法国《国际经济学》季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1950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213美元，到1985年只为3396美元，只增长了不到2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换算数据与此也大体相同。根据它的数据，1985年苏联人均GNP在全世界的排行榜位居38位，不仅落后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而美国为16609美元，加拿大为13825.9美元，日本为10974.8美元，联邦德国为10189.7美元，法国为9666.7美元，英国为8135.2美元，意大利为7450.7美元，芬兰为11090.7美元，瑞典为12051.2美元。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人均GNP不断下降，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1990年苏联的人均GNP只为美国的34%；根据法国上述资料，1990年苏联的人均GNP只为美国的35.6%；根据苏联《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一篇文章的资料，1990年苏联的人均GNP只为美国的30%。到1990年，苏联人均GNP的世界排行榜已下降为40多位。

下面，本文将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些具体分析。经过7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人民的生活无疑有了很大提高。据官方统计，居民的实际收入1985年比1940年增长了35.46倍，其增长速度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苏联人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

但是，苏联人民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一般西方学者对此的估计是：苏联工人的工资按购买力计算，在8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峰时期，也只为西方国家的1/3左

右；苏联工资总额占GNP的比重只为35%左右，而西方国家则在60%—50%之间；苏联居民购买食品的费用占家庭支出的40%左右，而西方国家则仅占15%左右；苏联到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为16M²，而西方国家则为30—40M²；直到苏联解体，居民每千人拥有小汽车不足50辆，而发达国家则为200辆左右；至于诸如彩色电视、录像机、录音机、家用电脑、移动电话、BP机之类的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中国。

总的看来，苏联人民在基本生活保证、生活的安定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居民的食品营养水平、衣着的质地、文化素养，不低于西方国家，但在生活现代化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有所扩大。

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统计数据，我们无法确切判断，苏联建国70余年来，其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总体上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但一般的估计是：苏联欧洲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但亚洲部分居民，特别是非欧洲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明显高于其相应的邻国。这乃是苏联社会剧变首先由其欧洲地区发动，特别是俄罗斯人带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其社会影响

从以上资料我们已不难看出，苏联的经济衰落由来已久。苏联领导人普遍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称之为“停滞时期”。所谓停滞，主要指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由过去的速度优势逐渐演化为生产效率和效益、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速度本身的全面劣势。但是，苏联经济危机的爆发则开始于1990年。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生产力在战后以来出现首次下降。当年，国民收入下降了4%，GNP下降了2.3%，工业产值下降了1.2%，农业产值下降了2.9%，货运量下降了4.9%，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9%，就业人数下降了0.6%，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了1.9%，外贸额下降了7.2%等。总之，经济下滑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

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苏联的经济危机似乎并不深重，但对于长期以来十分注重速度的苏联来说，经济不是增长而是全面下降，已是社会难以接受的现实。它的社会、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本身的内涵。

第二，市场供应危机全面爆发。1990年前半年，消费品供应已开始断档，到下半年，商店的商品货物严重匮乏，购货队伍越来越长，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当年，居民的货币购买力与市场商品供应之间的缺口已达50%以上，提高价格势在必行。1991年上半年，政府开始大幅度调价，非面包和奶产品一下子提高3—5倍。与此同时黑市横行，价格猛涨，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恶性通货膨胀即将爆发。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按官方的统计资料，1990年职工的货币收入仍在上升，但在实际上，正如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公开承认的那样，早自1982年，苏联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已不再提高，到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1990年由于商品涨价以及用数倍、数十倍的高价从黑市和自由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约占居民消费品的1/4），居民的购买力已下降了15%—20%。与此同时，街头乞丐明显增多。

事实上，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苏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已基本耗尽，这表现为：职工工资的提高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积累不再增加，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到80年代末，社会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滥发钞票以及政

府对基本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层层补贴来维持的，实际上是在吃空额，吃储备。到了苏联解体的前夕，国家的财政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为了回笼货币，政府竟然用限额兑换100卢布大票这种邪招来剥夺居民。总之，群众对经济危机的实际感受比社会生产下降的幅度大得多。

苏联199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与西方国家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同，具有明显的短缺经济、潜伏性、骤发性特点。它是经济运行中各种深刻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的结果。它的最突出的表现还不在于生产下降，而在于市场供应体系和财政货币体系的瓦解，因而更为深沉，更难消除。就居民的感受而言，这种危机的烈度超过了战后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可以与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危机相提并论，虽然生产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危机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苏联整个社会既没有应付这种危机的思想准备，也没有物质准备；当权者已乱了方寸，他们提不出也无力推行任何反危机的有效对策；执政的苏共领导层大多数而不是个别人，已经对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失去了信念，并且对其改革丧失了信心；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人乃至整个苏共已经不再信任。

综上所述，苏联70余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最终却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危机；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苏联虽然取得过某些优势，但却以全面的败北而告终。苏联的社会剧变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危机至少是引发剧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因素。当然，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经济因素起了什么作用，占居什么地位，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综合考察，这显然不是本文能够胜任的。

九　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

在世界历史中，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从诞生、兴盛到衰亡，往往要经历数百年、上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从其诞生之日算起，在经历70多年的生命周期之后，竟在顷刻之间坍塌了。这一体制衰竭的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苏联的解体给人们留下深深的思考，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国际等不同角度来分析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在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该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的原因的评价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的产生，既无客观必然性，也无历史必要性，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无任何优越性可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体制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是基本适合、具有巨大潜力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力已耗尽，优越性已丧失，而仍然固守它时，才成为毫无生机和活力的僵化模式。本文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加强，继而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僵化的。导致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个、或一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苏联70多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表明，这个社会长期潜伏着未能在后来各个历史时期及时得以缓解和克服的深刻矛盾和危机，而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源和深层原因在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种种弊端，正是这些矛盾和弊端压抑了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的

民主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历史地看，苏联国内的所有问题最终几乎全都可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上找到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起全局性作用的因素。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着重分析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体制原因。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苏联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一般被解释为国有化、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历史，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同时也是以指令性计划全面取代市场机制的过程。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顺序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三种“模式”：(1)1918—1920 年的战时共产主义；(2)1921—1927 年的新经济政策；(3)1928—1932 年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按照日本学者的看法，前两种“模式”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第三种“模式”则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战时共产主义，或称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高度集中、没有货币的体制，其实质是采用强制性手段，全面实行国有化，强化中央的集权控制，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研究比较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后来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初模式，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新经济政策是与军事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它的实施意味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其实质是要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经济计划。列宁意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依靠国家的法令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是错误的，并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农业上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工业企业管理的非集中化，组建托拉斯，加强经济核

①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571 页。

算;鼓励发展商品交换,允许私人经济发展,实行租让制。但在最初,新经济政策的这些改革被列宁看成是由于形势所迫而采取的暂缓之策,是一种妥协或变通,最终还是要进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从今天的观点看,苏联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处于两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也许是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模式)的尝试。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的时间很短,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一种权宜之计的范围,它的痕迹在后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仍可找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涉及到共产主义建设模式,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行模式极大地丰富起来。新经济政策实施了很短时间,在这一期间,列宁虽然尽全部精力从事新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理论的制定,但直到列宁逝世,这一政策及其相应理论均尚未完备。当列宁逝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斯大林取消了,其理由是其放纵了私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1928年爆发的粮食采购危机引发了苏联经济体制究竟向何处去的大论战,在论战中,斯大林战胜了他的政敌,牢牢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与他的工业化战略相适应,苏联开始逐步建立并强化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1928/1929—1932/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标志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正式形成。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是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与计划经济先驱者和追随者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在其形成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对这种体制模式的设计与选择产生了影响。苏联的体制模式主要是以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理论为依据建立的,在探讨30年代苏联体制模式的历史原因时,许多人把这种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更多的人把这种体制的形成归咎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因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不无联系,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均要求集中有限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加速经

济的发展。苏联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意味着它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历史相对性，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其产生条件的特殊，而在于其长期僵化，后人很难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视为时代的错误，但“把一种在特定情况下所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说成是惟一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是没有根据的”。[①]

（二）苏联经济体制的特点与弊端

1．苏联经济体制的特点。

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曾有过详尽的评述与概说。从已有的文献看，他们多从体制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区分经济体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在苏联剧变之前的1991年初，在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阿巴尔金院士主持制定的《联盟共和国所有制非国有化和企业私有化立法基础》（草案）中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草案认为：“现行社会制度在经济方面的特征是：社会经济和经营形式单一化和简单化；强制性的集中联合取代市场经济联系；剥夺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所有者地位，形成了以国家名义进行活动的支配者阶层；劳动具有了雇佣和强制性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以基于政权力量的外部推动取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刺激；形成了管理国民经济的行政指令体系。”他们的结论认为，“国有化与行政性的集中是苏联现行社会制度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它们使国家和社会经济失去了人民性。”[②] 从某种意义上

---

① 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② 王金存：“前苏联和俄罗斯‘私有化’思想的起源和演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

讲，这一概括可以称之为苏联官方对原有的经济体制特征的最终认识。

在我看来，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与马恩设想的古典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相比，已有很大的偏离。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典型的特征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关系国家化，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中心地位，它不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是国民经济的计划者和国有经济的总经营者。国家不仅控制宏观经济，而且控制微观经济。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纯粹的公有制，用暴力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二是经济管理行政化，从理论上认为，国有经济只能由国家来经营，在实践上国家通过无所不包的计划来决定生产单位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国家和企业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企业领导人由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委派。经济管理机构行政化，用行政权力下达计划指标和管理经济，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被抑制到最小程度。三是经济调节指令性，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把行政指令性计划当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惟一标志，经济计划以国家指令形式下达，所有的企业都执行上级的命令。

2. 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

如上所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和理论根源。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比较容易发挥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调配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稀缺资源服务于一些明确的目标，完成特定的重大任务，如国家的工业化、战时经济和战后经济的重建等，比较适合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有助于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绩，例如二战以前的苏联、二战以后的东欧各国和5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对此即使是挑剔的西方学者也是不否认的。苏

联在其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进入“二五”时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17%，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凯恩斯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示。但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扩大再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社会分工和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市场经济相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在：

第一，实行全面的指令性计划，忽视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其突出表现是一些产品供不应求，另一些产品严重滞销，短缺与库存同步增长。

第二，市场经济必须通过产权明晰化和价格形成与资源配置市场化来实现，而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庞大的国有制为基础的，鉴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的效益无人负责，企业的赢利或亏损并不直接影响本企业职工和经营者的利益。相反，国家出于“父爱主义”原则，总是给亏损企业以大量的财政补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机制，完全可以使国有企业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下正常生存和运行。随着经济的发展，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差。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权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掌握了从宏观经济调控权，到国有企业决策权，乃至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消费行为决定权在内的所有权力。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决策中难免犯主观主义。二是由于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有限，加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管理复杂程度的提高，使“政府机构碰到了自身理性边界的限制”。这就是说，政府在面对有限的几个工业

部门、几百个企业时，它基本上能够实现有效的信息控制，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计划，实行较为有效的决策管理。但是，当它面对几千个、几万个乃至十万个以至更多的企业时，继续采用原有的集中计划方法进行管理，已经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计划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活动。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信息往往不正确或不完整或过时，它一方面导致经济体制对经济变化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使中央的决策与计划偏离了原有的宗旨，即从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国民经济的比例平衡变成了解决各种已经出现的经济问题的“事后调节”。

第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计划经济体制被西方学者称为“命令型经济”，国家对所有权的垄断导致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群众利益的严重脱节，并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利益对立，进而又诱发长期无法克服的体制动力的失缺，引起这一体制的一系列低效率综合症。在这种集权体制下，由于否定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经济运行是以行政命令、教育动员、政治压力、行政约束、集中控制和强制性服从等因素为基础，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劳动积极性和广泛社会阶层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创业积极性。随着外部驱动机制效用的衰退，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日趋枯竭，整个经济机制运转越来越不灵，国民经济失去昔日的活力和生机，造成了经济体制的功能性衰退。

第五，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必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由于计划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和决策范围的包罗万象，要求中央和地方设立庞大的集权制的各级经济机构和政治机关，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另一方面培植了庞大的极权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出现过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其深刻的原因皆出于经济。

从上述问题看，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非是一个理想和成熟的模式。

（三）苏联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效率低下，没有活力和生机，除了传统体制的固有弊端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不得力。随着经济发展中矛盾的日益增多，苏联领导人已意识到，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进行某种变革。从经济生活内部的矛盾看，战后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存在着改革的可能性的。从5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革新的思想，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60年代中期又尝试过“柯西金一揽子改革”，80年代苏联兴起了第三次改革的浪潮。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旧体制只起了某种修补作用。而且由于这些改革是在行政协调的范围内试图改善经济运行效果，因而并没有削弱行政性管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行政管理。同时还由于改革在有些方面缓和了利益矛盾，这些措施反而有助于巩固传统体制的地位，拖延了根本性问题的解决，致使矛盾不断积累激化，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由停滞走向危机。从一般意义上说，苏联改革失败主要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制约。

第一，思想的僵化和理论的陈旧阻碍了改革。这不仅表现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构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而且还表现为，作为改革意见提出的新思想，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局限在某种确定的框架之内。思想理论的僵化和陈旧突出地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作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长达30多年的改革中，苏联经济理论虽有发展，但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都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彻底的理论，他

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经济，而只是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们不同意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原因的观点，在对原因的解释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所提出的观点有十几种之多，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跳出斯大林的“产品—商品”论的理论框架。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看作是计划经济，然后再引入市场调节的成分，是苏联经济学家所持的基本观点，他们过多地将着眼点放在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调节的成分。60 年代以前苏联改革的目标是完善计划体制，商品货币关系仅被看作是改进计划工作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于主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改革建议大加批判。从 70 年代起，苏联更是开展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理论来否定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一些“正统”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一直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在改革中提出要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的目标，另一方面却避免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阻碍了重大理论研究的深化。思想理论僵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对公有制教条主义的理解。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所有制形成越公越好，越大越好。在保持庞大的国有经济的前提下，国家要进行经营管理，就只能搞指令性计划，搞指标和配额，搞行政性领导和组织。对国有制的怀疑比对指令性计划提出怀疑的后果更严重，被认定为是否定社会主义的观点。第三个被视为理论禁区的是所谓要素收入问题。尽管在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利息收入，60 年代的改革中也提出了要实行资金、土地的有偿使用原则，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上论证要素收入的合理性。实际上，否定要素存在的合理性，就等于否定有效利用资金、土地，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未找到任何不同于市场交换的方式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理论的突破是改革的先导，决定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和战略选

择，理论的僵化和陈旧是以往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凝固化、神圣化，将中央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特定时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上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如苏联在20—30年代所实行的实质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曾被视为是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不可能对传统体制作根本的改革。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凝固化的做法不仅贻害了苏联，而且也殃及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50年代到60年代，东欧国家多次发起对传统模式的冲击，但均遭到苏联的镇压。

第三，对战后时代变化的认识和判断失误使苏联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战后，苏联国内外条件特别是国际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苏联仍然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看不到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绝对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无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节生产关系仍能容纳生产力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的现实，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相互对立和全面排斥，仍然奉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和大搞军备竞赛的战略方针。苏联在经济力量远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有限的资源用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使苏联领导人不愿冒深入改革带来急剧变化的风险。

第四，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缺乏改革的愿望。改革是一种有风险的创新，没有一大批积极探索的干部是不可能成功的。苏联多年实行的行政集权体制和缺乏竞争性的干部选拔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头脑僵化、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创造性的工作能力和动机。但他们对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是十分敏感。以往改革的实践表明，经济改

革势必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带来政治权力的变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光是高级干部，甚至中层干部也担心失去权力而对改革不满或反对改革。从各级干部的普遍状况看，要想真正改革传统体制是十分困难的。

第五，长期实行的传统体制使全社会养成一种惰性，劳动群众也不例外。如果一种体制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个制度一定是个不成功的制度，对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因素往往为人们所低估，实际上这是传统体制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社会惰性与国家对居民生活的“包”、“保”范围成正比，大锅饭越严重，这种惰性就越严重。

（四）计划经济体制的消极后果

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公有制经济、计划指令和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特点在于用政治革命带动经济革命，利用国家政权发展以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为突出国防现代化而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核心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赶超发达工业国。那么，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效绩如何呢？实践表明，在苏联的工业化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物质基础建立以后，由于该模式中许多制度性的缺陷，群众动员手段的失效，加上工业化发展本身所带来的负效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原有的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出现了危机。

第一，作为苏联粗放型的赶超发展战略重要目标的经济增长出

现停滞。在工业化时期和战后50—6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7%。从70年代起，其速度优势递减，年平均增长率为5%。到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已下降到2%的水平，依靠国家大量投入资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已难以为继（见表1)。到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接近停止，1990年经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对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型的苏联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降，是其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失效的首要标志。

表1　**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率**　(%)

年	1951－1960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官方估计	10.1	6.5	7.8	5.7	4.3	3.6
CIA* 估计	5.6	4.9	5.1	3.0	2.3	0.6
苏联学者估计	7.2	4.4	4.1	3.2	1.0	0.6

* 美国中央情报局。

资料来源：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第二，在长期忽视农业和压缩轻工业的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结构的失衡。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一直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作法严重破坏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一直影响至今。

第三，为维持工业增长的高投资率，苏联长期采取提高积累率的办法，而积累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见表2)。积累率在原苏东国家一般为25%左右，高积累的结果是消费品市场的失衡。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商品匮乏是计划经济国家共有的经

济现象。

表 2　　苏联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

年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消费	73.2	73.6	70.5	73.4	76.1	73.5
积累	26.8	26.4	29.5	26.6	23.9	26.5

资料来源：P.H.Demdinski：《计划经济的逻辑：崩溃的根源》，牛津出版社 1991 年，第 157 页。

第四，苏联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典型的粗放型方式。长期以来，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大量增加投入来维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一直处于低水平（见表 3)。据苏联学者估计，1961—1984 年间苏联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除柯西金时期曾达到 3.2%的较好成绩外，其他年份一直徘徊在 1.1%—1.3%之间。尽管总体经济增长率很高，但资本生产率在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负数。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资本投资的收益就开始稳定而迅速地下降（见表 3)，到 70 年代为止，其投资几乎或完全没有效益。奥弗估计，苏联在 1928—1985 年间，GNP 年平均增长率为 4.2%，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 6.9%，投入品使用年平均增长率为 3.2%，两者占 GNP 增长的 76%；而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只有 1.1%，占 GNP 增长的 24%。[①] 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有明确资料表明，中东欧和苏联的产品在质量上落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① M.Knell and C.Rider,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ppraisal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p.9.

表 3 苏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1951—1984 年） （年均%）

年	劳动生产率*		资本存量		总要素生产率	
	1951/1973	1974/1984	1951/1973	1973/1984	1951/1973	1974/1984
苏联	3.6	1.0	8.6	6.7	0.5	—1.4
工业国家**	4.8	2.7	4.7	3.2	3.4	1.3
拉丁美洲***	3.2	0.2	4.7	5.0	1.8	—1.3
南朝鲜	4.2	4.8	5.9	10.8	2.8	1.4
台湾省	4.9	4.1	7.7	10.0	3.5	1.2

*单位工作小时国内生产总值（拉丁美洲：单位就业人员国内生产总值）。

**16 个工业国家。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 页。

第五，经济增长和效率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生活水平是判断经济体制效果的终极标志。生活水平包括三项内容：消费的数量、消费的质量、自由时间的占有。根据保罗·R·格雷戈里等人的计算，在 70 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消费平均增长较快（4.7%对 3.6%），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增长率较高（6.4%对 5.6%）。① 按照人均收入指标，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比较明显地低于北美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1960 年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3532 美元，而美国、日本分别为 8799 和 2508 美元，到了 1985 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 6863 美元，美国、日本分别增长到 15511 和 11864 美元。70 年代，苏联已经

① 〔美〕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56 页。

成为世界军事和重工业超级大国，但人民群众的总体生活水平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西方的计算，1979 年苏联职工的月收入只及美国的 30.5%，西德的 24.9%，法国的 28%，按人口平均水平计算的消费水平只为美国的 1/3；世界银行还用社会指标的恶化来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出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健康指标迅速改善，开始接近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但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停滞，即而出现逆转：1966—1980 年间，人口预期寿命减少了两岁，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同期内，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寿命增加了 3—4 岁。

以上分析表明，苏联解体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但经济体制确实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正是经济体制长期的负面影响，使苏联经济长期停滞，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十 俄罗斯与世界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帝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逐渐演变成世界超级大国。而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但仍然是在战略领域惟一可与美国匹敌的大国。

俄罗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已无法再关闭国门。世界性的大事，国际市场的波动几乎没有不在俄罗斯引起反响的。1998年5月，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虽然俄国力处于收缩状态，但大国地位的传统惯性，使其仍然会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响。俄罗斯仍然是前苏联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定继承人。出于各种考虑，俄罗斯也被吸收为"八大国集团"成员，尽管，俄国总不能算作习惯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不光20世纪的世界历史曾经是俄国辉煌业绩的记载，而且，俄罗斯巨人的举手投足仍然会给今后之世界留下长影。

为了避免对俄罗斯对外关系的过去与今天的具体细节作繁冗描述，笔者选择制约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几个重要因素作为阐述的对象。这些因素包括：空间、传统、个人、体制以及国际关系结构。可能这样的选择还不能概括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全貌，但是，也许可以提供思考这一问题的线索与角度。

（一）横跨欧亚大陆的独一无二的辽阔疆域

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俄罗斯帝国，其疆域一头紧靠欧洲文明的边

缘，而另一头又向古老东方文明的中心延伸。这种地缘环境决定了俄罗斯成长道路中面临着极其多样复杂的外来影响与挑战。这种广大而多样的地理空间也必定非常矛盾地既是俄罗斯的宝贵资源，又在不同条件下成为其不胜重荷的历史包袱。

本世纪初的英国地缘政治创始人麦金德提出：谁拥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谁就拥有欧亚大陆，谁拥有欧亚大陆，谁就拥有世界。这里所指的“枢纽地带”包括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带。尽管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在当今世界受到了挑战，但是，多亏有了纵深辽阔的东欧大平原，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难逃厄运。哪怕是今天的核子时代，空间阻隔依然还是不易克服的天然屏障。

正是这样一片辽阔疆域，使得俄国成了一个欧亚国家：它既可以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作为欧安会、欧洲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同时，也不时振振有词地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从勃列日涅夫到叶利钦从没有放弃过这一努力。俄罗斯的抱负还不止于陆地。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年轻的海军中将戈尔什科夫早就声明：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不光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上国家。更为壮观的也许是把海洋与陆地打成一片的几代俄罗斯人的努力：本世纪初，维特首相下决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正是旨在把俄国的影响扩展到迷人的太平洋。而俄国海域分布在周边各处，太平洋、黑海、里海、波罗的海、北海都是俄国港口可以通达的海域。这既大大地刺激了俄国海军的发展，又便于俄国的心脏部分直接向各海域扩展。俄国从来没有忘记它没有出海口而又是西方交通咽喉的印度洋。80 年代前苏联地缘政治扩张的顶点，就是以拥有印度洋出海口为战略目标的阿富汗。在今天阿富汗仍然是俄罗斯关注的重点地区。

俄罗斯的天然优势形成了它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空间换取时间”。

17 世纪下半叶，从白俄罗斯、乌克兰被延请而来的“西方专家”

就曾经向沙皇建议以出让西乌克兰为代价，换取与当时的欧洲强国波兰平息战事。十月革命之初，列宁曾经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稍后的里加条约，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世纪末的东欧激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北约的东扩使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失去了一大片空间作为屏障。在冷战后这个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上，俄罗斯在表面上作了抵制，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作了退让，这远远超出了许多观察家认为的俄罗斯将在这一问题上与西方发生对抗的估量。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放弃一块既不能控制、又完全可能成为包袱的“领地”，对俄罗斯并非是一件坏事。相反，把包袱丢给西方，倒可以使其长时间地成为西方国家之间各种分歧的“人质”。当然，俄罗斯所接受的“东扩”不会没有“底线”。看来，西方若要越过前苏联的边界可能不是件易事，或者，至少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俄罗斯的辽阔疆域不光是国际战略的物质载体，它也是形成俄罗斯人独特的心理禀赋和政治文化的源由。横跨亚欧的这一大片土地，由于居住其上的人种的多样性和地表景观的复杂性，要求人们经常地去思考采取怎样的行动和措施才最为适当。为世人所瞩目的、正在崛起的亚欧主义思想（下文将要述及），正是对客观地缘环境的一种感悟和认知。如果说历史学中一直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直接与空间广阔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关，那么，今天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种种思考必然会与俄罗斯的空间存在形式密切相关。

（二）传统文明的烙印

俄罗斯所处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特殊环境，促使俄罗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传统。长期积累形成的文明传统必定会在俄罗斯的对外行为上打上烙印。

15—16世纪交替时期，流传于欧俄的“第三罗马”神话，在蒙古

鞑靼人入侵结束后成了民族复兴的动力。东正教教义与俄罗斯多神教传统的长期结合,使俄罗斯人逐步确立了关于世界的差等结构式观念,俄国当然是这种国际结构的中心。在19世纪,斯拉夫主义与西方派的论争使俄罗斯找到了不同于西方的价值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又使俄罗斯人开始拥有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全球意识与世界抱负。当然,这种意识与抱负并不仅仅是革命家才有的,尼古拉二世宫殿(以后也是克伦斯基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早就挂起了绘有欧洲、亚洲与非洲地图的大型壁毯。在这种具有深重使命感的文化传统熏陶下,苏联普通老百姓也具有相当普遍的国际意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承担"关怀天下2/3劳动人民"的义务与责任。对此的最好说明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波黑冲突发生之时,反对党领袖日林诺夫斯基还自动跑到波黑战场去"支持"斯拉夫兄弟。世界革命中心的荣耀曾经是俄罗斯和前苏联人民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的强大推动力。这样的抱负也给俄罗斯人留下了过于沉重,并且最终导致其解体的负担。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差等结构式的传统也使俄罗斯人背上了"非上即下"、"不成王便成寇"的包袱,扭曲的心态成为失度的对外行为的基础。

结合部文明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特征,使俄罗斯经常处于外来文明的影响与挑战之下。可以说,这种影响与挑战既是与苏联这一历史存在与生俱来,又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前者而言,十月革命不光是俄国革命家希望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单单从社会形态相互更替的角度,而且也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多元性的角度来看,那么,可以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还意味着,这是在20世纪初的"全球文明"① 来临的背景下,非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对西方文明扩张的一种挑战。

就后者而言,本世纪末的苏联解体,明显地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

① 笔者1997年10月在莫斯科与俄国际关系学者的一次座谈。

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解构主义”思潮与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相交织直接冲击着摇摇欲坠的苏联东欧体制。可以说，东欧更早、更多地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冲击，在冲击之下的1989年的东欧激变又与苏联解体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结合部文明形态不仅导引着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又借助于后工业文化的冲击作用于苏联的解体，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它也是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背景。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明显地向西方倾斜，这与国内在西方专家指导下迅速推行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正相吻合。按照叶利钦的解释，因为前苏联的外交主要以美国和西方为对手，所以，现在要先与它们共同商量解决遗留的问题。但在实际上，以前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外交部门首先在观念上认同于西方国家，他们认为俄罗斯将按照欧美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原则生活，信仰同一价值体系”。自从波黑发生冲突，俄参与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受阻，俄罗斯官方和民间开始意识到在外交上全盘西方化的弊端。北约东扩进程加紧，这进一步促使俄国在外交上与西方国家拉开了距离。1994年以后，在俄罗斯政界、学界、媒界中“欧亚主义”观念开始出现。“欧亚主义”原是20世纪20年代流亡欧洲的俄国学者所鼓吹的一个思想流派。该流派与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有密切关系，它把自己与欧洲文化传统相区别，声明自己属于独特的、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欧亚文化。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主要的反对党派、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众媒介上重新出现了一股“欧亚主义”热，学者们写文章，做报告，官员们召开会议组织研究。这些“新”欧亚主义者们确认早期欧亚主义秉持的反西方或非西方传统，认为欧亚主义是一种可以填补真空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民族或人种自我鉴定的文明概念，他们中也有把此理解为是处于文明结合地带的一种混合文化类型。欧亚主义者们鼓吹，不光在外交上要采取非西方化的立场，而且在内政上，也要选择切合结合部特征的体制模式。叶利钦尽管没有表态支

持欧亚主义，但是他用普里马科夫取代科济列夫，实际上明显地表达了与科济列夫西方化倾向告别的政策取向。

（三）个人情结

一部国际关系史证明，政治家、外交家的个人行为风格，通常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与特征，往往也与该时期政治领导人物的形象相关。列宁年代是苏联外交的奠基时期，尽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热切地寄希望于欧洲革命，但一旦局势明朗，欧洲革命无望，列宁便迅速转入建立以"均势"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斯大林虽然以其卓越的努力带领人民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但实际上斯大林已经离开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基本思想，把世界革命作为二战之前和之后的基本选择。与此同时，斯大林不同意恩格斯对沙俄扩张与霸权外交的批评。

赫鲁晓夫时期，是一个从"冷战"开始向"和平共处"过渡的历史阶段，赫鲁晓夫一度顺应潮流，敢于修正本国外交中实际存在的大国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尚欠陶冶的政治素养和粗暴急躁的行为风格，给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带来异常多变与不稳定的因素。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丢丑是赫鲁晓夫冒险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是一个既有"缓和"，又有激烈竞争的时代，勃列日涅夫虽然趁主要对手美国陷于内外危机之机，利用缓和，大大扩展了实力，然而，他的因循守旧、缺乏想象的思维定势，又使得误入歧途的苏联外交不可能得到纠正，反而使它在国力衰退的70年代实行了全球性的战略扩张，把苏联和整个国际局势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实事求是地说，勃列日涅夫之前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维持着"革命"与"两大阵营对抗"的思维定势。列宁尽管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

“全新的理解”,但他也没有公开表示放弃两大阵营对峙的基本原则。在80年代中期这一思维定势有了突破。

在战后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提出:无法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竞争前景作出明确无误的预测。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提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加判断的判断:即不要以徒劳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去阻碍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去干预人民与人民间的理解与接近。不要再迷恋于实力去从事无谓的竞争。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推演出了整套对外政治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当前所有的矛盾中,战争与和平,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居于首要地位”,“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高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差异。正是在这里人们又听到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家呼号的回声。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内容是苏联的国际问题学者们长期治学、集体思考的结晶,并由其助手们加以发挥了的。1988年7月25日,由戈尔巴乔夫亲手擢拔的、精明干练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明:“两种截然相反的制度的斗争,不是当今时代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趋势。在现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先进科学和高度技术与工艺基础上加速增加物质财富,并公正地分配这些财富,以及能否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自我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等。”

70年代,几乎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心理状态下的苏联人,第一次对这个困扰多年的时代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与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理论相比,谢瓦尔德纳泽进一步明确表明:“在核时代的背景下,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不把建立在诸如不进攻、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基础上的共处,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

前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还曾对此理论加以发挥:两大社会体

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将不是尖锐对立，也不是走向趋同，而是相互交叉。

对外政治的新思维还在向东西方关系的各个侧面延伸。

在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被称为戈尔巴乔夫高级谋士、现任俄罗斯总理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普里马科夫认为：今后“在保障各国安全方面，要把政治措施提到第一位”。其含意是，不再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是认为核战争带来的是整个人类的毁灭，根本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苏联学者认为，由于当代世界高度相互依存的状态，资本主义摆脱军国主义，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是一种现实的选择。1987 年 6 月，普里马科夫在接见美国记者时，明确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未必会让军国主义势力抬头”。

关于苏联的新军事战略。一方面苏联提出，在保持美苏之间战略核平衡的同时，降低核水平。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普里马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都先后提出：新的防务原则是所谓“合理足够”原则，即表示苏联愿意把核力量与常规力量保持在单纯防御的最低需要水平上。1989 年，苏联战略理论界进一步提出“最低遏制”战略，主张主动地单方面率先大幅度削减战略核力量，为以后戈尔巴乔夫对美核让步作了理论铺垫。

在历来被视为反映美苏冲突的地区冲突问题上，普里马科夫曾说过：再也不要透过苏美冲突的多棱镜来观察地区性冲突，这样做会有碍于解决这些冲突。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治新思维对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也作了反省。自 1988 年始，苏联官方公开承认，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中有着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表现，这不光存在于战后初期的斯大林时代，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政策中，也深深打上了斯大林主义对外政策的烙印。”苏联政府为二战期间被无辜杀害在卡廷森林的上万名波兰军官一事，公开向波兰政府道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理论界开拓了看待整个发展中世界的问题的新视野。他们不再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预见的普遍意愿;不再坚持"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后备军,是当代基本的革命反帝力量";也不再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完全归之于"殖民统治的结果",而是补上一句"当地腐朽社会政治势力""限制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

研究第三世界权威人士阿瓦科夫认为:从方法论上说,上述种种错误的认识根源,在于把种种落后国家的发展看成为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这不仅仅以是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中的某一个阶段,而是作为具有自己特征的社会发展的某种类型"。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他谦恭地对邓小平说:您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倡议很好,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倡议。邓小平高兴地回答:这个新倡议同你提出的"外交新思维"一样的新。邓小平看出了"新思维"中包含的新东西。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显然包含着有利于国际缓和的积极成分。应该说"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与苏联知识分子、外交干部与广大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果,它反映了变迁中的国际社会的合理逻辑。但是理论思维逻辑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操作上的现实性。因为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强权政治依然是通行的惯例,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却不能维持有效控制、也不能维持对抗的实力之时,他的理想主义显然只能导致悲剧。

(四) 体 制 因 素

制度变迁是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动因。20 世纪俄苏的国际地位正好经历了一个周长:随革命而始的崛起,随制度而终的衰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把握住

稍纵即逝的时机，充分地动员起千百万富于革命激情的民众，构筑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意识形态，而且又迅速地将意识形态转化为一个非西方式的独立特行的制度模式。正是以这样的制度为依托，苏联曾经以一方霸主而自居。

就制度而言，并不只是这种制度对资源与人员的动员能力，才使其成为俄国对外伸张的基础。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之所以在前苏联成为现实，有其合乎情理的历史逻辑和道义力量。

这种道义力量在于，集体大于个体，社会重于个人的观念并不是俄国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者的杜撰。一方面这种观念来自卢梭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它又以古老的、为俄国所独有的农村公社作为载体。

而社会主义在俄国出现，这一现象之所以合乎历史逻辑，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能够解决人们所期待的所有重大问题(比如公平)。在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威廉·曼彻斯特 70 年代出版的《光荣与梦想》中，其中有一段记载：30 年代初的大危机时期，美国的失业工人无路可走，到处奔号。俄国驻纽约的苏美贸易公司平均每天收到 350 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最令人难忘的是：苏美贸易公司登广告招募六千名熟练技工。其中有管道工、油漆工、机械工、木工、电工、牙科医生、厨师、飞行员、还有殡仪工人。结果报名应征的竟达十万人。[①] 对大危机时代的这段回忆，与苏联解体前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前等候签证的长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有过类似的经验。当时东欧的大批知识分子"左"倾化，真心实意地跟苏联闹革命。尽管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始终认为，当时的选择是相当真诚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十月革命之后的所有年代，制度因素都是俄

① [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商务印刷馆 1982 年版。

国国际地位的有力支撑，相反，一旦斯大林把俄国工厂、农村都变成兵营，把同时代的革命家、知识分子甚至无名百姓都关进集中营，社会主义存在的道义理由与历史逻辑也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这必然会削弱这种制度的动员能力。尽管此后苏联还维持着自己的地位，甚至进一步扩展了影响，但是，这主要已经不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在发生作用了。制度因素不光是苏联时期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制度因素同样在苏联解体进程中和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发生着关键的影响。

60年代，同样是面临科技革命的挑战，为何美欧日能够一路领先，而俄国却与西方全面拉开了距离呢？可以认为，苏联败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根本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灵活多样的市场要求，根本无法实行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80年代前半期，美苏之间冷战高潮的重新出现，非常值得玩味。当时的苏联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美国进行全面持久对抗的能力了，但是前任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却放风说，苏联试制出一种新式武器，能够用很少的成本摧毁美国的整个"高边疆"战略。

西方世界为之惊魂不定。当后来发现奥尔加科夫的"新式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时，人们不禁感叹：堂堂的苏联竟然落到了靠制造假消息来苟延时机。

1992年后俄罗斯的转制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因素作用于对外关系的重要案例。1992年后的"休克疗法"以及全面实行西方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否能把俄罗斯引入一个相对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与西方大国相安无事呢？就政治而言，1992年以来政治体制变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政治权威主义。尽管政治权威对于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人们发现俄国式的权威主义政治相当容易与植根于本土的观念形态（如俄罗斯追求大国的传统观念）结盟，对于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表现出抗争。议会政治与多党制也未必使亲西方的势力能够萌生。人们看到的相反情况是，1992年激进改革时的阁员几乎荡

然无存，而为西方式改革呐喊的政党也已经一步步地从议会遁离。就经济体制而言，急剧的体制转型激发了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除了朝向政府，还直接把矛头对准西方大国，认为是它们把俄国整到了如此落魄的地步。产生结构的进一步二元化，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无疑是促使经济改革从自由主义走向民众主义（或者平民主义）的现实起因。而这种民众主义的重要政治背景并非是倾向于西方，而是眷恋于本国昔日辉煌的民族主义。[①]

（五）国际结构

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系统，每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主体作为系统中的因素在活动。而由国家或者国际社会主体相互之间所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则构成为一个大的框架。这个框架制约着或者刺激着所有国家与国际主体的活动，而国家与国际主体的活动则又使这个框架更加丰富复杂化。

这一切显然有助于对20世纪俄国对外关系的理解。事实上，作为大国的俄罗斯，须臾也不能离开与整个国际社会结构之间的这种互动。

一般地说这种互动有两种主要的表现方式：战争与和平。

战争，是构成俄国与国际社会相关性的重要触媒。返观俄苏历史，战争始终是影响俄国内外事务的重要因素。在俄苏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是引起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而战争更直接地导致俄苏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变迁。

本世纪以来，俄苏与各国的和平交往同样是俄苏与国际结构互动的内容表现。每一次对外和平交往的阶段性发展总是折射出俄苏社会内部发展的重大变迁，而这样的和平发展又与战争一样往往形

---

① 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结束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成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新阶段。

由此才开始以与俄苏有关的战争与和平的重大事件,来划分 20 世纪俄苏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各个阶段。在这每一阶段中,既可看出国际关系结构是如何地作用于俄苏外交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俄苏决策层是如何运用或者错失时机的。

让我们从 1904 年的日俄战争开始。1904 年的日俄战争到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俄苏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英帝国对世界事务霸权的余威仍存,西方列强的竞争进入集团化时期。同时,东方国家开始崛起。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动下,资本加武力的扩张显然势头强劲,但仍是四处破绽、力不从心。1904 年的日俄战争明显地暴露了貌似强暴的沙俄的虚弱。这个庞大的帝国居然在一个新兴东方国家面前不堪一击。1914 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拉上了战争的轨道,这实际上已经铺垫了沙俄帝国走向灭亡,工农革命必定兴起的路基。列宁所发起的十月革命无疑是对国际关系变动所提供时机的一次卓绝运用。

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到 1922 年热那亚会议的召开是俄苏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阶段。西方列强支持下的三次国内战争的围攻并没有击垮苏联。相反,英国 1921 年却爆发了经济危机,对外贸易锐减 1/2。西方开始转变战略,宣布撤销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波苏战争的结束并没有进一步带来欧洲革命的形势,列宁从“实现世界革命”的构想转而迅速地提出:已经出现了“以均势为基础”的“共处”时期。1922 年 1 月,苏联接受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发出的邀请出席热那亚会议,共商战争与革命的善后事宜。这是俄国打破国际包围、以平等主权的国际主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标志。1922 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是俄苏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欧洲形势扑朔迷离,但关键问题是德国与英法间的相互关系。在 20 年代,俄国利用“拉帕洛公约”与德国建立合作关系来冲击凡尔赛体系,打

击西方列强的反苏战线。20 年代前半期,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中国和其余亚非国家纷纷与俄苏建交,俄苏对外关系出现很大转机。然而,列宁逝世后的 20 年代下半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推行“世界革命”策略,对形势作出了“左”的估计。

30 年代初期,德国法西斯野心毕露,东山再起。苏俄调整政策,与美建交,参加国联,同时在欧洲加强发展与法国、捷克的关系,不失为正确的选择。30 年代前半期再次出现与苏联建交的热潮。然而,苏联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相互关系毕竟还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既要“推进世界革命”又不能让法西斯祸水危及自身的种种考虑,使得苏联在 1939 年 8 月的苏德和约上落笔签字。尤其是苏德和约中的秘密条款,德苏密谋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这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成为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难言之隐。如果说战前英法苏三国谈判未成,是各自都有责任;那么,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左”的判断,无疑也错失了尽早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遏制或推迟大战发生的可能。

从二战结束至 60 年代末,可视为俄苏所在国际关系结构的第四个阶段,通常被称为“冷战对抗时期。”传统的欧洲未能解决欧洲内部的危机,要引进美苏的参与,才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这样的结局自然导致二战之后美苏两家的崛起。全局层面的两极对抗,结束了含混不清的国际力量变动时期,而且美苏两家的抗争又分别以各自的意识形态作为屏障,集团结盟。于是世界分成了黑白两半,不得越雷池一步。国际关系史上久已有“美苏冷战谁为祸首”的争端。实际上,在意识形态抗争年代,这样的争论毫无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局面。只是在 60 年代冷战阴云稍稍拨开云雾的时候,才有人(看来首先是西方)认为:“冷战”无非是美苏两家相互心理恐吓而不断升级的结果,实在是一场无谓的对峙。不过,学者的分析尽管有理,但不得不指出一点,冷战中相互对抗的局面对于国内进行整合与动员,特别是对国内重点发展某些产业部门(比如军重工业)也着实是一个必须的外部环境。决策者们经常是一只眼睛看着国际社会,而另一只眼睛看着

国内。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苏联国内关于产业发展重点的争论。颇具改革意识的赫鲁晓夫坚决反对马林科夫优先发展轻工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议,坚决主张以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表示:不能像"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林科夫那样"只是使人们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更不能"以口红来代替车床"。在当时党内斗争背景下,赫鲁晓夫虽然达到了取代马林科夫的目的,但是,苏联也错失了一次可能以相互妥协缓和国际局势的时机。1956年后,赫鲁晓夫虽然鼓吹"和平共处",但是,他也不能避免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一类的事件。这说明,压倒美国、"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成功"至少依然是赫鲁晓夫心中的潜念,1954年的赫鲁晓夫与1962年的赫鲁晓夫有着内在的联系。

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可以视作苏联所处国际关系结构的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虽然两极对抗没有消失,但是,欧洲、日本、中国的崛起,成为两极系统的一个补充,简言之这是一个两极与多极的并存时期。此外,在这一阶段,美国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苏联则凭借其资源优势和体制的(也许是最后的)动员能力,使军重工业发展热头日盛。70年代前期出现的缓和,应该说是国际力量冷静思考后形成的局面,多极化对两极对抗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握手言欢、杯斛交错的缓和交往中,也并非不是各有所图,暗藏杀机。苏联是希望赢得时间,赶上美国的战略武器发展水平,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安会"等一系列缓和机制的安排中,也不无暗渡陈仓,对苏联东欧国家暗放冷箭的安排。欧安会协议第三栏计划中西方提出的关于人员文化交往的安排正是在长时期中潜移默化地起了这样的作用。[①] 在相对有利于苏联的国际背景下,苏联疏忽了自己与美国等工业国家之间在整体上还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尤其忽略了一个集权国家如果不思改革,那就事实上经不起来自西方的哪怕是

① 陈氏民1982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座班上的报告。

零敲碎打的经过各种渠道对它的渗透和离间。70年代下半期，勃列日涅夫所策动的一轮又一轮全球性的扩张行动，实在是对已经日落西山的苏联体制的极大讽刺。也正是这一阶段苏联向美国的大举讨伐，为它走向最后解体作了铺陈。

70年代末至1991年苏联解体，是两极格局走向最后终结的时期。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原则加上6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实力骤增。80年代前期，在美国诱导下出现的"第二次冷战以抗"，简直就是闹剧。面对里根"高边疆"战略的胁迫，苏联鹰派人士居然依靠散布"诸如苏联发明了新式秘密武器"一类的虚假信息来为与美国的抗争助威。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新思维"才使这场闹剧帷幕渐落。然而，尽管"新思维"反映了现实的国际关系力量对比，但在全球化背景推动之下，在以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国际化的组织网络的缠绕与压力之下，苏联的败落已经是命数已定。换言之，苏联所面对的不光是与美国一国的战略抗争，它面对的是来自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各个方面的，是以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所形成的组织化的优势。一旦苏联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经济体制的机制与功能出现问题，那么，再多的核导弹与核潜艇也无法挽救它的命运。

苏联解体以来的国际格局是美国坐大与群雄竞争并存的局面。尽管，人们一直说，这是从冷战向冷战后格局的过渡期，但显然这一段时期的力量对比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冷战以和平而告终，使得这种过渡将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因为，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国际力量的大变动，都是以战争而告终。战争方式使格局的过渡有较为清晰的边界。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划定国界。而和平的终结，就必须耐心等待。国际主体间的相互重新定位和相互关系的重新确认有一个较长时期。时至今日，可以说，这种过渡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西有"北约东扩"，东有"美日新安保条约"，诸如此类的东西表明：在美国的羽翼与压力之下，一种新的布局正在悄悄形

成。但是，诚如布热津斯基所云，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俄国的不确定性。① 由于今天的国际变化是国际关系的演变伴随着经济社会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制度变迁的张力还会影响国际关系演变本身，因此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何去何从成为西方政治家最为关切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俄罗斯的决策者们深知今天的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已具有其特殊性。当然，关键在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运用这种看似消极、然而却又隐藏转机的国际环境。

俄苏盛世是依靠其独特的传统文明与意识形态、权威型政治结构的动员能力和其独特的空间环境资源来支撑的，也是与其所处的对抗型国际背景相吻合。一旦上述优势与特征相继丧失，俄苏帝国也恰似哗啦啦大厦倾倒。超级大国前苏联撤离舞台之后的世界变得有点无所适从；而不能继续如前一般再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俄罗斯也多少有点手足无措，惊魂不定。当国际力量对比在各大国的明确战略目标下变得清晰起来时，变化不定的俄罗斯反而就成为一个起平衡作用的重要法码。这将是 20 世纪留给新时代的一笔重要遗产。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格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三　篇

研究苏联剧变的指导理论与苏联剧变的教训

一　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几个方法问题

方法是事实和结论之间的桥梁。从同一事实出发，经过不同的桥梁，可以达到不同的终点。马克思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①] 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以可靠的、全面的、反映事物本质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研究的方法也必须得当，因为只有经过"合乎真理的"途径，才能引向"合乎真理的"结果。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工具。为了从苏联剧变这一客观"实事"中"求"出主观认识上的"是"，不能不对研究苏联剧变的方法进行一番研究。从理论上说，观察剧变的视角、视点和方法，都是无限的，要想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现在只能根据笔者有限的认识能力，举出其中的几个要者。

（一）研究苏联剧变发生的原因，首先要给苏联定位

好比给人画像，首先要整体地观察对象，确定他在大环境中的位置和基本色调，画出他的轮廓；其次要确定他的各个器官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再仔细描画。否则，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即使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每一根头发都画得惟妙惟肖，这个人像还是画不好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给苏联定位，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要确定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确定它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作为纵坐标，以苏联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作为横坐标，才能对苏联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位置作为纵坐标，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进行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贡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就包含了苏联共产党人探索的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大趋势，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解决。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是全面的。首先，他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而且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其次，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了在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武装斗争结束以后，最重要最困难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了苏维埃政权面前，这时列宁发现，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是不能直接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二版，第709页。

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因而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内容就是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列宁说：“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写规章、条文、训令，但在实践上却不能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①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是他当时所设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形式。列宁所阐述的过渡思想，为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准备了理论基础。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最高领导人。他领导苏联 30 年，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相当丰富的，因而成为世界上受尊敬最多，挨骂也最多的人物。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是：①他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把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苏联，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②他第一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以及商品生产存在的长期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集体所有制看成是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形式）。斯大林在 1952 年写成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0 月第二版，第 528—529 页。

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1] 不过，他当时所说的商品，仅仅指民用消费品，他更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留下了重要的启示。斯大林的错误已受到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家公认的错误有以下几点：①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他不顾苏联的具体国情，把许多应该在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做到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做，追求"纯净"的社会主义，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②他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并把这种体制凝固化，甚至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③他把许多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镇压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伤害了一大批群众，降低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④他欣赏并维护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扼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创造力。斯大林的错误成了我们的反面教材而被反复引用。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高举反对个人迷信的大旗，斩断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这是他的功劳。但是，他没有认清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在新体制的设计方面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勃列日涅夫在纠正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的同时，助长了党内的保守主义。在他执政的初期，虽然在柯西金的领导下对改进经济管理方法也有过一些设想，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曾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比较透彻地分析了旧体制的弊病，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代替旧体制。从 1988 年 6 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第 550 页。

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政权，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虽然这时也提出了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口号，但已无能力实行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是戈尔巴乔夫路线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存在74年的伟大意义，是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存在了70多年，但它同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0多天相比，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各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的共产党人在内，必将吸取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①] 列宁的这一段话，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亲切。

以苏联在世界大家庭中的位置作为横坐标，不能忽视下列事实：由于苏联的存在和强大，使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争霸为特征的两极对立的格局。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形成的条件是：①苏联和美国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双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双方各有自己追求的目标；②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足够强大，有资格同美国相抗衡。这里并不是肯定苏联同美国争霸的国际战略的正确性，而是说明它已形成了足以使美国感到威胁的实力。如果苏联领导人把一部分用于国防建设的钱投入到消费品的生产领域，改善人民的生活，结局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特别是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结束了资本主义独霸天下的时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二版，第570页。

代。从此以后，世界上的一切重大事情，如果没有苏联的参加，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30年代，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大萧条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却蒸蒸日上，不仅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极大的鼓舞，而且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敢小视。直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苏联是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是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国际社会承认苏联实力的重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大批国家在苏联的直接帮助或影响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50多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其原因之一便是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保守主义在苏联占了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却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进入70年代后半期，苏联同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差距开始拉大。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几乎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总之，苏联的兴亡，既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亡，又是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的兴亡。只有把苏联放在这两条线的交叉点上来考察，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也才能找出它兴衰成败的原因。

（二）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必须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把社会活动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是受他的价值观决定的，因而是有选择的。但是，这种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才能达到预期

的目的。如果只承认真理观和规律性而忽视价值观和选择性，就会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等同于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活动规律，最后导致宿命论。反之，如果过分强调价值观和选择性而忽视真理观和规律性，就会导致唯意志论。

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①] 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由于每一个人的不同选择发生冲撞的结果，而每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则是由他们各自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真理观和价值观、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天然一致的。所以，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既体现了严肃的科学性，又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

列宁也是一个真理观和价值观、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论者。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是国内国际形势创造的结果，又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选择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俄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过一场辩证唯物论同机械唯物论的较量。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相呼应，反对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俄国走"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即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固定道路"，理由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则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 布尔什维克党首先采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这并没有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478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二版，第690页。

律，只是改变了实现规律的形式和顺序。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片面地强调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选择性，忽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和精神条件，教条主义地理解并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的前半期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在其改革的后期则又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放弃了共产党人的选择，走上了“世界发展的共同道路”，导致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解体。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真理观和价值观、规律性和选择性的完美统一。邓小平认为，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只能实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同时，他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87 年 7 月，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公开声明：“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①短短的一句话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的党性。

（三）区别不同的原因

苏联的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多个力的合力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苏联剧变的原因分类。例如，根据原因显露的程度，我们可以分成表层原因、浅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根据原因距今的时间远近，我们可以分成历史原因和现实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第 249 页。

原因；根据原因对事变发生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分成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根据原因对事变发生作用的大小，我们可以分成必要原因和决定性原因；等等。

首先分析表层原因、浅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所谓表层原因，是指促使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些表象，是大家都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如民族冲突、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等等。浅层原因是表层原因的原因，是被表层原因掩盖着的原因，人们不能直接看到它，需要运用理性思维，例如由于民族政策或处理民族矛盾的方法不当导致民族冲突，领导人之间由于政见不同而发生矛盾，由于政府管理能力下降而造成社会混乱，由于经济管理不善而造成生产下降等等。深层原因是浅层原因的原因，是被浅层原因掩盖着的原因，是凭着一般的社会知识也很难发现的原因。为了发现深层原因，需要凭藉社会科学知识，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特别是要运用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最新式的武器。历史原因不是深层原因，历史原因中有深层原因，也有浅层原因和表层原因。体制问题也不是深层原因，一种体制的形成还有它自身的原因。我们所说的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是指决定事变本质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应该是苏联社会主义基础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文化落后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三个方面。苏联为什么要搞“战时共产主义”？除了战争环境以外，人们对共产主义认识的肤浅是一个重要原因。苏联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因为苏联经济文化落后，还不能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会建成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个人迷信为什么会盛行？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改革前期不敢突破旧体制、后来又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归根到底，也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关于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

情况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分析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不经过中介同事变发生直接联系的原因，间接原因则是通过中介同事变发生联系的原因。在内因和外因这一对原因中，内因是直接原因，外因是间接原因，外因通过内因对事变发生作用。在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对原因中，现实原因是直接原因，历史原因是间接原因，历史原因通过现实原因对事变发生作用。

再次，在研究苏联剧变发生的原因时，分清必要原因和决定性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必要原因是指发生剧变的不可缺少的原因，没有这个原因，事变就不可能发生。而作为决定性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没有这个原因，事变就不可能发生；第二，有了这个原因，事变就必然发生。因此，决定性原因一定是必要原因，而必要原因不一定是决定性原因。历史原因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不能满足第二个条件，所以只能是必要原因，不可能是决定性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所犯的错误可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所以是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原因。中国曾经有过同苏联基本相同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根本制度的变化，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而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这就是中国的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的理由。

我的结论是：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会危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生存；但是，乱改也不行，乱改也会导致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垮台。罗马尼亚的剧变属于前一种情况，苏联的剧变属于后一种情况。

二　苏联的理论误区和模式选择

（一）理论误区

历史上有许多称雄一时的超级帝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并不奇怪，历史的局限性规定了它们必然走向覆灭。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却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能否摆脱所谓的“历史周期规律”，能否避免自我毁灭？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表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果不时时刻刻握有先进理论武器，如果不时时刻刻地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如果不时时刻刻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也会像历史上其他政党那样被挤出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国家不可能保持长治久安，也会像历史上一些帝国那样自我毁灭。苏共垮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地区不存在了，但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提供了“近距离”揣摩大国兴亡的标本。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总结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今后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苏共缺乏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导致苏联长期生活在教条主义的禁锢之中，这是苏共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共产党之所以比其他政党站得高，看得远，不在于它比别人聪明，而是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能够敏锐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能够高瞻远瞩，预见未来，领导民众前进。但共产党这种先进

的理论武器不是照搬过来的，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摸索和创造出来的。有了先进理论武器的政党是战无不胜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理论武器，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十月革命的伟大道路，从而使无产阶级夺取了俄国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政党并不十分强大，但这个党有先进理论思想作指导，从而将广大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后来，苏共就逐渐失去了先进的理论思想，不断地推行教条主义，不断地禁锢党内和社会思想，不鼓励和不容许理论上的探索。事实表明，就像苏共这样具有辉煌革命历史的大党，一旦失去先进的理论思想，一旦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旦不从本国国情出发，它也会同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不可能避免垮台的命运。

2. 苏共7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这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评论苏联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时经常将其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是的，体制问题十分重要，不改革体制苏联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但是，总结苏联几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苏联的问题不仅仅出在体制层面上，还含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为什么苏联的体制改革进行了几十年而没有改革好，为什么这种体制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观察问题，来分析苏联兴亡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中央高层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理论根据，他们往往在理论上寻找依据，进行论证。所以，研究苏联问题，尤其是高层决策问题不能离开理论问题而单纯从决策行为、运行和决策分歧方面加以研究，必须研究其指导决策的理论基础。忽视这个基础，就搞不清苏联重大决策之间的联系、背景和根源。理论是苏联中央高层决策的底色。

我们说，苏联中央高层决策的底色是以红色为基本背景的，也就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为背景的。苏联中央高层在决策

中着眼于社会主义，他们在制定战略和策略问题上都是以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为前提的。所以，很好地研究历届苏共中央高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会揭开许多我们过去不好理解的疑点。

苏联最高决策层决策过程中在理论方面常常出现偏移现象。这种现象值得研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非常熟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是苏联长期以来实际上是领导人的所发明的理论就是实践的标准。当然，如果领导人说这些理论是自己创造的也让人有识别的机会和可能，糟糕的是，苏联领导人经常将其十分错误的理论贴上马列主义的理论标签，让人难以识别，极大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苏联战略性决策包括重大的理论指导性决策，重大的社会变革性决策和对国际大势的基本判定。

重大的理论指导性决策是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决策层面。这方面的决策得失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作用。列宁十分重视理论对俄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思想对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性的理论指导作用。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和反思之后，列宁在晚年结合新经济政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像苏联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漫长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只是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政治前提。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是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我认为，自 1917 年以后列宁在理论上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列宁运用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第二，西欧革命形势渐渐平息之后列宁从理论上论证了贫困落后的国家通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大理论判断极大地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列宁理论决策上的正确性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而且在1921年经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后将苏联带入了新的境界。但是，这时期列宁在理论方面也存在着失策之处。首先，列宁对帝国主义世界危机估计得过高，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自己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判断。从这一点出发，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处性分析不够。其次，与此相联系，列宁对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高，理论上存在着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这种激进的世界革命观点的指导下，列宁将俄国国内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革命的前途结合起来。在1921以前，俄国的许多国内政策是从促进世界革命爆发出发的，进军华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1920年底强化极端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一例。第三，1917年之后列宁缺乏正确的理论对待农民，从而在实践中导致出现了一系列打击中农甚至伤及贫农的案例。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农民地位和作用问题，而且将农民看成是每日每时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所以，对农民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的作法。在实践中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更多的来自农民的压力，只是到后来列宁才下决心改变原有的农民政策。

我们在评价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时不能不注意到以下观点。

斯大林在战争前夜谈到苏联的计划性时表示：

“首要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独立性，使我国经济不致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保证国民经济独立性的计划中枢，工业就会沿着全然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一切就会从轻工业而不是从重工业入手。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把它颠倒了过来，确切地说是把它彻底翻了个个儿。”

“计划中枢的第二项任务是巩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体系的绝对统治地位，为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发展工农业。计划的任务是

堵塞产生资本主义的一切渠道。因而从一开始就要做到不考虑企业赢利原则。在我国，赢利问题首先要服从于重工业建设。”

“计划中枢的第三项任务是不容许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现象。然而，在诸如国民经济这样的宏大事业中难免出现个别缺口。为应付这种情况就要有所储备，既要有基金的储备又要有劳动力方面的储备，以便弥补缺口。”①

1927年，第一个美国个人代表团向斯大林提出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的基本动机是希望取得利润。当然，相对地说，这种动机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代替了它呢？照你的意见，这种代替的效果如何，它能不能成为经常的？”

斯大林回答：“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那是对的。说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那也是对的。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呢？”

斯大林的答案是：

“首先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应当指出，我们这里绝大多数的厂长是工人，他们是由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取得工会的同意而任命的。并且任何一个厂长如果违反了工人或有关的工会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其次，应当指出，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并监督着企业行政方面的活动。”

“最后，应当指出，每一个工业企业都有企业全体工人参加的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卷宗，第一目录；第538卷宗，第4、5页。转引自《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一辑。

工人生产会议，工人在会议上检查厂长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的工作计划，指出错误和缺点，并且有可能通过工会、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来纠正这些缺点。”

斯大林说：“不难了解，所有这些情况根本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和企业中的各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斯大林还分析了第二种情况，“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第三种情况就是：“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营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斯大林总结说：“这些刺激和推动我国工业的力量是不是经常的因素呢？它们能不能成为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呢？是的，它们无疑是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而且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①

我们从斯大林的理论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动力源泉问题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斯大林在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首先不能以赢利作为判断企业发展的标准。如果不从“利益”刺激的角度去设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仅仅靠工人阶级对企业的“态度”和“感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苏共没有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到极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06—108页。

其重要的位置，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本来，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存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列宁敏感地正视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的政策和模式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在生产力方面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且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遗憾的是，斯大林及其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都没有从生产力水平方面去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更多地从生产关系方面去勾画社会主义的前景和基本内涵。但是，过多地变动生产关系，会对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产生冲击力和负面影响。而且苏共一直存在着一个教条，即就连夺取政权这样的困难问题俄国无产阶级都解决了，将国家发展起来还会成为问题吗？照搬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公式，是苏共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了什么偏差，而在于社会主义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条件变化了，自然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式就要随之变化。但苏共抽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条件这个最重要的标准，而去奢谈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样的认识不可能不犯严重的理论错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许多诱人的口号，强调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和人道的。但他并没有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释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率超过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显露出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长期以来，苏共一直在计划与市场等具体问题上兜圈子，将许多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东西错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维护，将原本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却加以舍弃。这是苏共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3. 苏共对资本主义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既没

有准确地认识自己，也没有准确地认识对手。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可能会导致失败；己彼都不知，不失败才是怪事。列宁知己知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列宁以后，苏共领导人没有很好地做到知己知彼，逐渐地沉醉于幻想之中。苏共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出现偏差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苏共领导人开口必讲资本主义如何陷入总危机，如何垂死挣扎，行将灭亡，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却熟视无睹。第二，对资本主义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估计不足。第三，排斥资本主义世界有用的东西。在教条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苏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凡是资本主义使用的成果、形式和概念都统统抛弃，都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其结果，苏联自己封闭了自己，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苏联却愚蠢地让资本主义社会所独享。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应该建筑在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基础上，共产党人本来就应该站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肩膀上去探索更美好的生活，可是，苏共却准备创造一个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纯而又纯的理念世界。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又将西方的一切都看成是法宝，错误地认为，只要全盘引进西方模式，苏联就会很快克服危机，显现西方式的繁荣。这种照搬西方模式的作法在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问题。从对资本主义潜能估计不足到对资本主义那一套顶礼膜拜，都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苏联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二）模式选择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推行的一整套理念、体制、方法和政策。苏联模式是一个综合概念，具体地

说，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理论层面，即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规定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模式选择的基本类型；第二，体制层面，即苏联的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理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体制去贯彻；第三，政策层面，即为实现体制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

苏联模式从其内容来看包括极端型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A型）和改良型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B型）。所谓极端型的苏联模式是指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实行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时期苏联推行的极端化的模式。所谓改良型的苏联模式就是指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所推行的模式。这期间苏联对极端型的苏联模式进行了若干改良和修补，去掉了模式中一些极端的东西，但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却被保留下来了，形成了改良型的苏联模式。作者不同意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因为将苏联模式人格化不可能完全揭示出苏联模式的本质内涵。“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

两种不同的模式雏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先后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模式。这两种最初模式对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模式形成的基本因素：苏联模式并不是斯大林个人心血来潮建立起来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党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内在矛盾、党内斗争等，这些都是苏联模式形成的基本因素。

苏联模式的基本目标：追求强大的国家实力，保持与另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相抗衡的能力和水平；运用苏联模式使苏联急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急速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扩展苏联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步推行世界革命。这种模式目标与社会主义基本目的不相符合。它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放到了次要位置。

苏联模式的基本结构：个人或者少数领导核心过度集权式的决策体系、极度集中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行政命令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高度封闭的信息结构。

苏联模式的基本功能：迅速动员和配置全国各种资源进行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建设功能；迅速动员和组织全国各种资源进行备战和参战的功能；迅速动员和配置全国各种资源恢复战后经济的功能；集中配置重要资源发展军事实力的功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功能等。

苏联模式的扩张：苏联模式具有排他性和扩张性，苏联向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认为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惟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切不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受到苏联的制裁和挤压。苏联模式的扩张性还表现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方面。

危机：苏联模式功效的递减规律。苏联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的模式。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功效出现了递减曲线。这种“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在苏联 70 年代表现得十分明显。苏联模式逐渐出现效率危机和信仰危机。“短缺”（如经济短缺）和“过剩”（如机构膨胀和官员臃肿）现象伴随着苏联模式。改革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的要求。苏联模式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缺乏效率，不能合理和恰当地对整个社会资源实施有机配置，不能有效地调解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不能激励社会成员充分地发挥才智。这种模式动力资源短缺，动力结构不合理。它实际上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苏联模式存在着功效递减曲线，即原先依靠强力推动而产生的功效出现递减效应。苏共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试图依靠这样的模式与西方竞争和较量。但是，一个变形的、缺乏效率的模式如果不改革，必然会使苏联走入死胡同。

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战后，苏联模式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苏东国家和中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到 80 年代末期苏东国家出现历史性的激变。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出现了两种带有原则性区别的转轨模式，一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改革；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框架之外的转轨。

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苏联模式问题，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取得了很多的科研成果。但是，西方学者在研究苏联模式问题时带有很大的偏差：第一，他们将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失败，进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毁灭的结论，这样的观点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第二，他们认为苏联模式是苏联共产党赖以推行所谓“集权主义”的工具，不可能自我加以改变，而局部改良不可能导致模式的整体改变，所以，只有模仿西方模式才能使苏联模式得到彻底的改变，才能摆脱苏联出现的种种危机。这种观点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和叶利钦执政之后在西方表述得极为明确；第三，他们认为，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不仅证明了苏联模式的彻底失败，而且也证明了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推行苏联模式，都受到了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故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迟早要发生巨大危机，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模式之路，最终摈弃苏联模式。这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他们预言，东欧国家剧变后接下来就是苏联剧变，然后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从而出现社会主义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见，研究苏联模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苏联模式问题也很重视，发表了许多涉及苏联模式问题的研究成果。从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探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80 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重点研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形成的原因、特点、成就和问题。这时期国内学术界

还没有从“模式”的角度提出问题，更多地从“体制”的角度切入研究，而“体制”的研究更多地涉及的是“体制”的一些侧面，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以，这时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体制”层面的研究。第二，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术界重点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层面进行研究，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后斯大林模式”等学术概念，对“苏联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战后“苏联模式”已经不符合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苏联模式”已经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将“模式”研究与“改革”研究结合起来，构成了这时期的研究特点。苏联学术界重点研究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与实践、苏联战后各个时期的改革理论与实践，尤其同步观察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进程。第三，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进程的展开，国内学术界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苏联兴亡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转轨问题上来。大家更多地从“模式改革”与“苏联兴亡”这两个命题出发阐述问题，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探讨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苏联模式，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就是：第一，如何分析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难题。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失败，苏联模式是苏联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实行的特殊的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苏联模式是可以改变的。第二，如何总结苏联模式的弊端，如何吸取苏联变革和俄罗斯社会转型教训，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借鉴和若干建议。总结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教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苏联模式存在着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两种改革模式的选择，更存在着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模式转换和社会主义框架之外的模式转换问题。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建立什么样的新模式，所有这些都是改革苏联模式时遇到的重大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

（三）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问题的论述

苏联模式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苏联的兴亡与苏联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僵化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多次提到苏联模式问题。他老人家高屋建瓴，对苏联模式问题做过很多深刻的论述和分析，现在重温邓小平对苏联模式问题的论述，深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苏联模式有密切关系。

1. 苏联模式不是成功的模式

苏联模式不是成功的模式，这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基本评价。例如，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表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①] 1987年邓小平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②]

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2. 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1985年邓小平表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 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持十分欣赏的态度。事实上，在苏联模式形成之前，列宁进行了两种不同模式的探索，这就是"战时共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③ 同上书，第139、140页。

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企图运用共产党强大的政治资源，通过强制和直接过渡方式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列宁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遇到了政治危机，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市场关系、通过与农民的结合、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它由一个被迫实行的临时性措施变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匆忙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实行行政命令式的集权模式，从而歪曲了列宁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3. 不能照搬苏联模式

这是邓小平同志几十年来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总结。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苏联模式被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的模式，哪个国家不照搬苏联模式，就会被视为走修正主义道路。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上看，实际上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改革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有一段时间照搬了苏联模式，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很多消极的东西和不良后果。80 年代初，邓小平从总结苏联模式出发，强调中国要解放思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0、161 页。

邓小平主要强调以下几个重要观点：第一，走自己的革命之路。1983 年他表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① 这表明，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走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而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第二，走自己的建设之路，注意中国特色。1982 年邓小平表示："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第三，走自己的改革之路。改革进程就是探索的进程。1988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表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③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有意识地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自己的道路。

4. 中国不照搬别国的模式，也不强迫别人照搬中国经验

邓小平同志从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出发，举一反三，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不再照搬苏联模式，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 页。

③ 同上书，第 265 页

而且也不再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1987年邓小平表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1] 第二，中国决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也决不强迫别人照搬中国经验。1985年邓小平表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2] 第三，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1988年邓小平表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3] 1985年邓小平表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4] 这表明邓小平深刻地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教训。

5. 苏联模式失败了，但社会主义事业会继续下去和发展起来

邓小平结合苏东剧变形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作了充满信心的论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5] 从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受到挫折，并不表明社会主义的完全失败。这只能说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和破产。及时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积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之路，中国会逐步走向繁荣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③ 同上书，第261页。
④ 同上书，第292页。
⑤ 同上书，第382、283页。

和富强。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从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体会：第一，苏联模式是特殊模式，在苏联就很不成功。中国若想繁荣富强，就必须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第二，联系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中国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中国既不再照搬别国模式，更不能输出自己的模式；第三，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既反对老教条，也反对新教条，因为新老教条在中国都行不通；第四，反对照搬别国模式，不等于不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借鉴"和"照搬"是两种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态度；第四，中国通过认真探索，就能够将中国的事情办好，就能够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深入研究苏联模式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上看，实际上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改革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应该说，苏东剧变表明苏东国家在改革苏联模式的道路上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改革和探索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研究苏联模式问题、总结苏联模式的弊端、吸取苏联改革和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借鉴和若干建议和思路，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苏联那里吸取什么、放弃什么、避开什么。所以，研究苏联模式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中国改革的纵深推进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明显表现；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苏东国家那样的剧变，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改革道路和方向、不断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结果。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表明，苏联模式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完全失败了。不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联系苏联的教训，我们应该看

到，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现在改革出现的难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有发展潜力。

三　苏联东欧剧变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苏东剧变的事实告诉人们，原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很不成熟，这是历史实践的结论。怎么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重新探索，这是20世纪历史提出的严峻课题。研究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研究社会科学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能依靠社会实践。这里既包括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和苏联东欧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更包括邓小平说的要“一步步走，一步步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摸着石子过河”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形象化、通俗化的表述。

（一）苏东剧变最核心的原因

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国缩小为5国，陆地面积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人口由原来占世界人口32%减少为23%；共产党组织由180个减少为120多个，党员人数由9100万减少为6000万；美共党员从2万人减为0.5万人、加拿大共产党员由3000人减为600人，英共党员从7600人减为1000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渺茫、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如原英共领导人认为，“1917年的政治实验以灾难而告终”，“共产党的时代已经结束”。原加拿大共产党总

书记休伊森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走进了绝路”，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右势力，更是弹冠相庆，他们宣称，历史已经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现在的任务是要扫除共产主义残余。

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研究微观事物，一秒钟也许嫌长，研究社会运动，则是要以世纪为尺度。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已成定论的说法，不是阶级偏见所致，那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幼稚无知。对具有社会主义责任感的人来说，重要的任务是要总结过去，开辟未来。

对苏东剧变的原因，世界上持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都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在我国，学者们更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如能对苏东剧变的原因作出准确的把握，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一大笔财富。苏东剧变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它是长期以来多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两条：经济没有搞好是基础性原因，路线错了则是关键性原因。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没有搞好的深层次原因一是体制问题，二是国民经济军事化问题（尤其是苏联），这两者又是交叉感染，因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更难使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体制得到改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那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带有毁灭性隐患的。这里说的是“长期”，不是“短期”；说的是“同等起步的国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有比较才有鉴别，但比较必须有可比性，如果拿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当然就缺乏可比性。另外，一个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短期内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面对的将是一系列要

害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究竟行不行？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究竟灵不灵？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所以首先提出要求脱离苏联，要求独立，固然有民族主义因素，但经济因素更是其深层次原因。因为自从这三国加盟于苏联以来的几十年间，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原来同等起步的北欧几个国家，如芬兰、挪威等，人们自然感到加入社会主义苏联吃亏了，因此要求脱离苏联，恢复其独立国家的地位。匈牙利经济发展水平，二战前与奥地利、芬兰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但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所以，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在座谈时说，我们酝酿很久了，不能再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我们要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寻找新路时，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又同样地把“模式”和“制度”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抛弃旧的僵化“模式”成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事实是，苏东国家垮台，不是缺少导弹，恰恰是缺少面包和黄油。我们的结论是，经济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但话得说回来，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路线对头，那就可以进行深刻反思，可以探究症结所在，摸索出一条可发展的新路子。换句话说，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即使经济没有搞好，也不致于丢掉政权，落到垮台的地步。甚至可以这样说，苏联东欧的经济也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我国的“史无前例”把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文革”的错误，不是哪一个别的党帮助纠正的，更不是哪一个外国人帮助纠正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的。苏联东欧垮台的关键，恰恰在于他们党的路线错了。

在苏联东欧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某些执政的共产党错误地把经济没有搞好的原因归咎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说“十月

革命是原罪”。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位哲学家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当社会主义大厦发生裂缝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不是先去抓施工的人，而是首先去查图纸，查设计者。于是，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批判列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动乱的关键时刻，东欧苏联不约而同地实行了多党制。人们看到，多党制这个闸门一开，东欧苏联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对党纷纷出笼，先是要求对话，接下来要求席位，继而通过选举把共产党一个个赶出政坛，自己登台执政。接着就是依靠手中权力，改变原来的经济基础，使整个国家“换了人间”。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一实行多党制，共产党的垮台就在所难免。之所以说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共产党有如下几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第一，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这是事实；第二，在执政的几十年间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历史包袱沉重，这又是事实；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千头万绪，一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事实；第四，在党派林立、人们思想大乱的情况下，共产党一时也拿不出一个治国良方，这又是一个事实。刚起来的反对党，他们的目标是狠打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在反对党猛攻之下，共产党只能步步后退，毫无回手之力。而被搞乱了思想的群众心态则是“既然你共产党没有领导好，那就不妨让别的党来试试！”于是，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落马。事实真相是，苏东垮台固然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因素，但从本质上讲，苏东的垮台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党的路线错了，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综上所述，结论是，经济没有搞好是苏东垮台的基础性原因，党的路线错了是苏东垮台的关键性原因。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受挫折，

处于低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一蹶不振，或者干脆改换门庭。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责任在于面对现实，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社会发展是以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遭到挫折，可以使有社会主义责任感的人们学得聪明起来，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二战后，社会主义建设普遍遭到挫折，这说明原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成熟，原来的那套框架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改变思维方式，转变观念，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个前人没有解决好的严峻课题。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必须以此为切入点，才能有清晰的认识。

1. 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人们只要稍微仔细想一想，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如果党的工作仍然执行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怎么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他一生中只做过两件事中的一件，根据“两个凡是”，只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针进行各项工作。党的十一大报告说得很明白，“文化大革命”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正是在这“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的前途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了毛主席提倡的但晚年又背离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惟一标准，这才能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这才算从最本质的方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新时期开始。

2.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要对两个前提条件作出正确判断。这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战争与和平形势，二是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世界战争形势的估计，在很长时期内毛主席总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要立足于“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种判断固然有帝国主义对我国敌视挑衅的许多客观因素，一时捉摸不定，但在主观上是长期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停留在“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认识水平上。既然要立足于打仗，工作重心当然不可能放在经济建设上，一些大的建设项目即使有资金有技术，也是启动不得的。对国内形势，长期以来总是认为，牛鬼蛇神随时要翻天，有2/3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且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走资派还在走。出于这种判断，当然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而且其乐无穷。“文革”以后，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判断，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经济就自然而然地上去。建国以后我党有过几次想把生产力搞上去，1958年的大跃进，赶超英国；“文革”中的抓革命促生产。结果怎样？不是发展了生产力，而是破坏了生产力，不是把帝国主义远远地甩在后边，而是我们自己大大地落后了。怎么把经济搞上去？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模式对此已无能为力，因此有着一个冲破旧框框，开辟新路子，寻找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途径的问题。其核心的理论问题便是计划和

市场问题。邓小平经过几十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考察，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普遍遭到挫折的认识，明确地作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结论。邓小平的扛鼎之言，是理论上划时代的突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4. 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并不意味着没有来自“左”的和右的重大干扰。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突破，也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突破，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来自“左”的右的干扰在所难免。对这一点，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总是在关键时刻拍了关键的板。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要注意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他指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更从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教训中警悟到两种倾向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侧重点，这就是“左”的错误是痼疾。他屡屡告诫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笔者在学习中感到，邓小平的这一决策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之所以侧重防“左”，一是囿于传统理论的束缚，有些人对如何搞社会主义总是习惯于从本本中去寻找答案，懒于在实践中开拓新境界；二是鉴于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恶劣国际环境，有些人总是想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害怕从资本主义中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三是领导人心理上总是希望共产主义早一天到来，超越观时有流露；四是长期形成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在反“左”反右问题上，我们只有很好地领会邓小平这一理论，联系每个时期的实践，才能做到“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三) 几 点 结 论

1. 从苏联东欧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带有毁灭性的隐患。而要把经济搞上去，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原来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新的运行机制；而改革开放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经验总结的产物，是完全正确的。

2.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因为：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纠正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抓住过去没有搞得很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3.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正确与否要不断地受到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的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实践在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这是后人当仁不让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长期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论上的建树，而且误把教条式地沿袭

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致使僵化模式始终未能突破。理论上的停滞，就为共运内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这正是长期的“左”的错误给剧变埋下祸根，而右的错误则使剧变成为事实。

四 吸取苏联剧变教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74年之后垮台了。古人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总结吸取这个失败的教训对正在深化改革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历史时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联剧变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发表了不少论著。但至今，由于在苏联剧变原因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不同，致使在中国应吸取什么教训问题上观点有很大差异。1996年以来，我国领导人与一些学者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而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特别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与江泽民同志所作的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为指导，提高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有新的突破。

有关苏联剧变的教训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探讨，本文力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若干最为迫切的需要研究、又是至今有不同看法与争论的问题，以求得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分析苏联剧变的教训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观。这个社会主义观就是小平同志 1992 年南巡讲话中讲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小平同志新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于：

第一，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混同起来。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把国家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捍卫。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么能更快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手段、方式、方法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改变。如果按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理解，这些变化就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个原因，苏联的传统体制长期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能作枝节性的修补，从而使传统体制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清楚的，即一切社会变革都要服从社会生产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发展的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第一位的。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所有制关系是第二性的、第二位的。现实的所有制关系要服从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本来是基本常识，但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影响下，两者之间谁决定谁，谁服从谁的关系被歪曲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经常跑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前，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中国的公社化、大跃进，苏联的集体化，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发展阶段的种种政策与政治运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小平同志根据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适合搞公有制就搞公有制，适合搞私有制就搞私有制，这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过急地实现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使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错误在于，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解放和发展，缺乏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便急于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水平越高社会越先进，越有利于生产发展，因而消灭剥削并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与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目前的中国情况看，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 要认识到，在我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决不能操之过急。十五大提出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参加分配，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股份制以及抓大放小等重大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行，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剥削、贫富差距拉大等趋势仍是不可避免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这些，不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广大群众，都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2) 要掌握好解放与发

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掌握一个“度”，处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但无论推行什么政策，都不能影响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这一本质，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把革命看作是历史的火车头，但并没有回答革命取得胜利、把主要任务放在经济建设之后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大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解决。1938年又说，在苏联，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劳动人民之间和谐合作精神。但时隔不久，即宣布阶级斗争在苏联不仅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从苏联的历史看，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往往以阶级斗争为动力，这具体表现在靠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经济建设、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等。在搞政治运动过程中抓阶级斗争，出现了问题就搞政治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帝国主义的间谍。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把不同意见视为异端，并采用过火的行动，严重影响党内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的手里。

毛泽东同志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与斯大林相比，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防止夸大矛盾对抗性的错误观点，但总的来说，仍是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一套办法搞经济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已把阶级斗争推到极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通过政治斗争去解决，庐山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看到，在中国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也不可能提出通过改革僵化的体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小平同志根据苏联、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要靠克服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才能达到。这些因素就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僵化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因此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①] 他还强调，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革命。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把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是在1984年10月与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②] 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又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

（二）如何认识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其剧变的关系

在我国的不少论著中，一直在批判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是因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一观点。批驳的论据大体上都是列举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些产品的数量，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等。

我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后者更为重要。苏联经过7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从量上看，不可否认有了不少发展，但从质的角度看，同样不可否认没有搞好。这种没有搞好，往往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有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113页。

1. 落后的、粗放型的、低效的、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苏联实行追求速度为目标的粗放经济，走的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拼消耗的经济。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发展，但一直到苏联解体，它的经济仍然是粗放型的。由于长期不能转变增长方式，就难以提高苏联的经济质量，使其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徘徊状态，这是导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

2. 与上述问题有关，苏联的经济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在苏联剧变以前，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进行，这个弱点在剧变前暴露得不明显。剧变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经济关系急剧萎缩，同时又实行对外开放和外贸自由政策，使俄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弱点一下子完全暴露出来。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能力，轻工业、食品工业已被西方国家冲垮，现在需要重建。

3. 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苏联工业的 80% 与军工有关。这种畸形的经济不只是过去、而且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影响前苏联与今天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 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十分脆弱。1953 年和 1913 年相比，农业产值年均增长为 1.1%，其中谷物产量基础低于 1913 年的水平。在一些人认为发展稳定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基建投资总额 27%（这在世界大国中居最高水平），但在 1979—1985 年 7 年中，苏联没有一年的谷物产量达到 2 亿吨。前苏联差不多有 3 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没有坚实的农业，从而使其整个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5. 生产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消费的需要。苏联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市场供求关系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

6. 苏联经济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与国际经济脱节。这种经济很难适应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从而产生了长时期的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的状态。

苏联的上述经济素质，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不被打败，那才是怪事。

（三）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在我国不少学者的论著中，把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推行的错误思想、方针与政策。但有人指出，“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①]，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②] 就是说，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③] 有些学者认为，苏联是被戈尔巴乔夫的右倾路线葬送的。但一些学者指出，这个看法不全面。长期以来，苏联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过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和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等三方面“左”的东西长期难以根本改正，结果使广大人民，尤其是新成长的一代人、两代人，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失望了，以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改不了；在西方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压力和和平演变战略的攻势下，外因通过内

---

① 参见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 年第一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因起作用，国内与党内右的势力急剧增长，政局动荡，共产主义政党终于以不同方式纷纷丧失政权。事实证明，正是“左”助长了右，右是对“左”长期难以改正的惩罚和反动。[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主要的、决定性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需要推敲的。

首先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上台后就着手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思想。在当时，很多苏联学者对阻碍改革的因素进行分析，发表了不少的论著，提出在苏联存在阻碍机制，它主要包括四个内容：教条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干部因素，主要指官僚主义。如何克服改革的上述阻力，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氏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而那

① 参见高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氏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氏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也有人说，东欧剧变是戈氏改变东欧政策的结果。1987年4月，戈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对东欧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氏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作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氏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1968 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我们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帽子；1989 年，波兰首先发生剧变，共产党失去领导权，瓦文萨上台，那么是不是戈氏派兵镇压才是正确的呢？不镇压，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了呢？

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剧变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①] 戈氏改革的严重失误加速了苏联剧变。

谈到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顺便提一下。一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与西方一些政治家对戈氏的某些评论来对他作出政治界定；二是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不能把戈氏 7 年的执政时期看成是一个闹剧，不能用各种讥讽的语言来代替科学的研究。这个 7 年，在苏联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有大量的问题值得研究。要防止以感情代替理智，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氏执政时期，即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而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对戈氏改革失败为我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四）要把防“左”、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

苏联的剧变，为我们提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论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搞改革开放，既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克服教条主义的“左”的干扰。这是从苏联与中国的情况得出的一个重

---

① 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世界经济》1996 年第 9 期。

要结论。这样讲的根据是：

第一，从苏联70多年的历史看，僵化的教条主义与设置的种种理论禁区，是阻碍体制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①]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③] 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前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前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了，或者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当前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继续前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人们就不得不抛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寻觅新的发展道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③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

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只是在前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前南斯拉夫，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前苏联的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当时斯大林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① 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牙利又进行悄悄地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探讨，动辄扣政治大帽子，就难以使改革理论发展，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体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如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的改造、计划与市场关系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等。实际上，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是由改革理论决定的。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为什么都不能确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因为这些国家，一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在苏联历史上几次有人对市场调节这一禁区发动过几次冲击，如1983年，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具有社会直接性”，“用于生产商品的个别消耗不一定通过市场机制确认其社会必要性”等理论

---

① 《南苏关系（1939—1973）》，第357页。

概念，是构成具有种种弊端的现行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同30年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现在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已经“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还在捍卫社会主义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特殊性’理论的学者们，是在给社会帮倒忙”。这种理论的探索，由于在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缺乏必要的民主，没有正常的理论讨论气氛，不少学者提出的市场调节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被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认为它会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市场社会主义”这顶政治大帽子压了前苏联学术界几十年，使得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理论停滞不前，从而也使改革停滞不前。试想，如果前苏联领导，允许学术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的发展，那么，前苏联也不致于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使其经济受传统体制的折磨；也不致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战后出现“功效递减”的曲线，最后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也不致于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如此缺乏竞争能力；也不致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不了经济增长方式，而长期处于经济效益低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状态；也不致于导致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积重难返，最后成为苏联剧变的主导性原因。

第二，对中国来讲，反“左”与反教条主义，其现实意义在于：①我们多少年来也是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我国仍有不小的市场。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又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些人又有不小的影响。当今，还有些人有意无意地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那套理论，从“左”的方面去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譬如，有人认为，从苏联剧变中中国应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今后巩固与建设社会主义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②党的十五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要解决的问题要比过去改革与建设中所

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难。十五大本身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没有这个发展就难以跟上改革与建设事业的需要。不少人提出中国将会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就必将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必将提出与此相适应的理论。在我看来，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理论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③邓小平同志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共运讨论的主题。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目前还不可能估计到的理论问题。如果不反对“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现成的答案，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因为，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二是即使找到了一些理论根据，那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花大力气从理论上去回答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出现的、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④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左”一直是主要错误倾向，反“左”要比反右难得多。“左”了往往还被认为是革命的，“左”了没有什么关系，一般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和惩罚，有的还能升官。但一旦犯了所谓右的错误，那就大难临头，戴上政治帽子，会遭殃。表面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而实际上坚持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其结果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帮倒忙。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

作会议闭幕会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讲话，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 这句话永远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座佑铭。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3 页。

五　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

74年以前，俄国共产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70多年来，苏共在领导苏联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困难的考验，其中包括国内剥削阶级的武装反抗以及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但是，由于苏共长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在80年代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又作了错误的战略选择，结果把国家引向了全面的危机，因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后终于导致苏共丧失政权，苏联国家解体。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拥有74年执政经验的苏共的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害，但是，这也是好事，它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苏共的失败和苏联发生的巨变远比一百多年以前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和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经受这场巨变引起的震惊之余，全世界共产党人会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全面而科学地总结苏共失败的反面经验，一定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非常宝贵的大量新鲜材料，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

为了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必要回忆一下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党对苏联东欧当时发生的事件作出的反映。1956年苏

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后不久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像这次剧变那样引起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造成的震动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党当时正确地抵制和反对了苏联领导人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对苏联东欧发生的事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是后来在分析苏联东欧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时，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其原因是由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①] 为了避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必须开始“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大家都记得，“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一场浩劫。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当时没能够正确地，而是错误地总结了苏联的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来有以下几点：①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分析和总结苏联的经验和教训。②把当时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的原因首先归结为是“修正主义思潮”引起的，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那样，不应该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该从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原因。③把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仅仅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忽视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和作用。④占有材料太少。当时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够看到的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的消极面仅是冰山之巅而已。今天，当我们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记取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我党总结苏联教训时的教训，是很有益处的。

下面就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主要教训，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 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

---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第 504 页。

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①]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主观条件，即掌握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无产阶级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同这个问题有关，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后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进行过激烈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当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②] 列宁还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③] 列宁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3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69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349 页。

经估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①]

按照列宁的观点，“要成为文明国家，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②] 所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③] 列宁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④]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⑤] 可见列宁不仅把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取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条件，而且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列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改变了列宁关于要用很长时间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思想以及他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1925 年 5 月，斯大林宣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一切条件”。[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所谓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人为地加快了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1936 年 11 月，苏共宣布，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684 页。
② 同上书，第 68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509 页。
④ 列宁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作者
⑤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6 页。
⑥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341 页。

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①] 苏联这时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畸型，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其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个人崇拜、滥用职权、官僚主义、生产力遭到破坏以及人民为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付出昂贵代价等等，无不与此有关。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其后，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同斯大林急于过渡、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结了过去急于过渡、“穷过渡”的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我党还重新确认，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可能要持续一百年。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②] 邓小平这些朴素语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领会。

2.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唯物辩证法彻底贯彻到对人类一切社

---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81页。

② 《邓小平重要讲话（一九八七年二——七月）》，第22—23页。

会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们历来反对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① 他又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 列宁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乃至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十月革命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以后，列宁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列宁发现，能够把革命热情和“文明的商人本领”，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制度能够将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他立即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④

遗憾的是，列宁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采取的革命的辩证的态度到了斯大林时期就发生了变化。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接着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1948 年 5 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28—62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66 页。
④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687 页。

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1] 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1952 年，斯大林亲自指导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2] 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充满生机和不断变革的社会，但是在这本教科书中却变成了僵化的固定模式。苏联在 3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过的做法和途径，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被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奉作圣典，影响了几代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长期得不到解放，改革被扼杀或中途而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教科书规定的概念上，即 30 年代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这样嘲笑那些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整个人类历史（从摩擦生火到发明蒸汽机——作者注）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意义，那是多么可笑……”[3] 到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苏联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只有十多年，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不仅要以此律己，而且还要强加给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更是可笑吗！荒唐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来的只能是悲剧。在苏联东欧，人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发展逻辑同“共同规

---

① 《南苏关系（1939—1973）》，第 357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7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154 页。

律”的创造者们的愿望相反：既然“社会主义”只能是教科书规定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别的样子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在实践已经证明，教科书规定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情况下，人们要继续前进，只好抛弃“社会主义”，而选择“资本主义”了——可见右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演化物，同时也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惩罚。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也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多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获得的，而是从这本教科书中获得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① 正是由于破除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得以实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和错误认识，仍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

3.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② 社会主义既然取代的是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自然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无产

---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页。

阶级在不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本来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但是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长期以来被搞得极为混乱，并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造成的混乱，还必须温习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决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织部分。从这个道理出发，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这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列宁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提高到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

合得好坏。”[①] 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②] 列宁还特别强调，要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很好地协调和区分开来。为此，他曾这样谆谆教导青年一代，“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学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④]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反复强调，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对鼓舞苏联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提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还断言，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此他本人在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1916年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11页。
② 同上书，第572页。
③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350页。
④ 《列宁文稿》第三卷，第94页。

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失效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商品输往他国"。[①] 在斯大林看来，不仅没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而且连同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似乎也不需要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动辄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资产阶级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帽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条主义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谈论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向资本主义学习，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以壮大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战后 40 多年，苏联始终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虽然在 40 年代、5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和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始终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1947 年，苏联应邀参加"马歇尔计划"。在讨论如何落实该计划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大骂实施该计划将使"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使其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②] 会议进行一半，苏联代表团就扬长而去。苏联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也禁止东欧国家参加。有意思的是，经过 40 多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以后，苏联领导竟然于 1991 年公开呼吁西方对苏联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甚至连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规划，也肯求西方给以制定。从闭关自守到仰人鼻息，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从害怕外来渗透到主动请求外来"和平演变"——这个历史的怪圈发人深思。看来，这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61、562 页。

② 《外交史》第五卷上，第 307 页。

个问题：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看起来很有骨气，很革命，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自己；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企图用构筑“铁幕”、锁紧国门的做法建立一个“无菌世界”，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这完全是空想。由于这样做只能导致自己削弱自己，最后不仅无“纯洁”可言，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保。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强调要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并且提出“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1] 他说：“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2]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提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苏联剧变的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4. 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和民主的。

苏共之所以失去民心，多数选民不赞成苏共继续掌权，其首要的原因是：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年代，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人民的生活实际处于贫困状态。[3] 苏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

---

① 1986年11月14日，新华社讯。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77页。

③ 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居第五位，70年以后则被排到最后几位，在全世界被排到第50位。苏联人自己讽刺自己的国家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职工工资的比重为36%，而美国为62%，按1991年4月1美元=1.3卢布折算，苏联职工月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8.8%（苏《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37期）。俄罗斯官方公布，1992年放开物价后，80%的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苏共在自己的政策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放在优先的地位。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经济陷入“第一部类”而不能自拔，而为人民生活而生产的“第二部类”长期落后，特别是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因此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涉及人民生活时，只好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了。结果是，国家虽然变得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联的经验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内，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美好的明天”可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人们有可能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得知曾同他们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这种反差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反应往往是毁灭性的。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共产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强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尽快地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①] 他还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②] 联系苏共失败的严酷现实，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苏联剧变的教训和邓小平的论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说的富裕，不仅包括综合国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那么它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

在原苏联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苏共下台了，但是上台掌权的

---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78页。

所谓“民主派”不仅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比在共产党执政时还糟。然而，即使这样，人民的大多数仍不愿回到原来的制度下，不欢迎共产党重新掌权。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苏共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富裕生活，而且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在过去70年苏共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得很不够的话，那么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得更差，而且在这方面同建国初期即同列宁在世的时期相比，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大倒退了。列宁非常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① 邓小平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② 可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弊端，本文勿需赘述。从苏共在这方面的错误中，至少可以引出以下几点教训：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越来越多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同法制、纪律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缺乏民主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二，共产党不应该丢弃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苏共的经验说明，丢弃这样的旗帜，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丑化自己，增加反共势力的资本。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是批判资产阶级言行不一，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口号为本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虚伪性，但是从来没有把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地举起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们的内容。第三，加强法制建设。用法治代替人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保障人民民主，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法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盲目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结果导致政权瓦解，国家解体。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可取之处。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约是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和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政治某些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值得借鉴。

5.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

苏共丧失政权，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犯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错误，但是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党自身的建设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人民的拥护，保持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改造自己。苏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里只能谈及以下几点。

(1) 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必须永远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在革命的年代，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能够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并能够正确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苏共到了斯大林时期思想开始僵化，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潭。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给以

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不管苏共用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向社会灌输它的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应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人所共知的“信任危机”正是这样产生的。在苏联，早在50—60年代就出现了“信任危机”，开始是针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到了70年代，对苏共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着的，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各种思潮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人民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本身。可见，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正像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那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①] 突破就是发展。如果不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论断，就不可能有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十月革命的经验，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能够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时候就能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相反，什么时候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会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

---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卷，第162页。

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不能前进，它的生存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解放思想，这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表现。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推向前进，除了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认识路线，不断总结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外，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吸收和掌握当代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源于19世纪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同'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②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善于吸收人类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用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用任何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运用产生的效果来验证或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引起现代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如果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结论，而不愿深入到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火热斗争中去，对外部世界的文明成果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知之甚少，或者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像列宁所说的，顶多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③

(2) 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人们还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991年"8.19"事件以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1页。

③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5页。

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对于这道反共法令，这个掌权达 74 年之久和拥有 1800 万党员的党却很少有人出来抗争。这种奇怪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立场有关外，还同党内生活不正常，党的机体不健康有直接关系。

苏共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很多是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形成的，没有根据党的任务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苏共虽然一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但是，党内生活如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被排斥在党的路线和方针制定过程之外，处在被动和绝对服从的地位。党内不能容忍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联共（布）党史》把联共（布）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都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就是来源于苏共。党内生活如此不正常，必然会使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党变成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的组织。这样的党经不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苏共的教训来看，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时，特别要强调民主的一面。要实行党内民主，关键的一点是采取有效措施，用党的组织纪律切实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只有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党员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的战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在党胜利的时候或处在危难之中，都能够自觉而勇敢地为捍卫党而斗争。

（3）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引起人民极为不满意的事情是苏共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叶利钦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从单枪匹马逐渐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这一事实说明，能否清除腐败，这对执政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从苏共和东欧国家一些党的历史经验来看，依靠执政

党自己清除自身的腐败现象，是不够的。1945 年 7 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掌权以后能不能保证执政以后避免腐化，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 抚今思昔，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的高瞻远瞩。共产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铲除腐败，除了自己痛下决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经常监督之下。

6.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苏共最后不仅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国家，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最惨重。这几乎成了规律性的现象。苏共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共产党在这里失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支持，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不是偶然的。首先，在苏共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例如，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为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显然失之偏颇。30 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害最深。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 156—157 页。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其他限制，知识分子一直缺少发挥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所必须的宽松环境。第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抹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地越来越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知识分子身上被扭曲得最严重。①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当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② 的情况下，作为现代科技载体和第一生产力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③。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队伍将日渐萎缩。第二，知识分子的多数是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和试验，允许犯错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创造有利于他们大胆探索、发挥聪明才智的宽松的环境。第三，要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确实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

7. 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苏联的解体是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是很多的。现在择其主要几点谈及如下。

---

① 以1985年为例，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例在工业部门为1.1:1.0，在建筑业中为0.98:1.0。整个经济部门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90.1卢布，而教育部门为150卢布，文化部门117.3卢布，卫生和体育部门132.8卢布，科研单位为202.2卢布（见《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444、445页）。

② 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超过50%，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占60%—80%（见《光明日报》，1992年7月23日，第3版）。

③ 1926年，苏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为300万，到1985年已发展到4200万，占就业人口的1/3还多（见《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1页）。

(1) 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地加速这一过程，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使阶级不存在了，国家消亡了，民族问题还会存在。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认为，由于苏联消灭了剥削制度，法律上确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民族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此外，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有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民族问题远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决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增加民族积怨。

(2) 要确实保证各民族平等的权利，保证各民族能够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自主权。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各民族利用本地区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这势必引起地方和民族的不满，最后会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但是，盲目地迁就某些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也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泛滥。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防止。

(3)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中，出现了这样的共同现象：在凡是按照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的地方，一旦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必然导致民族分立和国家解体。这说明，第一，在民族地区实行"政治多元化"危险更大。第二，共产党是联系各个民族的纽带，加强和改善民族地区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威信，这是巩固各民族联合的关键。

(4) 加快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政党要引导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要分散了精力。只有在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和提高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对各个民族产生真正牢固的凝聚力。

(八) 无产阶级政党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推行改革中犯的错误是苏联发生剧变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个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改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谈及许多，这里再作几点补充。

(1) 斯大林模式早已失去了它的优势，成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陷入了危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改革这种模式。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绝不能像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那样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也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左右摇摆，朝三暮四。

(2) 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济改革不放，但是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是，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政治改革正确与否，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准。但是，决不能在经济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就把政治体制打乱。

(3) 改革是一场革命，会触及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必须有高度政治权威的坚强领导核心，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机构。同时，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决不能用戈尔巴乔夫那种“大民主”的办法推行改革。认为不管什么改革方案，只有征得多数人举手赞成以后才能去实行，这是乌托邦。真正的民主化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推行一切改革的方法。

(4)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力求一切经过试验，先立后破，把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能因为求稳怕乱，看准了的事也不敢去做，贻误时机。

(5)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了解放思想，为改革扫清道路，对旧的习惯势力、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要避免坐而论道。

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是，切记列宁的教导，对于肩负着空前重担的党来说，千万不要沉缅于“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①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

附录：

《学习邓小平理论，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及其教训》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1997年11月7—11日，《苏联兴亡史论》课题组在上海召开了这次研讨会。会议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汪道涵同志的关注和指导下举行的。上海东方研究院与华东师大做了大量的组织和会务工作。来自北京和上海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汪道涵同志自始至终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开幕和闭幕时讲了话。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在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全党全国正在认真学习十五大文件的形势下举行的。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十五大报告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探讨了苏联剧变这个重大课题，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这次研讨会探讨的时间范围较宽，涵盖了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与会者对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几个时期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梳理”，讨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容相当广泛。这次研讨会采取了按历史时期分段讨论和按问题综合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对苏联70多年历史，既作了横断面的，又作了纵断面的剖析，加上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把这次研讨会讨论的有关问题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　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的评价

1. 关于十月革命道路问题

今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世界上对十月革命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苏联解体后，有关十月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西方许多学者一直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政治阴谋手段搞的一次成功的政变，断言十月革命道路没有前途。苏联解体以来，不少前苏联学者也对十月革命道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儿"，俄国当时如果沿二月革命道路前进，也许会发展得更快。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十月革命给全人类提供了探索新制度和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选择，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试验。同时，不少学者在会上也指出，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软弱无能、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在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巨大创伤，导致民不聊生，临时政府难于统治下去的特殊条件下取得的。列宁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运用极其高超的斗争策略，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广大工农（包括穿着军装的农民—士兵）群众的支持，使原处于地下的、党员人数不过二万余人的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只经过短短几个月，就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它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十月革命道路并不意味着俄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上能够超越"卡夫丁峡谷"，十月革命向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严肃命题是，共产党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切实发扬民主,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苏共恰恰没有回答好这个命题,这是苏联根本问题之所在。

2. 列宁是否也有历史局限性和错误

与会者对1917—1924年七年中列宁的治国战略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今天我们应全面和科学地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在充分肯定列宁的光辉思想理论和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列宁的历史局限性和十月革命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失误;我们固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但如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而回避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全面和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有些学者指出,列宁的伟大之处,一是能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而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在国内战争后提出新经济政策,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境界。但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战略上也有过两大失误:一是对欧洲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欧洲革命即将爆发,因而采取了积极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如决定出兵波兰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垄断资本主义作了极有价值的分析,但历史证明,他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估计不无偏颇和过激之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则估计不足。二是在国内战争期间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俄国可不用商品和货币而直接实施共产主义政策。这两个失误反映了革命者容易犯急性病,总想早点搞成世界革命,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需要看到这两个失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联共(布)党产生的不利的思想影响。

3. 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 与会者学习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就新经济政策问题展开了不少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政策思路具有博大深邃的理论和实践内涵，是一条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如果列宁逝世后，苏联能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走下去，苏联的发展将是另一个样子。但也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虽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但在当时联共（布）党的思想认识状况下，很少人能准确地理解和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因此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反复，很难设想，在当时的现实（包括思想）条件下，新经济政策在列宁逝世后会继续得到贯彻。

另外，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讲过的“停止退却”的思想，大家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不几年，列宁就提出“停止退却”的思想，这表明他是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权宜之计的，表明他思想中有一个既定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懈地追求这个理念目标，总的思想还是急性病的思想。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完整地理解列宁的“停止退却”的思想，实际上列宁讲的“停止退却”决不是意味着再回向“战时共产主义”，决不是指废除新经济政策。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含义是指，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应学会做“文明的商人”，在商业方面同私人资本展开竞争，在此意义上发动进攻。

4. 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和认识

分析和研讨斯大林模式的毛病和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学者认为，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发展了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路。他在苏联长达 30 年的执政时期中确立和固定下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军事和半军事性质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二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战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却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社会主义进程的消极和阻碍作用。斯大林模式在战后几十年中勾画出来的是一条“功效递减”的曲线。这种模式缺乏合理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办法，不是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的现实目标，而是以共产主

义的遥远美景为主要动员手段，它最终陷入了自身的效率危机和人民对它的信仰危机。这种模式无法将苏联带入后工业化社会，当世界进入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发展时期，它愈益丧失了自己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面临严重的停滞和深刻的危机。

许多学者认为，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工业化，增强了苏联的国力，在二次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些功绩应该肯定，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在主要理论错误是，把苏联在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它们上升为理论附加给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们神圣化和教条化。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十分短暂的历史阶段；他夸大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迅将灭亡的社会。斯大林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错误表现在：①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权宜之计，在列宁逝世后不几年就摒弃了新经济政策，通过加速改变所有制的办法，到1937年就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同时提出下一步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②严重破坏法制，制造了“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把大批党政军优秀干部和无辜群众当作“人民敌人”进行镇压，甚至把整个少数民族也作为镇压对象。③大搞个人迷信，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社会之上，从而严重地压制和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④在战后国际和国内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进一步把苏联模式固定化，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向东欧输出，还把它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准，把南斯拉夫打入“另册”并在东欧各国党内搞“大清洗”。⑤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同资本主义大国搞过度的对抗。

不少与会学者认为，苏联在历史上错过了几次改革的机遇，二次大战后就错过了一次机遇。当时苏联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业工作

领导干部，曾对世界经济形势和苏联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农业政策，提出过一些新的正确的见解。不幸的是，斯大林把那些有创新思想的人都打了下去，使苏联模式变得更僵化。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苏联二战后就有改革机遇的看法，认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下苏联不具备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

5. 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还是改革者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对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在我国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成了影响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总结苏联历史教训的时候，现在需要根据客观的历史材料，实事求是地把这个问题予以澄清。许多学者在会上用很多事实说明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者，说他是修正主义者的评价是缺乏依据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人，虽然赫鲁晓夫改革并未成功，但我们对它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开创意义应给予足够的评价。事实足以说明，至少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历史作用是无法否定的：①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平反斯大林时期苏联搞的大量冤假错案。苏共20大后，毛泽东和我党中央都曾肯定过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所起的揭开盖子、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今天人们更能看出批判个人迷信的巨大意义。②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总的来看符合战后世界形势变化发展的趋势，具有合理内涵和创新意义。现在看来，我们当年对所谓“三和”路线的许多批判是站不住脚的。20大后，赫鲁晓夫改善了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承认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多种发展形式，这也是正确的。③倡导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施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与会者指出，赫鲁晓夫当然也有他的许多错误，诸如：①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采用的方式不妥；②他的改革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他批判了斯大林个人，但在总体上仍保留和维护僵化的斯大林模

式。③他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次浅层次的改革，没有深入下去和拓展开来。④他继承和发展了苏共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提出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与其说是否认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理论，不如说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产物。⑤他性格鲁莽粗暴，喜欢独断专行，搞瞎指挥，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中作出了不少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并不能改变他作为改革者所起的历史作用。

6. 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

与会者认为，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我们过去研究不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有些学者指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60年代下半期由于进行了柯西金改革，苏联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7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取得了同美国的战略平衡，成为可同美国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正是在这18年里，苏联在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苏联模式的功效越来越递减，苏共各级机关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腐败和官僚化。这些问题导致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大量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对内反对改革、安于现状、盲目乐观，自己不搞改革，还不准别人搞改革，硬是把捷共的改革镇压下去，勃列日涅夫对外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演变成为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丧失活力和凝聚力的庞大官僚机关，这些教训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有的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达到了最强的时期，70年代末苏联经济虽然发展缓慢，但还是在增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所以对这个时期的“停滞”要作分析。不过，勃列日涅夫不思改革和进取，未处理好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关系，使苏联失去了利用科技革命发展经济的大

好时机，又由于勃列日涅夫片面强调干部的稳定和苏共对领导干部的缺乏监督，致使苏联在他执政时期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州和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构成的谋取私利的特权阶层，因而积累了大量的问题。

7. 苏联剧变为什么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由于时间关系，这次研讨会对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和错误未能展开比较全面和充分的讨论。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发生剧变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剧变有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剧变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偶然因素大于必然因素。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知道苏联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他能力不强，他采用的改革战略和策略有严重错误，在开始提出的几项改革措施未能进行下去时，就匆忙地由经济改革转为政治改革，他搞的改革毫无章法，结果使苏联陷入了全面失控和混乱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因素，苏联未必会在80年代末垮台。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看法，认为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必然的，因为到了80年代初苏联模式已是病入膏肓，已经没有生气和活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已难以救药。

第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有很大错误，他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所有一切都一概否定，例如他提出的“新政治思维”中的一些内容，包括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等，不应予以否定。

二　对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的认识

苏联剧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几年来，什么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和深层次原因这个问题，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热烈争论的重大课题。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纵观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

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提出了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1．“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纵观苏共几十年的历史，自斯大林上台后，“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苏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给苏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主要表现是：

（1）学风一直严重不正。长期以来，苏共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生气勃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教条，也把他们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当作不容改变的教条。他们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能正视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发生的变化，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回答和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2）缺少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长期盛行。如只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的一致，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完全适应，而看不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只看到民族关系改善的现象，而看不到民族矛盾继续存在的实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只强调两者的斗争和对抗，而看不到联系和合作的一面，等等。从赫鲁晓夫起的几任苏共领导人，后任都要批前任的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思想，可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盛。

2．“左”的政治路线是导致苏共失败的关键的路线因素

苏共上述“左”的思想路线必然产生“左”的政治路线。这表现苏共在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长期把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斯大林于1937年在苏联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提出了今后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22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到

1980年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24大上尽管不再提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面临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使用了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的提法，仍未放弃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仍然不顾苏联国情，在1986年苏共27大上制定了加速战略，提出苏联要在2000年达到在生产率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目标。这些事实都说明，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在苏联领导人头脑中是前后一贯、根深蒂固的，苏共的纲领和政治路线长期脱离苏联的实际，因而无法起到持续不断地动员、团结和鼓舞群众的作用。相反，只能越来越使群众对之失去热情和信心，使苏共的思想理论宣传在群众中越来越丧失吸引力和号召力，造成了对苏共及其纲领的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危机。戈尔巴乔夫最后从“左”转向右，在改革中推行右倾路线，这是右对苏共长期的“左”的惩罚和反动。

3. 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废除新经济政策后在30年代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中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实际上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施的一种统制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是基于产品经济观，实行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二是形成超重型和消耗型的经济结构，在工农业、轻重工业、速度和效益、生产和消费等关系上长期失衡；三是实施粗放型和“数量超赶型”的经济战略，把在社会产品的数量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即使曾在苏联30年代实行工业化和战后经济恢复中发挥积极作用时，也隐藏着很多矛盾和弊病。它忽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原则，使经济缺乏内在的动因和活力，不能长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业积极性；它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国民经

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发展基础不稳；它实施的赶超战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质，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但苏共在其执政的几十年中一直把这种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混为一谈，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不容改变的根本制度，而看不到和不承认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共一直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动辄批判市场经济观点，或以“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压人，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始终未能在思想理论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禁锢。即使有 50 年代后半期的赫鲁晓夫改革和 60 年代后半期的柯西金改革，那也不过是对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修补而已，仍然不能走出这种模式功效递减的恶性怪圈。因而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不能得到及时克服，反而不断发展、深化乃至激化，终至出现停滞和危机，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形成强烈的经济反差，导致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到 80 年代初，苏联有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惊呼，“苏联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认为苏联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当时他们正是首先从苏联捉襟见肘的经济形势和同西方的经济对比中感悟到问题的严重性的。

4. 缺乏民主和监督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苏联党政领导机关的官僚化、特权化和严重脱离群众，这是导致苏共失败和苏联剧变的重要政治原因

苏联在它存在的 70 多年时间中实行的那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十月革命后发生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形成的。列宁原来设想，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最民主的政权，但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无法实现这一理想，所以只好把“劳动人民的政权”变成“为劳动人民的政权”。当罗莎·卢森堡等批评联共不讲民主时，列宁指责他们不懂“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可是列宁在晚年也看到了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

体制不受监督的危险性，并提出了建立工农检查院等加强监督的设想。可惜列宁的遗愿并未得到贯彻。

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列宁提出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等论断的片面理解，还由于沙俄军事封建主义传统的不可低估的思想影响，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把只适宜于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实行的那套党政组织制度和领导方法进一步发展和固定下来，基本不变地运用于苏联整个几十年和平建设时期。苏共赖以执政的这套政治体制，其内在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因而难以从政治上保证苏联的长治久安。其主要问题是：

(1)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行和发展，妨碍集体智慧和群众智慧的发挥。这种集权实际上是集权于苏共最高领导人个人。从根本上说，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迷信、个人专断、唯意志论等之所以一再发生，是源于这种制度。苏共的传统是，谁当上了苏共第一书记，谁就是最高权威，谁就可以个人意志左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至全党。直到戈尔巴乔夫，仍然摆脱不了这种传统的影响，他上台后虽高喊民主化，但实际上搞的仍是个人集权和个人说了算。

(2) 在干部制度上长期实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的委任制。列宁在论述民主问题时曾多次讲过，选举制、罢免制、代表制、报告制等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可是列宁以后的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长期只停留于“社会主义具有最广泛的民主”的谈论，而不下功夫去实践和发展党内和国家的民主。从斯大林开始的六任苏共最高领导人，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因“宫廷政变”和国家剧变而下台外，其他四人都实行终身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出现了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达 70 岁以上的同步老龄化。苏联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中，由于未能形成经过民主手续产生的、实现任期制的、稳定的正常干部交替制度，因此没有一次最高领导人的交替和变动不带来巨大的社会震动。这是苏联政治体制上的一大弊病。而各级干部

的委任制，又造成了上下级干部之间的依附关系和阿谀奉承之风，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风气尤为滋长。

(3) 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导致党组织的机关化和官僚化。党不管党，党不像党，越来越丧失在群众中实行政治领导和政策领导的功能。这种体制使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职能划分不清，事无巨细都得经过党的机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方面使党的机关不断膨胀，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党的机关时时事事都处于面对群众的第一线，使党和群众的矛盾趋向激化。另外，这种体制也难于防止钻营之徒混进党内谋取特权和私利。

(4) 以"人治"代替"法治"，缺乏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苏联最高苏维埃虽然通过了宪法和大量法律，但是法律没有真正发生效用。苏联经过几十年时间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而是搞"人治"，搞家长制，一切以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为准则。

上述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使人民群众不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再加上经济制度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久而久之，就使大批群众越来越同苏共疏远，越来越对政治感到冷漠。这就是造成在80年代末苏联剧变中无人出来维护苏共的悲剧的根本原因。

5. 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也是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党和政府不仅在农民政策上犯有错误，在理论上也没有解决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低估了农民的作用。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对农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农民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斯大林对农民的认识有很大矛盾，一方面说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另一方面又认为农民具有非社会主义的本性。他对农民实行的是由国家全面控制和剥夺的政策。这是很大的失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苏联农业长期不振，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这也为苏联经济的下降和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埋下了根源。

苏共长期对知识分子采取不信任态度，看不到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中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苏联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常常受到歧视，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总是首当其冲，而且在工资待遇上也由于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而长期偏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经常在文化科学领域中对新思想和新流派采取主观武断的粗暴态度，在各个科学和文化领域中对具有新思想和新见解的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不断进行批判和清洗。苏联到 80 年代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已占到总人口的 1/3，而且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苏共正是由于长期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失去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到 80 年代末在举行选举时，苏共首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失去阵地，这决非偶然。

6. 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上的失误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大原因之一

首先，中央高度集权与宪法和联盟条约规定的分权制存在矛盾。其次，苏联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使民族共和国经济发展丧失自主权，缺乏活力。第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少数民族感受不到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第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泛滥使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关系紧张。苏共原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纽带，80 年代末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政治改革中一旦把苏共搞成一个意见分歧的松散组织，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解体的命运就难以避免。

7. 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是苏联遭致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对外关系上，主要是对待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苏联长期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强调斗争和对抗的一面，而看不到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一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拒之于门外。

其次，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搞对抗，进行军备竞赛，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使自己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包袱，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断搞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四面树敌，使自己陷于极其孤立的局面。

三 从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中应吸取的教训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由于建国后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以总结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教训，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具有迫切的和现实的意义。

有的同志强调，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今天，我们必须记取50、60年代，特别是“文革”中，我们从“左”的方面去总结苏联教训的教训。

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值得引以为诫的问题，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1. 必须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视为取得政权后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第一，马、恩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列宁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①] 这也就是说，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把社会主义栽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

植在任何社会土壤上。在国际共运史上曾有过一种看法，认为哪个人主张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他就是“孟什维克”或“取消派”。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列宁的思想的。事实上，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争论的问题是，当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曾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①] 第二，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必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教育，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决不能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②]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 这些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应该深刻领会。

2. 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而且这些设想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加不能照搬他们的某些设想和结论。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

---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卷，第 691 页。

② 《邓小平重要讲话（一九八七年二——七月）》，第 2—23 页。

③ 1992 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反复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和“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列宁在他的晚年，在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以后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②]

如前所述，到了战后，斯大林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其规定为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几代人。在中国，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人们头脑中也根深蒂固。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③] 所以，要排除干扰，把我国改革事业进行到底，还要花大力气，把人们的思想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3. 要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

苏共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估计不足。苏共长期抱着“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不断加深”等理论教条不放，并以此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大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同马、恩、列在世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及其生产力的飞跃，资本主义将进人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

新的发展周期。无产阶级政党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

苏共的另一个教训是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织部分。从这个道理出发，对外开放，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列宁曾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提高到了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并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严格区分开来。他曾经这样教导青年一代："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学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①] 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长期实行闭关自守和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政策。当时苏联一怕对外开放会使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二怕因此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却与此相反：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起门来搞建设，看起来很有骨气，很革命，而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自己。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企图靠锁紧国门的做法建立一个"无菌世界"，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这完全是空想。这样做只能导致自我削弱，最后不仅无"纯洁"可言，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保。可见，邓小平同志为我国制定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国内外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4. 共产党不能片面追求国家外部的强大，要把内部的发展和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

使人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民主作为强国之路

二战以后，苏联逐渐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它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多次，它的势力曾伸展到世界各地。可是，就是这样的超级大国没经一枪一炮，却在一个早上从内部顷刻瓦解。可见，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家的安全和强大首先不取决于拥有多大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内部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拥护程度。苏联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苏共为了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而对涉及人民生活的产业，却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安排。结果是，国家虽然变得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是人民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苏共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富裕生活，而且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自然就逐渐失去人民的拥护，以致最后被人民所抛弃。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共产党在政策的优先次序方面，首先要集中力量于国内的发展，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扬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强国之路，不能像苏共那样，把重点放到国家的外部强大上，而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置于次要地位。

5.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

苏共丧失政权，原因很多，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出在党自身的建设上。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里只能谈及以下几点：

（1）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必须始终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现党的现代化。苏共的胜利首先是从思想的胜利开始的，而失败也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从苏共的教训来看，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展马克思

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实现党本身的现代化。历史证明，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能够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时候就能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相反，什么时候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会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解放思想并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表现。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推向前进，除了不断总结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吸收和掌握前人和当代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第二，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用任何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运用产生的效果来验证或发展革命的理论。在当今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尤其需要这样。

（2）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苏共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很多是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形成的，没有根据党的任务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党内生活如同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被排斥在党的路线和方针制定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发扬党内民主非常重要和迫切。如果说，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在全民中尽快扩大民主，那么鉴于社会的精英大多集中在共产党内，因此党内最有条件而且也应该扩大民主。实行党内民主，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用党的制度和纪律切实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即对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建议权，对领导干部的选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等等。

（3）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当年叶利钦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从单枪匹马逐渐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这一事实说明，人民群众对苏共内部的腐败深恶痛绝。苏共的教训说明：第一，反腐败必须坚决和持之以恒；第二，

对领导干部必须有民主监督；第三，通过改革，从制度上防止产生腐败的土壤。

6.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如前所述，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把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根据苏共失败的教训，无产阶级政党要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必须从理论和政治上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当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的情况下，作为现代科技载体和第一生产力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第二，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和试验，允许犯错误。特别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创造有利他们大胆探索，发挥聪明才智的宽松的环境。第三，要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确实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

7. 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同时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苏共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先后都进行过改革，但均以失败告终。从苏共改革的失败中，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改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斯大林模式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已彻底失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全面和深刻地改革这种模式。绝不能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那样，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也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左右摇摆，朝三暮四。

（2）经济改革要同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像在苏联和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和情况复杂的大国，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

济改革不放，但是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政治改革正确与否，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为标准。当前首要任务是做到政企分开，全面改革行政领导体制，并逐步做到党政分开。

（3）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力求一切经过试验，先立后破，把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能因为求稳怕乱，看准了的事也不敢去做，贻误时机。

（4）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了解放思想，为改革扫清道路，要坚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重点是排除“左”的干扰。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是要避免坐而论道，沉湎于“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①

在讨论中，与会者还指出了其他许多教训，例如民族政策问题，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与会者在这次研讨会上也对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和教训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大家指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并正确吸取苏联失败的教训，对我国深化改革，实现长治久安，在21世纪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研讨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然有所前进和深入，但这还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端。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课题不是在短期内开几次讨论会所能完成的，必须集中力量，花相当长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材料，才能把这个课题研究得更系统、细致和深透。为此，大家建议：①这样的研讨会应有计划地继续举行，应定出规划，列好题目，每年有准备地举行一次；②要系统地收集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

国内外对这个课题的各种研究信息和不同观点，以扩大我们的视野；③要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多编辑出版一些苏共的文献和苏联的档案资料；④要有计划地选择一些俄罗斯学者和过去苏共的党政干部写的回忆录和其他有关的著作。做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费，大家希望中央能考虑拨给一定的经费，也希望社会资助。总之，我们有必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争取把这个课题的研究搞深。

《苏联兴亡史论》课题组整理

1997年12月11日